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中近现代史纲要》专题化教学

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为着眼点，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提高。

二、遵循原则

1. 精用结合原则。按照邓小平“学理论要精要管用”原则，抓住教材中的基本观点设置教学专题，力求教学内容少而精。
2. 素养提升原则。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本着有利于提高学生道德素养与个人综合能力组织实施，力求学生课堂有收获，课后有感悟。
3. 知行结合原则。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掌握基本观点与基本知识，能够用其指导自己处理学习与生活中的矛盾，指导自己科学成才。

三、具体实施内容

专题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导言

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年10月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件，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中提出的“全面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中宣部和教育部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2005年2月），明确规定在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目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主要讲授中国近现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通过学习，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

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了解国史、国情，懂得三个选择（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我们力求在全面史实比较，历史发展逻辑，社会选择必然的深层次上提高认识。这是进行“纲要”教学的主要目的。（见教材开篇的话）

“纲要”课，做为高等学校学生必修的政治理论课之一，其学科归属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性质也是明确的，但它和其他几门政治理论课不同，它同时又具有历史学科的性质。所以，我们还应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认识其教学目的和教学意义。

为什么要了解历史？

近代思想大师梁启超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梁启超：《新史学》）因为在历史中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民族的兴衰，一个民族的全部。

首先，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关键就在于其传统得以继承，其文化得以发扬。民族的传统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则深深积淀于民族的历史之中。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昨天的继续，而今天又将走向明天，所以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如何解释历史，对于把握今天，规划未来极为重要；“解释历史”，就是了解传统，了解文化，把握国粹（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治史传统的民族。正因为此，中华文明才能够生生不息，绵延至今。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可以看到，春秋战国以来，各个诸侯国都设有太史，都有自己的国史，如果没有吸收此前各国的太史们留下来的记载，司马迁是不可能写出《史记》这样一部千古不朽的著作的。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之后的史官，都怀着一种历史使命感来完成史书的编撰工作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就详细的表露心迹：“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我之所以默默忍受着痛苦，苟且活命，被掩埋在粪土中也不躲避，只是遗憾我还有未完成的心愿。）他这里的“私心”，就是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写出一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求天与人的关系，理解从古至今的变迁，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的史书来。在《太史公自序》中更明确写道：“述往事，思来者”。（记叙历史，为后人留下遗产。）境界之高，令人敬畏。

其次，历史是凝固了的过去，留给我们的的是经验和教训。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历史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的演讲中指出：“就过去而言，我们处于何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什么关系？这不仅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人们无法回避的。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置于我们生活的连续体中、置于我们所属的家庭和群体的统一体中。我们不禁要对现在和过去进行对比：这就是人们保存家庭影集和家庭录相的缘故。我们可以情不自禁地从中学到知识，这就是经验的含义。我们也有可能学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实际上也经常是这样——但如果不论过去对我们的目的有什么关联，而我们却不学习，或是没有机会学习，或是拒绝从中学习，极端地说，我们的神经可能有问题。古谚云：‘烧伤过手指的孩子远离火。’这就是说，我们从经验中获取教益。历史学家就是经验的记忆储备库。理论上，过去——即所有的过去——迄今发生的所有事情——构成了历史。”（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事实证明，历史的经验提供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无穷的智慧，即我们都可以从历史中获得教益。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关注前人是怎么做的或者书本上是怎么说的，使自己避免或少走弯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我们息息相关。

当然，我们讲学习历史的经验教训，前提是肯定历史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绝对不是机械地照搬。历史智慧既有具体的，更有抽象的。从具体来讲，人永远无法从历史当中学到什么，但从抽象而言，历史可以潜移默化地起作用。现在要反腐倡廉，于是有人编写“历史上的清官”、“历代反贪史话”一类的书，从具体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今天的腐败，和历史上的情况并不相同，银行、证券等金融系统的腐败，古代没有；现在利用计算机、网络等手段的高科技犯罪历史上也不曾出现。但是有一点，古往今来多少人因为腐败而身败名裂，多少政权因为腐败而导致垮台，这个教训可以给后人一种启示和警戒。

中国是历史悠久并具有悠久治史传统的国度，尤其在《资治通鉴》（1084年北宋司马光和助手完成共354卷。）问世以后，把历史的地位提高到了极点。但是，通过《资治通鉴》的写作实践，中国历史的泛政治化倾向，也更加程式化、理论化，并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传统。对此，顾准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评论，他说：“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

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4。）正是由于中国历史的泛政治化倾向，使一般人认为历史的惟一作用就是为统治者总结经验、提供教训。对我国官修《中国近现代史》抱有偏见者更是大有人在。不同观点林林总总。

历史的“资治”作用是不应否认的，问题在于怎样认识这种作用？

第三，官修历史教科书是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它涉及到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其历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尊严感、耻辱感，亦即形成“国民意识”。所以在当代，我们有必要寻求一种理性的历史认知，首先必须寻求对于民族生存，国家发展有利的历史认知。以国家民族意识为本位而同时具有开阔宏大的世界主义视野。已故杰出史传家朱东润先生在所著《张居正大传》书后曾深有寄托地说：“整个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暗淡一些。但是每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努力呵，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422 页。）

十九世纪意大利独立运动政治家阿塞利奥曾大声疾呼：“我们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

日本文部省一次又一次修改其官修历史教科书，遭到各方抗议，他们却我行我素。原因就在于日本统治集团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恰恰表明日本统治集团对于通过历史教学塑造日本国民意识的极度重视。正如日本著名史家信夫清三郎在其所著四卷本《日本近代政治史》中指出：明治维新的意识形态课题可以分为二：（1）创立新“日本”，（2）形成新“日本人”。显然深受阿塞利奥的影响。

读近代美国的帝国开拓史，不能不令人钦佩，这种钦佩不是由于美国的制度，而是美国立国以来百年如一，贯彻始终的一套国家发展战略。是这个帝国的始创者们那种俯瞰历史面向未来的远大抱负和眼光。近代美国历史故事的编撰者卡尔金斯曾说：“如果说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的话，那就是，他们的目光始终面对着前方，遥望目力所及以外的远方，关注着在视野那一边的远景，而且敢于迈开脚步奔赴那未知的前程。”（THE STORY OF AMERICA, New

York,1975.) 走向远方, 征服它们, 这就是近代美国人的民族精神。毫无疑问, 他们走向远方的立足点就是美国的历史, 是他们极为年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国家在其学生中开设一年的历史课程。在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中, 包罗万象的历史节目最受观众青睐。

总之, “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 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识的伟大学术。”

(何新) 所以, 二三十年代, 当日本史学界掀起一股“中国古史抹煞论”的时候, 章太炎曾说: “欲亡其族者, 必先诬诋而灭其史。”我们的先人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

二、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与主线

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史学界有不同观点, 比如, 认为中国近代史始于 17 世纪 40 年代 (即明清两代交替时期), 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 (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和西方学者的观点)。更多的中外学者认为,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史学界有人认为 1919 年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1949 年为当代史的开端等。本教材的观点认为, **中国近现代史是指 1840 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 是中国的近代史;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是中国的现代史。**

主题: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世纪, 中国内部的腐败和外来帝国主义的掠夺, 如同一对孪生恶魔, 给社会带来了长时期的衰落。中国为了克服这对孪生恶魔, 推动社会进步, 不同的阶级、政党, 历经几代人的探索和抗争, 有成功, 也有失败, 但它们加到一起, 对中国重现活力做出了贡献。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的: “鸦片战争后, 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 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 创造必要的前提。”这就深刻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 即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而斗争。

主线: 19、20 世纪见证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历史巨变。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 中国的历史潮流变幻莫测, 惊涛拍岸, 中华民族猛然觉醒, 愤而寻找重

生的道路。所以说，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几代中国人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进行英勇奋斗和艰苦探索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独立和初步繁荣富强的历史。“尽管中国历史的发展现象错综复杂，脉络极为纷繁。但从一种宏观的观点去俯瞰，忽略掉历史进程中那些复杂的色彩和枝节，我们却可以把握到一个总体性的进化之流。这个进程体现出人性走向自由，社会走向民主，制度走向进步的很难逆转的一维性流程。”（何新）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习方法

首先，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正确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掌握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人们是通过观点认知世界的。持不同观点的人，对同一世界或同一事件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历史也是如此。所以，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妆扮的小女孩”。的确，历史实体存在的复杂丰富性，以及人类认知的片面性，会导致史学解释难以避免的主观性。在一定意义上，历史解释与文学艺术一样具有自由性和创造性。但是历史与国家民族利益直接攸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须限制和规范主流历史解释的这种自由和随意。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句话就是实事求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然而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理论和方法上存在着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前，中国历史学总体而言，深受“左”倾阶级斗争史观的影响，具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特征。使教科书体系显得贫乏、苍白、幼稚、薄弱，把全部历史描绘成一部“阶级斗争史”，比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血统论、脸谱化、公式化的倾向。把现代史描绘成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史（可以举例论证）；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激进的近现代历史否定论。比如，否定农民运动，否定辛亥革命，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论”和“告别革命论”等。

其次，应该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近现代史。联系时代特征、国际格局和世界大势认识中国问题。因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等都与当时中国所处的国际格局密切

相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四、教材的结构

本教材的主题同近现代史的主题。结构分为三个阶段，综合论述和专题论述结合。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1840～1919 中编：1919～1949 下编：1949～2006。每编综述内容包括：1、社会结构、政治状况、阶级关系；2、面临的主要矛盾；3、各种社会力量的基本政治主张和历史命运；4、历史的基本轮廓。主要阐明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揭示这一时期的历史规律，带有统领这个时期全局的性质。专题共设置十章，内容包括：围绕重大历史问题，重要历史经验作比较深入的叙述和论证，把握近现代史的“要”即趋势、规律。

五、讲授方法

我们采用专题讲授方法，在深度和思想性上下功夫，不能停留在高中阶段的历史认知水平上。着重引导学生多思多想并学以致用。

共分八个专题讲授。学时不平均。

思考题：关于当前中国人的“国民意识”，请结合实际进行思考和讨论。

参考书目：

- 1、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 2002。
- 2、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3、[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
- 4、[英]埃克·霍布斯鲍姆：《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专题二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上）

一、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加上捻军、天地会起义以及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起义，构成 19 世纪中叶农民群众斗争的风暴。由于太平天国与历史上其他农民战争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所以教材着重讲述太平天国。（注意教材的提法，以往多提“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本教材改为“农民战争”。）

1、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时代背景

地主与农民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仍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加激化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这和以往发生农民起义的原因是相同的。正如天地会《万大洪告示》所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 1954 年版，第 115 页。）曾国藩在奏折中也提到：“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曾国藩奏折中着重谈了“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几个问题。曾国藩是清朝统治阶级的成员。他的这些话更有说服力。（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29～32 页。）这两段史料说明，正是因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迫使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群众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

外国的侵略激化了阶级、社会矛盾。 爆发于 19 世纪 50 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有其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的背景。这时，鸦片战争结束已经 9 年，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原本已经十分尖锐的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因外国的侵略而迅速激化。第一，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支出了巨额的军费，《南京条约》又规定要向英国支付赔款，这就迫使清朝统治者大幅度增加剥削强度，在繁重的旧捐税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的捐税，这些捐税最终都落在农民头上。第二，尽管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鸦片贸易还没有合法化，但清朝官吏实际上已经不加禁止，战后 10 年，鸦片的输入量增加一倍以上，这就使战前已经很严重的“银

贵钱贱”问题进一步加剧。农民出售农产品获得的是铜钱，但交纳赋税却必须是白银，结果实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第三，由于《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广州独一无二的外贸口岸地位的失去，使两广、福建、湖南、江西原来依靠内地通往广州的商路谋生的成百万下层群众顿失生计，这几个省份后来就多数成为农民起义特别猛烈的地区。（详细的分析可参看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5页。）

太平天国利用基督教作为发动农民的工具，也反映了这次农民起义的时代特点。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缺少文化，容易接受神秘的宗教语言，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很多农民起义都是通过宗教来发动的。鸦片战争后，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的基督教得以在中国合法传播。洪秀全接触到这种外来的新宗教，洪秀全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3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以后非常沮丧。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一位传教士送他一本书，即梁阿发用汉文写成的基督教布道文书《劝世良言》。他受此书内容启发，并借用了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戒条，加上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某些仪式、传说，创立了一种新宗教。但是，洪秀全的新宗教与西方传教士所传播的基督教完全不同，如范文澜所言，外国传教士传授的是“一个侵略的上帝”，洪秀全“要制造的是一个革命的上帝”。（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9版，第97页。）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事实证明，洪秀全创立的新宗教在发动、组织农民方面起了极为明显的作用。以往的一些论著称洪秀全创立的宗教叫“拜上帝会”，但学术界对此有不同意见，故教材没有采用“拜上帝会”的说法，而称“拜上帝教”。

2、体现太平天国特点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

这两篇文献集中反映了这次农民起义的特点，反映了农民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国家出路的探索。中国历来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关系历代政权的兴亡治乱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衰替。唐代均田，故有贞观、开元之治；明初裁抑豪强地主，因而国富民殷。反之，如土地集中于巨富官绅，农民失所流离，则生产力遭到破坏，莫不酿成大规模农民起义。在封建社会中，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土地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命脉。农民要求获得土地，

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平均主义思想，是他们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反映。宋代钟相等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号召农民起义；降至清咸丰初，洪秀全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制度化，从而发展到了最高峰。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九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21～26页。）

此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农副产品的分配，对在基层建立军政合一、军农合一的制度以及选官制度、宗教教育制度等都作了规定。可以认为，《天朝田亩制度》是关于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一部法典。

《天朝田亩制度》触及中国封建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封建地主阶级土地占有制度。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起义也提出过类似“均田免赋”的口号，但史籍上并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天朝田亩制度》则是中国两千多年农民战争史上最为具体、详细的分配土地的法规。这个制度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反映了农民最根本的经济要求。因此，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是《天朝田亩制度》的主流和本质。因此，称《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但这个方案的土地分配制度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空想的性质。它所设计的具体分配方案也不切实际。因为要实行平均分配土地，先要把地主的土地没收，把所有土地归为国有，然后再重新分配，这就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还要克服各种反抗，太平天国并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土地分配的技术问题也十分复杂，16岁以下分半，过两年后这个人就成年了，怎么办？人口的变化如出生、死亡、犯法被捕、迁移、弃农转业，又怎么办？还有把土地分为九等也是非常复杂和困难的。而且，《天朝田亩制度》一方面规

定平均分配土地，但同时又规定耕作者不能自由支配赋税后的农副产品，这反映了制度本身的思路是不严密的。很多学者研究指出，太平天国实际上并没有推行这个关于土地分配的方案。

《资政新篇》，洪秀全等人学习了西方基督教的一些语言和教义，把它们改造成发动农民的思想武器，但毕竟没有学习到西方真正先进的东西。《资政新篇》却是一个真正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方案，提出者洪仁玕（字益谦（一作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今花都区）人。洪秀全族弟。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参加拜上帝教。金田起义后，1852年（咸丰二年）曾被捕，脱险后转至香港。直至1860年4月辗转到达天京。5月，被洪秀全封为精忠军师、干王，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执政之年，作《资政新篇》。）在香港住了近7年，是一位对西方有所了解、讲求实务、积极向西方学习的新式知识分子。洪秀全对《资政新篇》各条建议多有批示。

《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定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所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与番人竞雄”，但严禁鸦片入口，对来华的外国人，“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523～541页。）

《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比维新派早得多，从学习西方的角度看，也比洋务派要早。《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历史中一个光辉的亮点，使这次农民战争鲜明地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农民战争，反映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探索国家出路的努力。

不过，《资政新篇》是一个建设的方案，必须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安定的环境才可以实施，但太平天国偏处一隅，尤其在1859年以后，太平天国没有这样的条件。此外，洪仁玕虽然得到洪秀全的信任和支持，但他的威信不足以统筹大局，没有能力和机会培养、组合一个改革的核心。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太平天国

其他领导人不可能理解这个方案。所以，《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一样没有付诸实施，只是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思想资料。

3、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

在很长时间内，太平天国被称为农民革命运动，评价时有拔高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日趋多元化，近十多年，甚至出现了一些完全否定太平天国的论点。必须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有其合理性和正义性，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所以，我们不宜对太平天国作出溢美或否定的评价。

在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去分析：

第一，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事件。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来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因此，太平天国的打击目标与日后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是一致的，它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事件。

太平天国对封建主义的打击，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消灭了百万清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秩序，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这场起义之后，清王朝不得不授予镇压太平天国的湘、淮军头目越来越大的权力，军权、财权、人事行政权下移，地方督抚权力大增，清廷对地方控制的能力减弱。（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川、陕、鄂交界发生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耗尽了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削弱了清正规军。故清政府开始动员和利用地方武装，“团练”就是这时出现的。为控制“团练”清任命了“团练”大臣，如曾国藩等，他后来又组建了新式地方军队—湘军。）几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很大程度是因为太平天国以后形成的这种政治格局。太平天国在其统治区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使不少地主家族死亡殆尽，大量田册地契毁灭，太平天国虽然没有实施《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的方案，但在一些地区实行“着佃交粮”的政策，实际上承认了佃农对所耕土地的所有权。起义失败后，清朝虽实行“回归原主”的政策，但很多土地已经无法归还原来的地主，于是，部分耕作这些土地的农民成为土地的新主人，这就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批新自耕农，这在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太平天国反抗外国侵略势力，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要求外国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和遵守太平天国的法律，严禁鸦片贸易。当外国侵略者表示，如果太平天国触犯了他们的侵略利益、外国将会以武力对待时，太平天国并没有在威胁下屈服。据李秀成说，外国侵略者曾经向洪秀全提出以“平分”中国为条件联合反对清朝，被洪秀全严辞拒绝。（《李秀成自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 2000 年版，第 838～839 页。）尤其是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太平天国起义者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以及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斗争，表现出英雄的气概。1862 年 4 月，太平军在上海郊区与英、法、俄军队激战，打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5 月，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6 月，俘虏“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9 月，“常胜军”（是年洋枪队改名“常胜军”）头目华尔被太平军打伤毙命。太平军在同外国侵略者作战时的表现远远优于清军。

第二，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历时 14 年，转战 18 省，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列宁说过：“历次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96 页。1995 年新版本未收此文）列宁的这段话对理解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很大的帮助。尽管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模仿封建王朝的君主制度，但因为太平天国打击的是官绅地主，给贫苦农民带来利益与希望，所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拥护。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与了起义，起义初期，太平天国连老弱妇孺在内不足万人，两年多以后迅速壮大为数十万人的队伍；太平天国北伐军出发时不足两万人，但沿途贫苦农民不断加入，转战期间队伍曾不断壮大。如果不代表农民利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太平天国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太平天国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洪秀全在创立拜上帝教前后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创作，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这在以往的农

民战争史上是没有的。此外，太平天国纪律严明，等级森严（采取军政合一制度，共 64 个等级，最高为天王，出来坐轿子要 64 个人抬，二把交椅为东王，出来要 48 个人抬，最小的等级为小司马，相当于村长，出来要四个人抬。）都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度。总之从中国的农民战争史看，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第三，太平天国对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启迪和鼓舞。作为一场空前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撒播的反抗火种仍然在延续。孙中山早年就听过太平天国的故事，这是他青年时代立志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重要动因。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更是以太平天国的后继者自居，革命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中赞扬和宣传太平天国的斗争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注意吸收太平天国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说，太平天国对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很大的启迪、鼓舞作用。在 19 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对其他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改革运动也有所促进。例如，有学者指出，太平天国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就产生了推动作用。（参看王晓秋：《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42～546 页。）也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中国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发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 年 5 月 20 日）

二、农民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

农民起义不可能导致农民阶级的阶级胜利，太平天国也并不能例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非只有两个前景：或者失败，或者建立新王朝。太平天国没有能够争取到第二种前景，终于失败了。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从客观原因来看，是因为在当时太平天国面对的敌人不只是清王朝，还有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公开宣布实行“借师助剿”的政策，与西方国家联合起来镇压，而西方国家也认定维护清王朝更符合它们的利益，于是以各种办法支持清王朝，西方国家的军队甚至直接同太平军作战。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联合起来的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太平天国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从主观原因来看，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影响了起义的进程和归宿。（以往一些论著回避太平天国局限性的一面，而近年来一些著作对此则过于渲染，两种做法都有片面性。教材对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作了分析，主要强调了农民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也提到了太平天国宗教迷信、腐败现象、内部分裂等问题。）太平天国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太平天国指导思想的局限性。太平天国用拜上帝教的教义来发动农民是有成效的，但这种宗教不是科学、先进的思想，它既有西方的色彩，又含有大量俚俗、粗鄙、迷信的内容（例如“上帝附体”之类），洪秀全制定了宗教和道德的戒律“十款天条”和各种仪式，自称天父次子、天兄耶稣胞弟，在太平天国中致力宗教甚于实际政务，即使在后期亲掌大权时亦如此。其宗教宣传和举措离奇而缺少社会内容，未能起到鼓舞士气，加强权威的作用。尤其不容易取得有文化的士大夫的支持。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但在吸收士大夫参加方面却不如其他规模小得多的农民起义。士大夫阶层的精英人物基本站在清王朝一边，这与太平天国的宗教、文化政策有很大关系。洪秀全在后期不仅没有对宗教进行必要的改造，反而强化了其迷信、鄙俗的一面，但对群众已经没有号召力，只有洪秀全本人依然沉迷于自己制造的虚幻神话之中。（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色彩问题典型的有，杨秀清代“天父下凡”，一次洪秀全安排4个天王府女官在雨雪寒冻的天气下凿池挖塘，不得休息。杨秀清假托天父附体，要洪秀全免除天王府这4个女官的劳役，并斥责他对待有功姊妹太苛刻，要罚打40杖。洪秀全以“天王”之尊，只得俯伏在地，准备受杖。后来杨秀清又玩起“天父附体”的把戏，对洪秀全表示了夺位的野心：“你和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有这么大的功劳，怎么只能称九千岁呢？”洪秀全赶忙回答：“东王打江山，也该是万岁。”“天父”又问：“东王的世子岂止是千岁？”洪秀全答：“东王既然是万岁，东王的世子也就是万岁，而且世代都是万岁。”“天父”这才喜滋滋地说道：“好！那我就回天了！”）此外，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勾画出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公有的小农社会的理想模式。在思想文化方面，洪秀全以上帝为独一真神，打击佛、道异教，在建都天京后又发起了严禁一切孔孟

诸子百家书籍的运动，以图加强思想统治。如此对待传统文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第100页，1983年版。）

第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的一面，导致享乐主义、腐败、分裂甚至自相残杀。进入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领导人很快就抛弃了早期的艰苦奋斗作风，极力追求物质享受，而且也以物质享受激励官兵、群众。例如，洪秀全所作的《天理道情书》说：“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胼胝，辛苦备尝。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洪恩，昇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试思尔等在凡情时有如此之荣耀者乎？”（《天理道情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版，第390页。）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及其他诸王“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逐渐疏离，诸王之间更是“彼此睽隔，猜忌日生”。（《贼情汇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版，第172页。）即使是比较清醒的李秀成，忠王府也修得十分壮丽，连李鸿章也叹为观止。太平天国的高层都有很多妻妾，如洪秀全有王娘88人，杨秀清有王娘54人。1856年9月发生的天京事变，更是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的恶性发作。这场流血大内讧，打破了洪秀全等人制造的神话，造成了信仰危机，拜上帝教也失去了早期的凝聚功能。太平天国的一些成员唱出了如下歌谣：“天父杀天兄，总是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去，还是做长工。”（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册，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因此，天京事变就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对农民阶级局限性的深层理解：

生产方式的局限：农业生产与天地同一，无需人为的刻意创造，只需长幼继承，互相模仿，经验摸索；缺乏彼岸信仰、理性思维、自由思想，只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功利主义；思维朴素、直观、模糊，缺乏历史的、通盘的、长远的考虑，缺乏批判力和创造力。

平均主义的局限：农民要推翻皇帝，针对皇帝的大私有提出所谓财产大家公有，即平均主义：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生产的东西吃光喝光，没有了积累和再生产。可见，大公有是一种短期行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平均主义只顾今天，不顾明天，所以必然失败。最后农民起义还是要转回皇帝那套大私有制度，才能胜利。

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太平天国也有很多失误。例如，太平天国不明世界大势，对外国侵略者虽有反抗，但缺乏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有幻想，另一方面仍持“天朝上国”心态，不仅无法利用清廷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也无法阻止两者的联合，并不止一次受到侵略者的欺骗。在军事战略战术、经济政策等方面，太平天也有很多失误。

对太平天国的局限性，教材没有花太多篇幅，教师应当有较多的了解，讲授时可以适当多讲一些，但也不宜过于铺陈，尤其不必过多讲述太平天国领导人腐败的细节（这方面的史料不少）。应强调农民是小生产者，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文化上也不可能摆脱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享乐主义，其领导集团的腐败、内讧，归根到底都是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产物。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为中国找到出路，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探索

鸦片战争是中国这个老大帝国最末一个王朝宁静岁月的结束和中华民族重重危机的开端。面对入侵的优势之敌，怎样才能抗敌御侮、挽救危机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就在绝大多数人依然沉迷于“天朝上国”的梦幻里，对西方之进步不屑一顾的同时，有识之士却能从实际出发，从洋人的船坚炮利中看出其技术之先进远在中国之上，从而提出了学习西方科技以自强的问题。被誉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是这一主张的首倡者，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洋务派则是这一主张的实践者。从林则徐的首倡到洋务派的实践，反映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半个多世纪期间地主阶级改革派（封建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分子）为改变国家命运而作出的努力。

1、林则徐等改革派的探索

林则徐：（1785～1850）清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37）进士。曾任湖广总督等职。1839年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往广东禁烟，在虎门海滩销毁英美鸦片110多万公斤。林则徐组织翻译西文书报，编成《四洲志》。大力整顿海防，抵抗英军侵略。鸦片战争后被革职充军伊犁。后被重新起用，1850年卒于潮州普宁县。赠太子太傅，谥文忠。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林则徐开社会思想风气之先，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性课题，并为此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他到广州后为“探访夷情”，广泛搜集外国人出版的各种书报，并招募一些懂英文的人来翻译。在这些译员的帮助下，林则徐把英文版的《中国丛报》编译为《澳门月报》，并按内容分门别类地编为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另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成果是林则徐主持编译出《四洲志》。此书译自1836年出版的、英国人慕瑞所写的《世界地理大全》。这是一本讲世界知识的新书，书中介绍了世界30多个国家的情况，包括各国的历史沿革、地理风貌、民情风俗、政事官制和刑狱武备等等，并提出了“师敌长技”。

对于了解与介绍外国情况来说，林则徐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初步的，他对外国情况的了解也极不全面，还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尽管如此，他还是开了一个先河，这就是努力了解世界，面向世界。因为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情况茫然无知。道光皇帝的无知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鸦片战争已经进行两年的时候，这位皇帝对入侵者英国的情况还是糊糊涂涂，他向大臣打听：“究竟该国周围地方几许？……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指我国天山以南地区）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同？”。由于投降派的诬陷，林则徐被贬戍新疆伊犁。他依然作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预言。后被皇帝启用，派往南方镇压农民起义，在途中（潮州普宁）病逝。林则徐的遭遇是悲剧性的，但是，他所提出的“师敌长技”的主张却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师敌长技”的前提是承认西方国家有胜于中国的“长技”，这在当时是对封建士大夫头脑中所存在的极为顽固的蔑视外邦思想的大胆突破。

与林则徐同时期的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把林则徐的“师敌长技”思想发扬光大。

魏源（1794～1857）的官位不高，在36岁时才作了内阁中书舍人（在内阁

写文书的小官)，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中了进士，后来官至高邮知洲。1841年6月，被罢职的林则徐途径江苏时与魏源相会。临别时，林把《四洲志》书稿及一些资料交给魏源，郑重相托增补、重修《四洲志》。魏源不负所托，以惊人的毅力，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完成了《四洲志》的增补本——《海国图志》50卷的编撰。此书于1847年增补为60卷，于1852年又增补为100卷。是在《四洲志》基础上，根据当时所能看到的西方人所写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地图及部分科技资料编纂而成。这是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史地、科技知识的著作，堪称当时中国人编纂的介绍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书中对如何学习西方以富国强兵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他在该书序言中明确地说明：此书是“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在这里，他把林则徐的“师敌长技”思想发展为“师夷长技”，这样，向西方学习“长技”的思想就更为明确而全面。同时，随着《海国图志》的传播，这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也得以从狭小的范围走向社会，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

林则徐、魏源提出了“师敌长技”、“师夷长技”的思想，但是，他们都没有条件去实行，把这一思想付诸于大规模实践的是洋务派。

2、洋务运动的兴衰

洋务运动的概念 “洋务运动”在当时称之为“同治中兴”、“同光新政”等。“洋务”一词从“夷务”而来，“夷”是相对于“华夏”而言，古代是对汉族以外周边民族的蔑称，明清以来，“夷”也用于称呼西方国家的白种人。因为他们漂洋过海而来，所以叫做洋人，一切与西方人有关的东西往往带有“洋”字：洋钱、西洋画、洋药、洋葱、洋枪洋炮。第二次鸦片战争中，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日后各式公文，提及大英官民，不得用带有贬义的“夷”字，“夷务”从此逐渐改称“洋务”。20世纪初年的《国民日报》第3集的一篇“社说”称：“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以一名词，曰洋务。”也就是说，晚清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情均可包括在“洋务”之内。后来，把19世纪60~90年代引进枪炮、科技，创办一批近代企业、新式学堂、新式海军等学习西方的运动，称之为洋务运动。

洋务派及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洋务派包括洋务官僚、洋务派思想家、洋务企业的创办管理者，有的人身兼两三方面，他们都是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成员。

洋务官僚，在中央是以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为代表；在地方的代表人物则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等，后期还有张之洞。

洋务思想家有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他们多数是中级官员。

洋务企业家有徐润、唐廷枢、盛宣怀等人，他们也有官员身份。

洋务派的主导人物以湘淮军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他们都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有一定的危机感。如李鸿章说过，由于西方国家的威胁，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鸿章全集》第2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3页。）所以必须找出应对的办法。中央的奕訢、文祥是满族权贵中少有的有一定见识的人物，他们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见解一致，互相配合，形成中央与地方进行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恭亲王奕訢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提出“灭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策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恭亲王奕訢等奏》，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6页。）具体怎么办，奕訢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钦差大臣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441页。）这充分反映了清朝统治集团部分人搞洋务运动的目的，首先在于镇压人民反抗，其次在于应付列强的侵略，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巩固清王朝的统治。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校邠庐抗议》二卷，四十篇，附录七篇。成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最早刻于1883年（光绪九年）包括改科举、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内容。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求得中国之富强。是中国较早的一本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政论集，对洋务派、维新派都有过一定影响。冯桂芬为林则徐的学生。）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换句话说，就是要用西方近代的工艺、科技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地位，把西方

资本主义文明纳入中国封建主义的轨道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设立了同文馆，并按照西洋模式设置了一些由军工产品支撑的军械所和造船厂。这场持续了约35年的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尝试；它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这个时期中较进步的中国人也确信，除了坚船利器之外，中国从西方没有多少东西可学。”（徐中约：《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页。）

洋务运动的背景 洋务运动的国际背景，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出现一场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有着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化方面对东方国家的影响有一系列的论述，如《共产党宣言》谈到，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从世界的范围看，西方的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使世界成为一个彼此相联系的体系，这个体系分为两个部分：西方工业化国家和东方非工业化国家。西方工业国家对东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军事、政治侵略和商品输出，也必然伴随着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推广。这是洋务运动的国际背景。

洋务运动时期的国内形势，从中国的情况看，两次鸦片战争后，在华外国势力不断扩大，中国的海关、外交权被控制，边疆危机不断。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不可能解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物看到，内忧外患依然存在，如果不想办法，清朝不会长治久安。内外形势迫使他们不能不寻找挽救和巩固清朝统治的办法。可以说，洋务运动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力图购买和仿造洋枪、洋炮、船舰等武装自己的原有军政政策和矿务政策合乎逻辑的发展和自然延伸。

在洋务运动实行的19世纪60～90年代，处于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之前，除中法战争以外，没有牵动全局的中外战事，战区也多数不在中国的中心、沿海地区。50～60年代农民斗争大风暴暂时平息后，各类农民起义都是小规模；少数民族起事都在边远地区；湘淮军汉族官僚集团同清王朝达成一种妥协或合作关

系。湘淮军的主要人物获得地方实权，清王朝承认他们的地位；他们在政治上也继续忠于清王朝，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实施者。这个时期国内政治局面相对稳定，使清朝统治集团有实行洋务运动的国内环境。

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以往，因为洋务派首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是地主阶级的当权人物，所以，洋务运动被完全否定。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逐渐有学者把洋务运动放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下审视，认为不能简单否定洋务运动。到了近年，有些学者对洋务运动，以及对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予以溢美的评价，加上有一些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影视作品出版、播放，所以，对洋务运动以及洋务派的看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

洋务派人物也不可一概而论，例如李鸿章在对外问题上多数主张妥协，但左宗棠、张之洞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抗击外国侵略方面却是有贡献的。洋务企业大多由李鸿章控制，所有他在创办近代企业、交通等方面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些都应该予以客观的评价。总之，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来分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作用与地位。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一次尝试，洋务运动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近代中国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人即洋务派，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一次尝试或努力。洋务派搞洋务运动是为了挽救大清王朝。以往我们说洋务派搞军事工业，建新式海陆军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反抗，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但是，也应看到，洋务派这样做也是为了抵御外侮，镇压人民反抗也不一定要购买 7000 多吨的军舰建成舰队，建设海军主要是为了保卫中国海防。洋务运动尽管是部分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倡导的，但我们不能否认它也是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恰如其分地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洋务派所办的军用、民用企业是中国人举办的最早的一批使用机器的近代企业，这些企业引进了一些现代科技、管理方法，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起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办学堂、派留学生等在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也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封建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冲击。

但是，对洋务运动也不能评价过高，它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作用有两重性：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阻碍的一面，而且到了后期，阻碍是主要的方面。在洋务运动中办了一批企业，但这些企业带有浓厚的封建衙门色彩，办得成功的不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官府负责保护、扶植，派官员（多为兼官兼商者）监督管理，有时也借垫部分资金，而主要由商人投资认股，商务由商人管理（产、运、销），盈亏由商人承受。官督商办的做法早期有合理性，因为中国封建顽固势力强大，一切新事物都会遭到反对，在中国传统社会，必须利用官府的权威才能减少阻力。如果没有大官僚李鸿章等人的提倡、支持和批准，新式企业无法取得合法地位，资金、用地的困难无法解决，遇到阻力、破坏更无法应付。当时商智未开，商力不足，商人没有官府的出面也不敢投资，因此，这个阶段，不能说“官督”没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到90年代以后，一方面，商智商力已经有明显的进展，不必时时事事靠官府出面；而官府这一方面，提倡、扶持从来都不是无偿的，即使在早期，也大大加重了企业的成本，朝廷、地方官府、官员个人都要谋取利益，越来越多的官员把近代企业作为牟利的新途径，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这样，“官督”的负面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郑观应的长诗《商务叹》有这样的诗句：“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商务叹》，《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70页。）“官督商办”受到商人广泛的反对，就无法再推行下去了。

洋务运动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洋务派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校，但30年间全国才办了20多个，所培养的学生不过几千人，而且，几乎都是技术型的人才。又例如，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标志北洋海军，据说曾经在世界上排第八位、亚洲排第一位，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通常以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教材列举了封建性、依赖性、腐朽性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点封建性是主要的原因。以下再作详细分析。

洋务运动的封建性，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

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对近代中国整个地主阶级作出的，尽管这个阶级会出现个别有作为的人物，但他们也不可能不受地主阶级本质的制约。洋务运动由地主阶级部分当权人物倡导，在对清王朝不作任何根本改革的前提下进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阶级性并没有发生转化，这个时期中国地主阶级也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分化，洋务派和顽固派虽有矛盾和争论，但在维护清王朝统治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反动性和腐朽性便决定了洋务运动的过程和归宿，这不是少数有能力的洋务官僚就能改变的历史命运。

洋务运动封建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洋务派不敢、不愿对清王朝的政治制度做任何的真正的改革。

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必须有一个能够主导现代化的中央政府，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结构，这样才能利用政府的权威，全面推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排除各种阻力。有的事情，表面看来是具体问题，但不实行政治改革是无法解决的。例如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需要大量经费，但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财政制度还是封建王朝的旧模式，经费就无法保证，甚至会被挪用。海军经费被挪用于修颐和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又例如人才培养，如果科举制度不废除，新式教育不可能发展，但废科举本身就是一项带政治性的改革。洋务派坚持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在器物、技能层次学习西方，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这个层次，则不作任何改革。他们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

清朝的政治制度不合世界潮流，洋务派并非毫无察觉。洋务派自身有其局限性。他们有一定抱负，洋务运动是他们理想、功业、实力、地位的保证，但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少同现代企业联系，相反，他们之中的多数就是大官僚大地主，政治改革将会损害他们本人、家族以及小集团的眼前利益。他们都忠于清王朝，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也不会允许洋务派进行任何政治改革。洋务派多数又是科举中人，思想上还保持着封建的三纲五常这一套。支持洋务运动的人物，在整个官僚体制、整个士大夫阶层中，并不占优势。洋务派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各方面同清王朝整个统治集团，同整个地主阶级是一致的，这是洋务派不敢、不愿对清王朝的政治制度作任何的真正的改革的最根本的原因。

洋务运动的依赖性，以往有些学者把洋务企业重用洋员、借洋债、依靠外国设备技术、任用一批买办来管理，作为洋务派勾结外国以及洋务运动“买办性”依据，说服力似乎不足。所以，教材没有用“买办性”这个概念，而用“依赖性”。主要是在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洋务派不敢、不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不敢。不能坚决抵抗外国侵略，一味迷信所谓“国际公法”，希望用妥协换取清朝统治的苟安。洋务派所办的企业、学堂、海陆军，在设备、装备、技术、管理、训练等方面都要依赖外国人。李鸿章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对清朝外交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曾经幻想借助俄国的力量抵御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但结果却使中国失去了更多权益。洋务运动搞了 30 年，中国半殖民地化反而加深了。

洋务运动的腐朽性，从根本上来说，也是封建性决定的。洋务派以不改变落后和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前提，开展洋务运动，腐朽性是必然的产物。洋务企业除少数以外，管理仍是封建衙门式的，充斥着任人唯亲、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督办、总办等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一些曾经办得不错的企业，最终也无法维持。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开平矿务局，在唐廷枢主持下，这个煤矿企业一度蒸蒸日上，产销两旺。但在 1892 年唐廷枢去世后，由醇亲王奕诤的私人代理张翼接手。他是靠行贿得到这个职位的，在张翼主持下，开平矿务局每况愈下，几年以后便被英国企业吞并。洋务派创办的新式陆海军和军工企业，也有很多腐败的事例。时人谈到：“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粤东仿制三火小洋枪，民间购买每杆洋银二圆半，而官中报价则每杆银六两……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虽言之太过，实属有因。此等制造既经克扣工本，则工粗料薄，无当实用，可不问而知。”（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 2000 年版，第 289 页。）在这样的腐败风气下，“求强求富”只能是空话。

洋务运动的破产证明，地主阶级一部分人物企图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器物技能以求强求富，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洋务派标榜办洋务是要“自强”、“求富”，然而，洋务运动不仅没有使中国“强”和“富”，甚至也没能够使清王朝免于衰落、灭亡的命运，所以，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专题三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下）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王朝衰退加剧的局势下，实现民族救亡。为此，初登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提出了两种方案，出现了两大政治运动，一个是由康有为领导的 19 世纪 90 年代的维新运动；另一个是由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最终革命运动扫除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府，实现了中国历史划时代的转变。

一、戊戌改良运动

1、早期维新思潮

19 世纪 70 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展开和西学传播的扩大，出现了明确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早期维新派。这是从 70 年代至甲午战争之前所存在的一个进步思想派别，其思想倾向代表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代表人物有三个类型：一是参与洋务运动的官员，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产生维新思想，如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前三位均系清政府赴外官员）；二是去过外国或生活在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目睹资本主义文明，形成维新思想，如容闳、王韬、何启、胡礼垣等；三是从书本或其他方式间接了解资本主义文明而萌生维新思想，如汤震、陈虬、陈炽、宋衡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王韬、容闳等人，这些人除王韬以外都是洋务官员。

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一是反对列强的侵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痛心疾首，急欲改变现状；二是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技术不行，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

早期维新思想刚出现的时候，其提出者受到了封建顽固派的疯狂攻击。典型的例子是郭嵩焘。

郭嵩焘是我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于 1875 年出任清政府驻英国公使。他

在最初的出使日记中如实地介绍了国外的所见所闻，谈了一点观感。此日记寄回国内以《使西纪程》之名出版，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封建顽固派群起而攻之，斥他“离经叛道”，朝廷勒令将此书毁版。他顽固派的不断造谣攻击下，他于1879年奏请销差回国。在湖南老家，他被人视为“汉奸”。1891年，他在封建卫道士的攻击辱骂中郁郁而逝。朝廷拒绝给他按例赐谥。

以上情况说明，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在顽固派思想的包围中，新思想的提出和传播是多么不容易。然而，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早期维新思想终究还是传播了、发展了。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论述、宣传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把改革社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从而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运动作了舆论准备，也可以说是奏响了维新运动的序曲。（可以说是思想舆论准备）

把以西方社会制度改革中国社会付诸实践的是以康有为为领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2、戊戌维新运动

1898年，在民族危机极端深重的时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进行了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这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寻找国家出路的一次探索和奋斗。

康有为在1888年已经开始上书要求变法，但维新派的要求汇合成一场政治运动，是从1895年后的“公车上书”开始的。几年间，维新派不断上书光绪皇帝，游说各级官员；同时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和舆论；组织学会、创办学堂、出版报刊作为宣传维新主张的阵地，同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派开展论战。1898年6月，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了一系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推行改革的政令。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们的抵制，它们大多未能付诸实施。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的守旧势力力图对维新派进行反击和镇压，经过密谋策划，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新“垂帘听政”，囚禁了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国外。谭嗣同等人被杀害。“百日维新”很快就失败了。（过程可以略讲。康有为等人当年出于种种考虑，曾经对有关戊戌变法的史料作过加工、改写，顽固势力方面也有伪造史

料的情况，甚至一些被广为引用的资料也有虚假不实的内容。近一二十年，国内外有学者进行研究考证，弄清了很多史实。例如，有学者考证后指出，康有为后来编辑出版的《戊戌奏稿》，对原来进呈光绪皇帝的上书原件，在许多地方作了原则性的改动，我们不能依据康有为日后所编的文集，对康有为当时的思想和主张作出评价。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此外对戊戌维新有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对以往一些论点提出不同看法。如“公车上书”、“戊戌政变”都有不少新的考证和争论。例如茅海建的专著《戊戌变法史事考》，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茅海建的论文《“公车上书”考证补》，《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3、4 期，房德邻的论文《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1、2 期。）

3、维新运动的背景

经济背景——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据统计，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到 1898 年，在工矿、航运、新式金融等行业的商办近代企业有 250 家（多数是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设立的）。其中，可以知道具体投资资金的 189 家企业的总投资额有 2844 万多元。（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85～528 页“历年所设本国民用工矿、航运及新式金融企业一览表 1840～1927 年”。列入该表的新式工矿企业创办资本额都在 1 万元以上，新式金融业创办资本额在 5 万元以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重要变化的标志。这些近代企业，主要由一些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投资而来。此外，在通商口岸出现了一些新式的商业、手工业，或者原来的手工业企业采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这样，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新兴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在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几乎没有人投资近代企业，同工商界的联系也不多，就个人的身份来说，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人物多数是有科举功名的士大夫（所以有人称维新知识分子）或清朝的中下级官员，为什么说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呢？

马克思在谈到 19 世纪 40～50 年代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时候指出：“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和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

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打击，又受到中国的封建主义的压制与摧残，所以，新兴的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困难重重。民族资产阶级迫切希望中国独立富强，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提供条件。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而维新派通过接受西方的政治学说，提出了变法理论和主张，并为此进行宣传和政治活动，这首先就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所以，他们就成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辛亥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把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称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应如此理解。也有人称共和知识分子。）

政治背景——民族危机加深 康有为曾经这样描述中国面临的危机：“俄北瞰，英西睽，法南隣，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有十余国。”“吾中国四万万人民，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237页。）这也是当时国内有识之士的共识。1895年春，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当时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痛心疾首，纷纷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这次上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从此，维新派的活动开始汇聚成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1897年11月，蓄谋已久的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悍然侵占山东胶州湾，清廷不敢抵抗。俄国趁机派舰侵占了旅顺、大连。次年，清廷被迫同意德国“租借”胶州湾、俄国“租借”旅大。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纷纷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在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康有为立即上书光绪皇帝，指出德国强据胶州湾之后，“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

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瓜分豆剖，渐露机牙”；他还警告光绪皇帝，如果不立即变法图强，亡国之祸就不可避免，“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上清帝第五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 2000 年版，第 188～190 页。）在清朝，用这样质直的语言上书皇帝需要很大的勇气。光绪皇帝终于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各地的维新派政治组织如雨后春笋。1898 年 6 月，光绪皇帝着手变法，维新运动进入高潮。从戊戌维新运动兴起以及变法的启动过程，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正是因为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才使弱小的、不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迅速登上政治舞台。

文化背景见早期维新派的主张。

戊戌变法的内容见教材和课件。

4、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

为什么说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以往有些论著，称戊戌维新是一场“改良主义运动”。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改良主义”指欧洲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潮和政治流派。列宁曾经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派时说过，“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改良主义，即使是非常真诚的改良主义，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和剥削工人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7 页。）然而，戊戌维新是新兴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一场斗争，与欧洲的改良主义不可相提并论，所以，教材没有采用“改良主义”的提法。

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主要是因为：

第一，这场政治运动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其进步意义后面将作分析。

第二，维新派不赞成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清王朝，要求在保留清王朝的前提下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百日维新”时期颁布的法令也并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

第三，“改良”是相对于“革命”而言的。虽然戊戌维新运动带有改变旧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但维新派不主张以暴力的手段去改变它，反对自下而上的“乱

民”暴动，对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是抵制的。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坚持改良道路，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的阻力。

以往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1939年，毛泽东说过：“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564页。）1949年，他又说过：“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毛泽东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着眼，对戊戌维新和维新派的进步性是肯定的。到了20世纪60—70年代，戊戌维新运动一度被全盘否定，“十年动乱”期间，康有为的坟墓也被红卫兵挖了出来。但在改革开放之后，戊戌维新运动重新得到肯定评价，对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也取得很多新成果。教材从爱国救亡运动、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三个方面说明。（见教材）

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也应该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角度来理解：

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挽救国家危亡的政治运动 康有为等人希望通过这场运动使中国富强，免受外国欺凌，因此，这场运动带有反帝爱国性质。戊戌维新运动又是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康有为等人要求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宣传近代科学和资产阶级文化，因此，它带有反封建的性质。这是我们肯定戊戌维新运动的最主要的原因。

可以把戊戌维新和洋务运动加以比较。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不同。洋务派不愿、不敢对清王朝的政治制度进行任何实质性的变革，办洋务也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但戊戌维新却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樊篱，提出了变革清王朝政治制度的要求，而且付诸实践，维新派最终的主张，是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

度。所以，我们说洋务运动代表地主阶级一部分当权派的利益和要求，而戊戌维新则是一场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冲击了封建主义。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使清王朝“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重要政治事件。

戊戌维新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应该特别强调戊戌维新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意义，维新派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从而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文化的其他领域，由于维新派的推动，“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等人身体力行，掀起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如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

维新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促进 维新运动对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促进作用。尽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阻力，但他们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工作，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种，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觉醒，其中不少人后来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当然，这并非维新派的初衷，但却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特别是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头两三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已经开始进行反清革命，但他们的宣传工作在全国的影响不大，因此，维新派的启蒙工作更显得重要。维新运动的失败也使大批爱国志士明白清王朝无法进行和平改革，从而放弃改良的道路而转向革命。章太炎就是一个典型，章太炎曾加入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参与梁启超创办的《时务

报》的撰述，赞同康、梁的变法维新主张。戊戌变法的失败激起了章太炎对政治改良的怀疑，不久，他就和维新派决裂，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陈旭麓：《章太炎》，《民国人物传》第2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7～279页。）

5、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

新旧力量对比悬殊 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民族资本主义才得到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力量非常弱小。其政治代表维新派的社会基础薄弱，只是一度得到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的支持，他们不掌握军队，不掌握整个官僚机构，没有严密的组织，他们面对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多数官僚属于守旧阵营，只有少数同情维新运动。百日维新开始，慈禧太后就迫使光绪罢免同情维新运动的“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驱逐回籍，使变法阵营受到沉重打击。对光绪皇帝的变法谕旨，在高级官员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执行，中央的高官和其他各省的督抚均采取观望敷衍甚至抵制的态度。全国数以十万计的举人、秀才绝大多数都站在守旧势力一边。掌握实力的洋务派官僚也与维新派为敌。如张之洞就在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时写了《劝学篇》，坚持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反对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反对维新派兴民权、设议院等主张。1900年，当康有为打算发动“自立军”，采取武力“勤王”时，曾幻想争取张之洞，张之洞却予以残酷镇压，捕杀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人。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是维新运动失败的客观原因。

从维新派方面的主观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妥协性 维新派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但对帝国主义却充满幻想。今天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维新派深刻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但问题在于维新派的一些认识，即使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也显得非常不切实际。他们谈到民族危机时，通常着重强调原因在于中国不能振作，他们以为只要中国振作，外国就不会轻视中国，就会同意修改不平等条约。维新派为了对抗李鸿章的亲俄政策，提出要联合俄国的对手日本和日本的盟国英国。（可参看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7～80页。）他们甚至要请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说服慈禧太后支持变法，还打算聘请伊藤博文为变法的顾问。在守旧派发动政变时，维新派又幻想英国、美国、日本干预。帝国主义国家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帮助维新派，但如果它们真的

接受了维新派的要求，对中国来说肯定只能是一场新的灾难。

维新派对封建主义的妥协，反映在不敢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不敢触动封建主义的根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不敢否定封建思想的权威孔子，等等。政治上，维新派过分迷信皇帝的权威，希望完全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光绪皇帝决心变法，应该肯定，但他的目标与维新派仍是有区别的。维新派在鼓吹变法时曾经提出过设立议院、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等主张，但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们并没有坚持这些主张，主要还是考虑光绪皇帝的态度。维新派的理论基础也十分薄弱，康有为的西学知识，一方面从游历香港、上海的观察而来，一方面则是来自《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以及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介绍西方政治、社会的译本。他写的《孔子改制考》虚构一个“改制”的孔子，力图把孔子改造成变法的祖师，在学术上缺乏依据，也反映出维新派在思想文化上的局限性。

惧怕人民群众 维新派本身多数人也还兼有地主、官僚、士绅的身份，同工农群众是天然隔膜的。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书中一再提醒要注意防备陈胜、吴广以及太平天国这类民众造反，充分反映了维新派对下层群众的态度。戊戌维新始终只是少数人进行的政治运动，不仅工农群众，就是城市的资产阶级以及一般知识分子，参加的人也非常少。等到守旧派要向维新派进攻时，维新派就极端孤立。谭嗣同慷慨就义前引颈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临终语》，《谭嗣同全集》（增补本）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87 页。）表现了他为改革维新以死相拼、勇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但也反映了维新派的孤立与无奈。“回天之力”即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存在于亿万民众之中，这是维新派的志士们所没有认识到的。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

戊戌维新失败后，一些维新人士醒悟，转向了革命。而康有为等人则逐步走向保守一面，他们组织了保皇会，抗拒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继承了太平天国的传统，吸取了戊戌维新失败的教训，更坚定

地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

二、辛亥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巨变，就是因为它是一场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具有无可辩驳的进步性。它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有限的，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方案不能救中国，这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历史经验。

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近年来，以“重新评价”、“理性思考”为名，某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提出“告别革命”论。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如果没有孙中山提倡的暴力革命，走康梁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

近代中国革命不是也不可能只凭少数人的情感冲动就能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只凭某个阶级和政党的意志就能发动起来的。中外历史上无数次的革命证明，革命的发生，除去革命阶级的主观条件外，必须具有革命形势，革命的社会需要。列宁指出：“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辛亥革命的发生发展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民族危机的加深 《辛丑条约》订立后，列强采取“以华治华”政策，利用清政府作为其统治中国的工具。但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没有丝毫减弱，1904~1905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发生了日俄战争，这是两个列强争夺我国东北领土的帝国主义战争。清政府不顾国家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将辽河以东划为战场，自守“局外中立”。战争结果，日本战胜俄国，双方订立《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我国旅顺、大连租借地及相关权益转让日本，沙俄势力退到东三省北部。这期间，英国于1903~1904年发动了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阴谋分裂中国领土，而沙俄也想出兵控制西藏，我国边疆危机又一次显现。

20世纪初，列强对华经济侵略进一步扩张。除输出商品外，还争相在华投资设厂，夺取修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据估计，1895~1914年，各国在中

国设立的工矿企业 130 家，新设银行 13 家共 85 个分支机构，直接投资修筑了中东、胶济、滇越、南满、广九等铁路。1894 年外国在华企业投资 1.09 亿美元，1914 年达到 9.61 亿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0、527 页。）铁路投资成为列强在华投资的重点，到 1914 年，列强的铁路直接投资约 2.92 亿美元，筑成的铁路 3772 公里。（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2 页。）此外，列强还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的铁路。1902 年以前列强借给中国的铁路借款不过 4800 多万美元，1903～1914 年间就达 2.05 亿美元。（吴永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8 页。）投资铁路不仅包括修路权，而且还包括对铁路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甚至还囊括了对铁路沿线矿产的开采权。不仅如此，各国在修路过程中还千方百计扩大权益。如俄国在修筑东北铁路时，以枕木需要木料为由，取得了 24.5 万平方公里内森林的采伐权，平均每年采伐木材约值 1 亿银元。1908 年，俄国经营的中东铁路公司还在哈尔滨策划成立“自治会”，公然规定各国侨民须向“自治会”纳税，其辖区内中国居民要尽纳税义务，实际是一个非法的殖民机构。日本《朝日新闻》曾说：“铁路所布，即权利所及。凡其他之权，商权、矿权、交通权，左之右之，存之亡之，操纵于铁路两轨，莫敢谁何。故夫铁道者，犹人之血管机关也，死生存亡系之。有铁路权，即有一切之权；有一切权，则凡其地官吏，皆我颐之奴，其地之民，皆我刀俎之肉。”（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 2 册，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684 页。）在矿山方面，到 1913 年，列强在中国所设立的采矿企业 32 家，设立资本 4996.9 万元。列强控制了全部铁矿的开采，控制了煤矿机器开采量的 80% 左右。（据统计，1913 年全国煤产量 760 多万吨，而外资控制的开滦、福公司、抚顺、本溪湖、山东华德、井径、临城七大煤矿的产量就达 602 万吨。（见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5 页。）

清政府的新政与统治危机 辛亥革命酝酿之际，也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1 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当时有人痛斥清政府道：“夫政府者何物也？非一般同胞组织一高等机关，捍圉土地财产生命计乎？乃政府自庚子、甲午之后，蔑外之手段变为媚外之手段，将十八省之路权、矿权、邮

权、森林、航海诸权，直接间接，掬而送之列强之手。”“试一披支那颜色图，莽莽大陆，容有一片干净土也？是各国政府为捍圉扩张土地财产之政府，而中国政府为断送土地、财产之政府也。”（不白：《警告同胞勿受要求立宪者之毒论》，《河南》第5期，第34页。）

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新设了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颁布了新的学制，还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新政只是洋务运动的延续和发展。慈禧太后强调要“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强调新政的原则是“三纲五常”。（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1页。）这说明，新政并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因此很多人都认为“新政不新”。当时有报纸评论道：“新政”是“以貌不以心新，以浮不以实新，以外不以内新，以伪不以真始”，（《汇报》1903年5月9日，第675号，第5册，第598页。）各种不满之声日益增多。

当时的国内，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武装起义开始发展，另一方面1904年在中国东北发生了日俄战争。一些官僚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认为，日胜俄败的结局正表明了立宪国对专制国的胜利。他们把立宪看做能够阻止革命的法宝，一时之间，要求立宪的呼声越来越高。

迫于内外各种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确定了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还规定了九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但预备立宪没能挽救清王朝，相反却激化了矛盾，加重了危机。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延续其统治。正如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减轻”、“内乱可再弭”。这成为清政府立宪的指导原则，也决定它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会轻易放弃已有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用武力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不断借改革之名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尤其是摄政王载洋上台后，更是亲任海陆军大元帅，还任命自己的两个兄弟亲掌军权，并力图收回地方总督、巡抚的军权和财权。1911

年5月在形势所迫之下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有9人，其中皇族占7人，被社会讥为“皇族内阁”。种种事实表明，清政府没有立宪的诚意。它的所作所为，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和一部分官僚转向共和革命，这是重要因素。

辛亥革命的前夜，整个社会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辛丑条约》规定的4.5亿两战争赔款，加上利息，清政府每年需偿还2200余万两。此外还有外债的偿还，1900~1911年，清政府举借的外债高达3.4亿两，其中铁路借款占76.86%，财政军火借款占14.66%。（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90页；周育民：《清末财政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再加上练兵等“新政”的开展，财政开支急剧增长。1903年清政府财政收入10492万两，支出13492万两，亏空3000万两，赤字比1900年以前增加一倍以上。1910年度支部制订的宣统三年财政预算收入296962719两，支出338652272两，亏空达4169万两。（周育民：《清末财政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页。）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把大量赔款、偿还外债的负担分摊到各省，这样就扩大了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清政府还不断加捐加税，除田赋、厘金、盐课等旧税一再追加外，各种巧立名目的新税层出不穷，致使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当时梁启超有一篇文章写道：“中国亡征万千，而其病已中于膏肓，且其祸已迫于眉睫者，则国民生计之困苦是已。盖就国家一方面论之，万事皆有可补救，而独至举国资本涸竭，驯至演成国家破产之惨剧，则无复可补救。所谓四海固穷，天禄永终，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也。就个人一方面论之，万事皆可忍受，而独至于饥寒迫肌肤，死期在旦夕，则无复可忍受。所谓铤而走险，急何能择，虽有良善，未有不穷而思滥者也。呜呼，今日中国之现象当之矣。”（沧江：《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国风报》第1年第11期。）

人民群众的反抗与社会矛盾的尖锐 20世纪头10年，伴随着新政、预备立宪的进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被统治者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革命成了历史不得不作出的必然选择。

20世纪初，一个轰轰烈烈的收回铁路、矿山利权的运动开展起来。湖南、

湖北、广东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1905年，美国迫于压力，于9月6日同清政府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清政府付出675万美元的赎款将粤汉铁路赎回。之后，三省人民分别成立铁路公司，筹集资金，分段修筑铁路。

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迫于苏浙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宣统三年与英国银行公司协议，将苏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江浙人民终于争得了商办苏杭甬铁路的胜利。同时，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四川人民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争得了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津镇铁路和云南人民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

与收回路权斗争遥相呼应，收回矿权的斗争于1905年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斗争首先发生在山西。经过艰苦斗争，1908年福公司被迫同意与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山西绅民以275万两的代价赎回福公司凭一纸合同所攫得的山西矿权。次年，奉天（今辽宁）人民收回锦西煤矿，安徽人民收回铜官山等处矿权、山东人民收回峰县煤矿。此后，四川人民为收回江北厅矿权、湖南人民为收回醴陵锑矿，河南人民为抵制福公司掠夺矿权以及辽宁人民为收回都鲁河及吉拉林沙金矿权，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皇族内阁”成立后，清廷以“上谕”形式宣布铁路干线“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接着和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原来由各省铁路公司商办的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激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保路风潮，其中四川的反抗风潮尤为炽烈。处于领导地位的立宪派本来打算把斗争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然而，清政府却诱捕了立宪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新政大大增加了财政支出，清政府将各种新政费用转嫁到人民身上，各种

“捐税”、“摊派”多如牛毛。加上官吏豪绅借此谋私勒索，使下层民众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加重了负担，各种抗捐抗税的民变风起云涌。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为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

次，1910年则达到266次。（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参加这些斗争的主要是农民和城镇下层群众，他们有的以罢市、抗交捐税为斗争手段；有的还发展成武装暴动。1910年山东莱阳人民的抗捐税斗争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次斗争中，群众冲进县衙，提出悉免杂捐、清查积谷、革除劣绅和不许巡警出城鱼肉乡里等要求，官府不仅拒绝，还派兵前来镇压。愤怒的群众聚集起来，与官兵发生冲突。在这一斗争中被杀的乡民千余人。

除此之外，遍布各地的抢米风潮也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清朝末年，由于政府搜刮、地主盘剥、天灾等因，人民颠沛流离、陷于绝望，为求生存，被迫聚众抢米和“吃大户”。据统计，辛亥革命前10年间，由于饥民抢米导致的风潮总数在150次以上，单1910年就发生了50余起，遍及南北各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1909年湖南澧州等地遭受水灾，长沙等地则遭受旱灾，而此时奸商却不断运米出湘，导致长沙米价飞涨，百姓困苦无法生活。1910年4月，长沙饥民要求减价粃米，巡抚调兵镇压，打死数十人。激愤的群众捣毁米店，举行罢市，还放火烧毁了巡抚衙门。群众暴动尽管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是却引起举国震动，使人们对清政府的痛恨进一步加深了。

在反抗中外势力的斗争中，各地会党也纷纷起义，其中声势较大的有1903年广西各地的会党起义。清政府调集湖北等省兵力，历时两年，耗费三百余万，才把起义镇压下去。此外，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义和团余众继续坚持斗争。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发动罢工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05年到1911年，规模较大的罢工斗争有55次，显示了自身的力量。

此起彼伏的民众斗争表达了人们对清王朝的不满和愤怒，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孙中山曾满怀信心地说：“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夜，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47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发展的原因，一是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设厂热潮的到来；二是这一时期清政府也调整了经济政策，允许和奖励民间设厂，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据统计，1895~1913 年设立的资本在 1 万元以下的厂矿，共计有 549 家，资本额总计 12028.8 万元。同 1872~1894 年比，厂矿数和资本额都增大了六倍。（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5 页。）除了数量增加外，民族资本投资的范围也扩大了。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织、火柴业外，还投资烟草、肥皂、电灯、玻璃等行业，并出现了一批同时投资于几个行业或拥有较雄厚资金的上层资本家。如南通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起家，直接创办参加投资的企业已达 27 个；资本额累计 4500 多万元，范围包括纺织、面粉、榨油、垦牧、轮船、肥皂、盐业、渔业、瓷业、电灯。浙江人严信厚，由盐务起家，后又办轧花、纱厂、面粉厂、通商银行等，资本 800 多万元。江苏东海沈云沛，资本 400 多万元。武汉有宋炜臣，经营水电公司、汉口燮昌火柴厂等 8 个厂矿。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发展，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发展是非常困难的。它们仍然存在着资金少、规模小、设备不全、技术落后等弱点。1895~1913 年间开设的 549 家企业中，资本在 10 万元以下的 303 家，占总数的 55.3%。而同期新增的 136 家外国在华厂矿中，129 家的资本都在 10 万元以上。1913 年，英国劫夺的开滦煤矿资本额达到 2063 万元，而中国所有 41 家煤矿的总资本额只有 1410 万元。就设备和技术而言，1912 年全国使用原动力的工厂仅有 363 家，全部原动力（包括蒸汽机和电机等）不过 24544 匹马力，平均每家只有 67.6 马力。这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很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进行的。（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1 页。）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在增长，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1904 年以后，各地民族工商业者纷纷组织商会，与此同时，在拒法运动、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保路风潮、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中，资产阶级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西方列强侵入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商人、官

僚、地主、买办转化而来，他们虽然有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即便是到了 20 世纪初年，他们仍然没有发展到能够独立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反帝反封建要求必然要由其政治代言人来表达。

历史进入 20 世纪初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支引人注目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个群体的出现主要有两个途径：兴办学堂、奖励留学。新学堂于 1901 年后陆续开设，1904 年清政府进行学制改革，颁布《癸卯学制》，建立了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学堂的新学制体系。到 1910 年，全国兴办的各类学堂 42444 所，1911 年增至 52500 所。（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二），第 8634 页；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73 页。）从 1898 年开始，湖北、江苏、浙江、直隶等省开始派学生到日本学习，有六七十人。20 世纪初留日学生迅速增加，1903 年达 1300 余人。1905～1906 年间增至 8000 余人。此外，还有部分青年留学欧美。（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76 页。）

这些人接受了西方教育，因而具有了与封建士大夫完全不同的特点。他们观察世界的世界观是进化观；在价值取向上，他们以美、法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许多人以孟德斯鸠、卢梭、罗伯斯庇尔、华盛顿自诩，以国家大事为己任。他们的眼界比较开阔，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民族危机有着深刻的体会，对前途充满信心。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社会地位较低，因此，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慨和不满。正因为有这些特点，使他们成为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认识这些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主要是通过不同的信念和趋向，反映某个阶级、阶层和利益和意愿，用自己的知识为这个阶级、阶层服务。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纲领、思想，以及他们的社会实践都代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派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并不是每一个资本家都能够深刻理解革命派思想和纲领的。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提法，着眼于防止贫富差别悬殊太大，并不能得到大多数资本家的认同。再加上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比

较弱小，大多数资本家都希望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能够在稳定的环境中发展资本主义，所以对革命党人的激进做法采取抵制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就使当时大多数资本家，在政治上表现出拥护和参与立宪运动的倾向，而对革命的支持却很不够。这深刻地说明，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十分薄弱的，这种状况将深刻地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2、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

孙中山 1866 年 11 月 12 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名文，字德明，号逸仙（日新的粤语谐音，出自《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表示不断更新之意。）1897 年孙中山到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住宿登记时，日本友人平山周代其写化名“中山”，孙接过笔加上“樵”字，并说“是中国山樵之意也。”以后，以中山著称于世。贫寒的家庭，使他从小备尝艰辛，从而对农民的痛苦充满了同情。10 岁时入私塾读书，1878 年 12 岁时被哥哥孙眉接到檀香山。孙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讲到“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 47 页。入意奥兰尼书院读书（教会学校），开始接受资本主义教育。这些教育，使他朦胧地产生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他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孙中山：《非学问无以建设》，黄彦编：《孙文选集》中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04 页。）但怎样才能改良祖国？孙中山当时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在檀香山，因表现出倾向基督教，引起哥哥不满，将其送回国内。1884 年，他到香港求学，1886 年开始学医，先入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习，后转入西医书院。

民族危机的加深，使孙中山逐渐产生反清革命思想。他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4 页。）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如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常在一起谈论革命，人称“四大寇”。当时孙中山虽有革命思想，但毕竟只是“革命言论之时代”，还不是实际地从事革命。随着国内维新改良思潮的发展，孙中山与维新人物也多有接触。何启是香港西医书院的创办人，也是孙中山的老师；郑观应是孙中山的同乡，孙、郑曾通过信，郑编的《盛世危言》中就收了孙中山

所写的《农功》一文。由此看来，孙中山也受到维新改良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1894年2月，孙中山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提出“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也就是要改良教育制度、选拔人才；发展农业生产力，改良耕作方法，提倡农业科学；采用机器生产；振兴交通运输事业，扩大国内商品市场。孙中山说，这几条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年版，第8～18页。）

上书写成后，孙中山与同乡陆皓东到上海，找郑观应介绍给李鸿章的两位幕僚，6月到天津投书。当时中日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借口军务匆忙，拒绝延见，这对孙来说，是一盆冷水。而在北上京津的过程中，他发现清朝的腐败比他原先了解的要严重得多，这时他确信“和平方法，无可复施，”改良的路走不通，决定采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对孙中山的这一经历及其思想转变，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1册，第28页。）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最初入会者20余人。在孙中山起草的章程中，宣布兴中会的宗旨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在入会秘密誓词里，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檀香山兴中会可查的126人中，华侨资产阶级有80人，其他有工人、职员、教师、记者，说明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诞生。1895年春，孙中山到达香港，成立香港兴中会。

兴中会成立后，并筹划重阳节在广州举行起义。他们相继建立秘密据点数十处，在防营、水师和会党、游勇、绿林中进行策反及联络活动。由于事机不密，计划泄漏，清朝官员四处搜捕，孙中山逃离广州，东渡日本。

20世纪初，新兴知识分子创办报刊，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倡言革命，

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发展。

1903年，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文8000余字，针对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所散布的保皇立宪主张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针对改良派攻击革命将招致流血牺牲的观点，章炳麟从历史上论证，人民要争得政治上的权利，流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说：“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革命是开启民智的良药。他驳斥了“革命只会引起社会紊乱”的观点，说明革命不只是破坏，也是建设：“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3、204页。）文章旁征博引，笔锋犀利，充满民主革命精神，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

《革命军》的作者是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重庆巴县人。该书约两万字，分为七章。邹容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革命”是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他疾呼：“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还揭露了清政府对国人的压迫和屠戮，分析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明确宣布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即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邹容：《革命军》，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68页。）1903年5月，《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由于此书文字犀利，说理透彻，情感丰富，很快风行海内外。鲁迅先生后来在回忆中称：“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8页。）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猛回头》、《警世钟》是其代表作。在这两部书中，他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及清王朝的走狗本质，描述了祖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境况，指出“于今好比火线相连，只要一处放火，就四处响应，遍中国二十二行省，都如天崩地坼一般，没有一块干净土了。”他强调，帝国主义“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的势力圈内，丝毫不准我们自由”；“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指出了中华民族危机的极端严重性。他还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的“保全主义”、“门户开放”是用“文明手段”进行“无形瓜分”；指出它比“野蛮手段”和“有形瓜分”更为阴险、毒辣和巧妙。他无情地揭露清政府的卖国嘴脸，将其斥为外国侵略者的“守土长官”、“奴隶总管”，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对这样的政府，“除革去卖国之旧政府，建设救国之新政府外，其道未由”，再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陈天华：《警世钟》，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8—279页。）

陈天华的文字一字一泪，深刻感人，学生读之“如同着迷”，兵士读之“即奉为至宝”，“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这两本著作，成为宣传民主革命的锐利武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重要内容是排满革命思想。“排满”是一个古老的口号，明末清初就有人提出。但在以前，它曾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口号，也曾是农民号召群众的旗帜。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举起了这面旧旗帜进行反清斗争。他们“排满”的矛头是指向封建专制制度的。章太炎说：“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章太炎：《排满平议》，《民报》第21号；张楠、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2页。）他们还把“排满”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即建立民族的统一国家；并把排满与反帝联系在一起：朝廷是外国人的政府，“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他们的“排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奴才。正是这些新的内容，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排满”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满汉矛盾的局限，超出了狭隘民族主义的范围。他们的反满宣传，加速了清政府的瓦解过程，吸引了一定

的群众。但这个口号又容易滋长种族主义情绪，模糊了斗争方向，把一切仇恨简单地集中到满族统治者身上，清政府一旦倒台，革命势力跟着迅速解体，这是原因之一。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建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十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也为全国统一革命团体的创建及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3、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纲领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为什么同盟会会在1905年成立？

首先，20世纪初进步知识分子组党的要求日益迫切。《浙江潮》第三期发表文章，主张消除地域界限，建立联合统一团体；《江苏》则提出要“结大群”。这说明，联合斗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其次，在主观方面，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条件也基本具备。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在思想、组织上为建立全国性政党提供了一定基础。1905年上半年，由于起义失败，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领导人 and 骨干分子相继逃到东京。他们鼓吹革命，联络同志，“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中坚”。（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6页。）但建立统一政党，还需要革命领袖。

在这个时期，孙中山也在思索，从兴中会成立到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六年时间过去了，但革命进展不大，这是什么原因？起初孙中山曾片面地归咎于缺少军火，认为“只要获得相当数量的军器武装起来并尽力准备，就能很容易把清朝军队击溃。”（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但在实践中，他改变了这种看法。1903年左右，孙中山提出革命需要“招集同志，合成大团”，（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开始为建立政党做准备。如何建立党？孙中山认为兴中会不行，因为通过惠州起义，兴中会的弱点暴露出来，它是狭隘的、地域性的小团体，难以领导全国的运动，孙中山着眼于建立一个具有较广泛社会基础和更明确的政治纲领的党。1900～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在欧洲、日本等地广泛结交留学生和华侨，讨论革命的方针、政策。1903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建立

“革命军事学校”，第一次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这个纲领的提出，代表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表明孙中山比他同时代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使他逐渐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公认的领袖。

1905年夏，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立即在各革命团体中做联络工作。8月13日，留日学生召开大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作了题为《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受到热烈欢迎。陈天华称孙中山“是吾四万多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有的人听了演说后表示：无论如何要革命，要参加革命党，大不了把官费退还回去。（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6页。）8月20日，召开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成员一百余人，包括14个省籍的人士。会上通过黄兴起草的会章，孙中山被公举为总理，黄兴被指定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主持总部工作。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本部是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它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机构，分执行、评议、司法三部。评议部的评议员、司法部职员和最高领导人由选举产生，执行部权力最重，其职员由总理指定。同盟会在国内设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省设分会。到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前，国内约设立分会组织20余个。

如何认识三民主义？

同盟会成立后，决定将原来宋教仁所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移交给同盟会总部，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其主要内容为：

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它包括三层意思：一是反满，也就是推翻清朝政府。《军政府宣言》说：“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明确表示要武装夺取政权。二是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即“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

中国人任之”，（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其中包涵摆脱外来压迫的民族独立意思。对于“反满”问题，孙中山明确地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4页。）“我国民要脱满洲政府束缚，要将满洲政府所有压制人民之手段，专制不平之政治，暴虐残忍之刑罚，勒派加抽之苛捐及满洲政府所纵容之虎狼官吏，一切扫除。”（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安民布告》，《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0页。）也就是结束清王朝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政策。三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国内民族平等的进步思想。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提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5页。）这一思想后来发展成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思想。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民。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把排满与反对君主专制结合起来，把推翻清朝统治与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结合起来，指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目标，在当时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阻碍中国国家独立的最主要的危险。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必须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但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却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幻想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在华权益的条件下建立民国，这一局限必将影响整个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也是纲领的核心。

孙中山把民权主义作为政治革命的根本，并认为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

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革命分做两次去做。”（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4页。）

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国政府。《军政府宣言》描绘了民国的基本内容：“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直言》，《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其中“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是指导思想，也就是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

孙中山还把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分成三期：“军法之治”，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为期三年；“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为期六年；“宪法之治”，即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298页。）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是“三权分立”。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则在三权之外又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成为“五权分立”。孙中山提出五权分立，是由于他看到西方三权分立在实践中所产生的流弊，如选举和委任中的营私舞弊；议院滥用监督权，造成“议院专制”。所以他借鉴中国古代官制的经验，把考试权从行政中分出，把监察权从议院中分出，使五权各自独立，互相牵制，以保证政府机器的运转。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指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结束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国，这代表了当时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正如列宁所说，三民主义“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或者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但民权主义也是有局限的。孙中山一方面注意到要使人民享有民权，另一方面又对人民能否享有民权表示怀疑。在他的制度设计中，无论是军政时期、约

法时期，还是五权宪法中的“政权”与“治权”区分，都包含了要由“先知先觉”者掌握治权，以教育启发“后知后觉”、“不知不觉”者的思想。（孙中山的“三等知觉论”：孙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个等次，第一等是帝王将相、革命领袖，为先知先觉者；第二等是地方官吏，为后知后觉；第三等是广大的老百姓，为不知不觉。）这样，在实践中，就很容易使人民的主权落空。这种严重轻视和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使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民主革命实践难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与支持。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孙中山主张：“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7页。）并认为实行了此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从而实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

其思想来源是美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学说。其中心就是国家通过向土地征收单一的地价税，使地租转交给国家。通过这种办法，限制以致取消土地私有权，从而达到土地国有。乔治的理论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针对土地垄断现象提出的。乔治认为土地垄断是贫穷和不幸的根源，因而想通过把地主的地租作为国税征收达到土地国有。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后到达日本、欧美。在欧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矛盾，看到贫富悬殊现象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他试图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既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悬殊现象，避免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看到乔治理论，他很快认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13页。）

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现象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孙中山还看不到这一点，只想用土地国有来避免社会革命，从现实看，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在当时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占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是农民，他们的要求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分得土地，而孙中山讲的则主要是城市土地问题，主要是针对香港、上海等地“地价一

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情况，而不是广大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所以“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这也决定了他们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动员广大的农民。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与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力图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追求民族独立及民主的良好愿望。它坚决与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思想划清了界限，明确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目标，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均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即与黄兴等人制定《革命方略》，明确提出了武装反清的基本方针。此后一直到武昌起义前，同盟会或其他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发动了十余次武装起义，包括1906年12月的萍洲难起义；1907～1908年孙中山在南中国边境地区先后发动的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还有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等。不断爆发的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气，促进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也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积累了因素。正如孙中山在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后所赞誉的：“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孙中山：《继承先烈遗志为国奋斗——邹鲁编（黄花岗烈士事略）序》，黄彦编：《孙文选集》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但这些起义都失败了，客观原因是敌我力量的悬殊；从革命党人方面来看，则表现为军事冒险主义。多次起义都是以一支敢死队突袭一个战略据点，以企图侥幸成功的方式进行。这种军事冒险主义使他们与群众隔离。黄花岗起义虽然准备周密，但仍没有做艰苦的发动群众工作，只是寄希望于敢死队的侥幸成功。原来指望起义主要力量的新军，基本没有参加，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陈炯明，见敌我力量悬殊，不仅不肯发动，还临阵脱逃。

革命党领导人总结起义失败原因，认为只是“皆金钱之不足”，不能正确认识人、枪、款的关系。所以，尽管20世纪初国内群众斗争风起云涌，但他们都没有予以重视，却独自在西南边境搞武装起义。这种军事冒险，决定他们无法建

立自己的军队，不能建立根据地和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也决定他们过分地依赖武器、金钱而招致失败，从而使他们的武装斗争成为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

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会党。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始终以一个重要角色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革命党人的历次起义都与会党有关，萍浏醴、黄冈、七女湖、浙皖起义是以会党为主力的。

会党成员大多是破产农民、游民、流氓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底层，遭到社会歧视，缺乏固定职业，生活不安定，故对社会现实不满，富有反抗性。它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成员之间讲“江湖义气”，只要取得首领支持，就容易一呼而起。会党还具有“反清复明”的传统，容易接受革命党人的“排满”主张，因此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孙中山说：“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72 页。）但会党有严重的弱点。他们成分复杂，三教九流都有，因而缺乏真正的觉悟，缺乏严格的纪律，难以从事持久的斗争。如河口起义时，会党首领黄明堂不听号令，进军时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黄兴）再三抚慰无效。”再行半里，则兵士多鸟兽散，不得已折回河口。（冯自由：《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 5 集，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161 页。）

革命党依靠会党发动起义，虽然造成很大的声势，给清王朝以严重的威胁，但会党的弱点又是显而易见的，革命党人自身又没有力量改造会党，因而无法形成坚强统一、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故而带来多次失败。通过多次失败以后，革命党人也意识到会党“发动易，成功难”，难以指挥，因此开始把发动起义的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

4、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20 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潮成为社会的主流，但改良思潮还有一定影响。1898 年 12 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宗旨就是“尊皇”。1901 年，他在该报发表《立宪法议》一文，继续鼓吹君主立宪是“政体之最良者也”。这一年，《清议报》因失火终刊，第二年，梁启超又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他撰写文章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中国进步的方法，只能“以渐”，不能“为危险激烈之言”，即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革命。《新民丛报》在海外华侨和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有很影响，销售量达一万四千多份。要

宣传革命思想，扩大阵地，论战是不可避免的。

1906年4月28日《民报》第三号号外刊登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了两报分歧的12个问题，揭开了论战的序幕。之后双方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进行论战，同时，双方在海外的20多种报刊全部投入战斗，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久，涉及问题之广，是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

两党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主要是围绕着同盟会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而展开的。

第一，要不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康有为以为满洲种族出于夏禹，因此提倡满汉一体，而非难排满之说。他说：“谈革命者开口必满洲，此为大惑不可解之事。夫以开辟蒙古、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引起法、美以生内江，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已乎。”又说：“若夫政治，专制之不善，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之特制也。”（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34页。）梁启超也认为，满族二百多年来已经同化于汉人，满洲政府是“四万万人之政府”，已经没有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了，所以没有推翻的必要，只要监督改良就可以了。他极力反对排满的种族革命，并力言种族革命是政治革命的障碍，足以召内乱和瓜分之祸。

革命派则列举大量事实指出清政府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存在。他们揭露清政府专制统治已极端腐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大者为领土权、独立权之侵蚀，小则为铁路、矿产、航道等权利之授予，使吾国民触处伤心，穷于无告”，清王朝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中国前进道路中必须铲除的重要障碍。因此，革命派大声呼吁必须以革命手段推翻“蔑弃我国家权利之异族专制政府”。（汉民：《排外与国际法》，《民报》第10号。）

针对革命是否会导致内乱和瓜分的问题，革命派说：“更进一步以言，革命不免于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齧齧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精卫：《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民报》第9号。）不革命，则意味着人民将长期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下而遭受更大的痛苦和牺牲。革命，正是被清王朝的反动统

治所逼出来的。

他们还指出，破坏只是革命的手段，建设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革命中的牺牲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他们还宣称，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而不是排外，只要在革命的过程中遵守国际法，是“秩序之革命”，列强就没有干涉之理由。显然，他们在这问题上的驳斥是软弱无力的。

第二，要不要实行共和政体？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反对实行民主共和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人民缺乏自治能力，因此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们甚至主张：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则不如开明专制。尤其是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等甚至认为政治革命已无存在的理由了。

革命派对上述观点一一进行驳斥，强调建立共和政体是世界大势所趋，中华民族有能力施行它，并认为只有革命才是开启民智的良药。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只是由于封建专制的统治，才使人民的聪明才智受到压制。只有革命，才能把人民中的这种潜能发挥出来。他们还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学说，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的“普遍性”，共和立宪正与国民的这种天性相一致，所以此制度的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

革命派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是一场以“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阳收汉人之虚望，阴殖满人之实权”（去非（胡汉民）：《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中兴日报》1908年9月21日。）的骗局。

第三，要不要社会革命？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还攻击社会革命会煽动乞丐流氓，会危害国本，导致中国社会的大动乱。

革命派强调社会问题在欧美国家已是积重难返，在中国迟早会发生。他们说，中国贫富之分虽然不如欧美那样“悬隔”，但也存在着“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因而有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当其大不平时行社会革命，使其不平不得起。”（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

他们还指出，地主占有土地，“使贫民陷于地棘天荆之苦况”，是“工商界之一大障碍物”，（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第4号。）

土地问题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针对改良派“土地国有不可行”的观点，革命派引用孙中山的话反驳道：“定地价之法，如地主有地，价值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其地将来因交通发达，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盈利八千，当归国家，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也就是通过核定地价的办法，使国家在地价上涨时获取增价，实际是以较低的价格把私人的土地收买下来，由国家收取地租，从而逐步实现土地国有。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革命与改良的大辩论是辛亥革命前一场重要的思想论争。革命派在这场论战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而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线，使三民主义思想在知识阶层中得到广泛传播。论战的结果是革命派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907年《新民丛报》哀叹道：革命论盛行于国中，革命派的旗帜鲜明、气势磅礴。导致“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兴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新民丛报》第92号。）1907年7月，梁启超以在武汉创办《江汉公报》为由，将《新民丛报》终刊。

如何认识近代中国改良与革命这两种方案、两条道路？

首先，从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来看，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世界上一些国家在资本主义确立的过程中，有的是通过革命的道路，也有的是通过渐进改良的道路。由此可见，革命与改良究竟那种好，是不能抽象的定论的。一个国家究竟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包括社会政治状况、阶级力量状况等现实国情所决定的。

其次，革命的发生是要有条件的，不是什么个人任意制造出来的。这个条件，就是“当旧的社会制度已经衰竭到没有力量调节自身内部的矛盾、没有发展余地的时候，只有当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孕育到呼之欲出时，一句话，只有当社会大变革的内在条件已经足够成熟的时候，暴力才能成为新社会诞生的助生婆。”（金冲及：《五十年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恩格斯早就说过：“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这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

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页。）如上所述，辛亥革命时期，民族危机严重，社会矛盾尖锐，腐朽的清政府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事实证明，腐朽的清王朝已经没有能力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没有能力领导国内的改革朝正确方向发展了，推翻这个政府已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

再次，在当时的中国，不存在走改良道路的现实可能性。改良的发生也是要有条件的。因为改良一般是在现有体制中进行的，所以，能否实行改良或者改良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现有体制是否允许改良，在于统治者是否有改革的诚意。20世纪初，为了挽救危机，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但它的根本目的，是“永固皇位”，是借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皇权。改良派的最大错误，是他们没有认清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他们寄希望于清政府的改革，并力图通过国会请愿等和平方式推动清政府加快改革步伐，以此避免革命。但他们看错了对象。清政府不仅没有改革的诚意，而且镇压了改良派的第四次国会请愿活动。随着清政府一系列集权举措和“皇族内阁”的出台，改良派的幻想最终破灭了，他们开始谋求用武力推倒政府，有的则转向革命。有人写信给梁启超说：“近日内局愈蠢，外力愈急，大有废宇危墙复遭疾风甚雨之势，恐非儒生博士空言阔论所能救治。故弟仍守定乡时主意，以为非长刀阔斧、猛火洪炉，不足有为也。”（《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一），第272～273页；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80页。）所以，革命也是被清政府的反动统治逼出来的。

不可否认，在这场论战中，改良派提出的某些观点，如他们指出中国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但是，在20世纪初，也就是在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历史需要通过革命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时候，他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谈什么“国民程度”问题，只能成为阻碍革命的力量。当然，这场论战也暴露出革命派思想理论的不足。如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劳动群众。对“平均地权”，他们强调的是“固欲富者有益无损也，决非夺富民之产以散诸贫民”，幻想有一种“善良之制”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民报》第5号；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表明他们并不想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土

地所有制问题。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5、辛亥革命的胜利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这首民谣形象地反映了 1911 年清朝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革命有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趋势。这一年，清政府拒绝立宪派的请愿要求，出台皇族内阁，镇压保路运动和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使封建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更为尖锐，大部分立宪派人士对清政府开始绝望；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达到了极为紧张的程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武昌起义终于取得胜利，腐朽的清王朝瞬间轰然崩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创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实现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

封建帝制的覆灭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从 1904 年科学补习所起，湖北革命党人就开始了革命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他们先后建立日知会、湖北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尽管组织多次被破坏，但革命党人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他们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以运动军队为主，不轻率发难”的方针，许多革命党人投笔从戎。他们在新军中办阅报社、办演讲会，还开办学校、印刷所，印刷革命书籍，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他们利用新军本身的建制，在队一级建立基层组织，全力在兵士中发展组织。在革命党人的长期工作努力之下，湖北绝大部分新军士兵转化成秘密革命武装。到 1911 年 7 月，在总数 17000 人的湖北新军中，有组织的革命党人近 2000 人，经联系而同情革命的 4000 余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千余人。经过革命党人的工作，到起义前夕，新军士兵三分之一以上都成了革命党人。（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5 页）这样，他们便在各营、标中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一旦发动，便可以“招营起义”。

1911 年的广州起义和四川保路风潮，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争意志，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导下，当时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

和文学社决定联合行动，成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城内各处新军闻风而动。革命军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起义军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取得了首义的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武昌起义成功后，由于孙中山等领导人远在海外，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革命党邀请湖北咨议局议员和地方绅商举行会议，推举清朝高级军官、二十一混成协（旅）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武昌起义后，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短短一个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以及上海宣布脱离清朝的统治，清朝的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各省的纷纷响应和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多数资产阶级立宪派选择了从权应变、附和革命的态度。他们利用自己在各省咨议局中所取得的地位，策动清朝官员“反正”，宣布“和平光复”，壮大了革命声势，对清王朝的崩溃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他们又力图防止革命的深入开展，为此，他们凭借旧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干预乃至抢夺革命成果，甚至不惜发动政变，杀害革命党人。在湖南，他们唆使旧军官在起义后10天发动兵变，杀害都督焦达峰等人，推立宪派首领谭延闿为都督。就这样，立宪派与旧官僚采用“和平”的乃至流血政变的手段，先后取得了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广西、贵州等许多省军政府的权力。

各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推动这次革命迅速走向高潮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面临着如此广泛和迅猛的革命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派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同盟会组织不健全，缺乏夺取全国胜利的统一部署和切实行动。由于缺乏坚持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资产阶级革命派既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非常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他们希望赶快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制度，尽量缩短革命的进程，取得廉价的胜利。因此，当袁世凯重新掌握清朝军政大权后，他们寄希望于袁世凯倒戈反正，认为只要他能迫

使清帝退位，赞成共和，就可以选举他为大总统。立宪派的破坏、革命派的妥协为辛亥革命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中华民国的建立

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独立，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政权的问题已提到了议事日程。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12月29日，苏、浙、鄂等17省代表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职。他在就职仪式上庄严宣誓：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随后，临时政府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成立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建立。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临时政府虽然容纳了归附革命的一些立宪派和旧官僚的头面人物，但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党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首先是在政府各部人员的安排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谋求“由党决定”，而立宪派也极力争夺，黄兴据此提出“部长取名，次长取实”（居正：《梅川日记》，大东书局1947年版，第72页。）的变通之法。9个部中，虽然只有陆军、外交、教育三部的总长为同盟会人，但9名次长除一人外均为革命党。其中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兴职权最重，所以被称“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胡汉民自传》，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07页。）革命党人在政府中居主导地位。

其次，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民主共和国政体。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亲自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七章五十六条。总纲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由全国22个行省加上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组成。中华民国由参议院、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二章《人民》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权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其他几章规定参议院行使立法权，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选举产生，国家政体为内阁制，法院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

以上规定表明临时政府是以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代议政治”为原则建

立的，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性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短短的一百多天中，还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措施：在扫除封建陋习方面：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禁止刑讯、保障人权、改变所谓“贱民”身份，禁止买卖人口、严禁鸦片、禁止赌博；改变称呼为先生或某君、废止跪拜；提倡廉洁奉公，临时政府各级职员，都未规定薪金，除政府提供食宿外，每人只给军用券 30 元。这些措施，有力地触动了封建专制的弊政，起到了解放思想、移风易俗的作用。

经济政策方面：宣布保护私有财产，保护工商业，鼓励人们兴办实业发展工商各业作为“富国裕民之计”。还制定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奖励华侨在国内的投资，提倡垦殖事业，废除清政府的一些苛捐杂税。

在教育方面：把旧时学堂一律改为学校，男女同校；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否定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废止小学读经；增加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课程，禁用前清学部颁布的各种教科书。

以上各项无不体现了这个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政府。它的成立，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

但南京临时政府也有极大的局限性。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在《对外宣言书》中说：“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0 页。）他们幻想以保护外人在华权益的承诺来换取帝国主义各国的“承认”，无疑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这反映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缺乏本质的认识。此外，在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过程中，各地农民的自发抗租斗争也广泛兴起，反映了广大农民渴望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但革命党人不仅无视这一点，相反，一些省的军政府镇压了自发抗捐抗税的农民群众和会党武装，从而把工农推向自己的反面，使工农群众对革命党人的事业抱失望和冷漠的态度，革命政权基础更加薄弱。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具有伟大的历史性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自秦始皇统一以后，君主专制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皇权统治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封建主义思想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一次次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随着一次次改革机遇的丧失，清王朝的腐朽和无能日益暴露，已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巨大障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扫除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和解放道路的这一障碍物。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曾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转引自金冲及：《五十年变迁》，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 页。）封建帝制的轰然倒塌，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从而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第二，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成为一面有号召力的旗帜。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颁布了《临时约法》，把革命的成果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了下来，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人们观念上的这个深刻变革决不能小看。有了这一条，民主共和便成了“正统”，人们不再把自己看做皇上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正因为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是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自古以来，皇帝历来被看做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林伯渠曾精辟地指出了辛亥革命的重大思想解放意义：“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林伯渠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6 年 11 月 11 日。）尽管辛亥革命

后来失败了，但是它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正是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才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便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如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临时政府的这些政策解放了在封建社会中受到禁锢的先进生产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革命政府成立后，大力整顿社会丑恶陋习，以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包括“奴婢之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人们见面时用鞠躬握手取代了封建时代的跪拜礼；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了代表封建等级的“老爷”称呼。革命后，象征清王朝统治的辫子和服饰成为革除的对象，剪辫易俗之风迅速席卷全国，一时之间，短发、西服、中山服得以流行，社会出现了新风尚、新气象。此外，临时政府还宣布改历改元，以阳历取代中国传统的阴历，以“中华民国”年号取代清帝纪元。上述种种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具有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同时也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一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清王朝，在占世界人口 1/4 的国家取得了胜利，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12 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越南爱国志士成立越南光复会，明确提出“驱除法国殖民者，争取越南独立，成立越南共和国”的纲领；在印度尼西亚，在辛亥革命的鼓舞下，民族主义组织迅速壮大。列宁曾高度评价道：“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关于中国革命》，《列宁全集》第 21 卷，

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3 页。)

6、辛亥革命的失败

自 1894 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起，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得了推翻两千年之久的皇权专制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但好景不长，革命成果很快落到军阀手中，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落空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共和制蜕变为军阀专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中国的诞生。但是，南京临时政府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首先，是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尽管革命党人反复强调“秩序革命”，不敢触动帝国主义的权益，然而，帝国主义却敏感地警觉到如果革命成功，不仅将危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了半个世纪的半殖民统治，而且还会在国际上引起连锁反应，威胁帝国主义在整个东方的殖民统治，甚至震撼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因此，帝国主义对革命抱敌视态度，采取各种手段力图将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临时政府成立后，派人与列强各国交涉，但各国则置之不答。甚至别有用心地宣传君主观念已经成为中国的传统，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实行君主立宪为最适宜”。他们还通过全面控制关税的办法，切断临时政府的财源，并拒绝向临时政府提供贷款，以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在军事上，它们调兵遣将，进一步实行军事恫吓。与此同时，他们还鼓吹袁世凯是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唯一可以接受的领袖”，表示只有在袁解决“南北争端”之后，才可能承认中华民国，力图胁迫革命党人把政权让给袁世凯。

其次，是保守、妥协势力的拆台活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第三天，张謇与孙中山一起商谈政策，得出的结论是“未知涯畔”。他认为孙长期在海外，对中国四五千年之疆域、习俗、政权因革不了解，虽然知道一些国外的政治风俗，但也没有融会贯通。他们通过权衡，认为袁世凯得到列强支持，又具备孙中山所缺乏的财力与武力，因此把袁看成“统一”和“秩序”的象征，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张謇打电报给袁世凯称：“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张謇：《劝告袁世凯速决大计电》，《张

季子九录·政闻录》；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记》，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258 页。）他们大造“非袁莫属”的舆论，力主袁世凯上台，以便早日结束革命。

再次，革命党人自身也开始分化和蜕变。由于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多数同盟会员只以“驱除鞑虏”实行共和为唯一目的，认为无论何人，只要宣布拥护共和，都可以成为争取的对象。所以当袁暗示“赞成共和”之后，一部分革命党人也产生了只要袁世凯能逼清帝退位，就让他当大总统的想法。与此同时，革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了新的分化组合，出现了一些对抗同盟会的新政团，如章太炎和张謇、程德全于 1912 年 1 月 30 日在上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章太炎为会长；原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与一些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民社”，推黎元洪为领袖，提出反孙、倒黄、捧黎、拥袁的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大总统一职，自己只是“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第 304 页。）而狡猾的袁世凯在得到这些许诺后，加快了“逼宫”的步伐。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第二天，袁世凯致电临时政府，宣布“共和为最良国体”。同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附三个条件：奠都南京、总统在南京就职、遵守约法，力图以此制约袁世凯。2 月 15 日，临时参议院举行选举会，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时，袁世凯在北京制造“兵变”，迫使南京方面同意他在北京就职。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 月 1 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总统职务。4 月 5 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中华民国虽然表面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政权转到了袁世凯手中。

孙中山的“让位”，是辛亥革命转向失败的起点。1924 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此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总结：

“曾几何时，己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扶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使当时而有此政党，则必能抵制袁世凯之阴

谋以取得胜利，而必不致为其所乘。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黄彦编：《孙文选集》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72 页。）

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从 1913 年 3 月上台到 1916 年 6 月，是袁世凯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袁世凯为了实现集权专制，一步步地破坏民主共和制度，最后又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复辟帝制，最终在举国上下的反对声中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分裂，北洋政府为皖系军阀所控制，中国仍然处于军阀专制集权和混战的深渊之中。

军阀们要实现集权专制，首先就是要破坏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上台后，就胁迫刚刚成立的第一届国会召开总统选举会。他收买数千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旗帜包围国会，高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你们休想出院”。议员们在军警的包围下，从早 8 时至晚 10 时，忍饥挨饿，连选三次，最后屈从武力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接着袁世凯撕下了“拥护共和”的假面目，攻击国会“暴民专制”，妨碍国家统一，于 1913 年 11 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的国会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 年 1 月，又停止参众两院的议员职务，将进步党和其他党派的议员全部资遣回籍，迫使内阁总理辞职。这样，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国会被袁世凯毁灭了。

同时，袁世凯又毁法造法。就任大总统刚一星期，他就提出增修约法案，拼凑“约法会议”的立法机构。1914 年 5 月 1 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全部权力由袁世凯独揽，下有政事堂，是袁私人的办事机构；参议院议员由袁任命，实际成为总统个人的咨询机构；撤销国务院，大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继承人由大总统推荐。实际是，袁不仅可以终身独揽政权，而且还可以传子传孙。到此时，中华民国只剩一块空招牌了。

皖系军阀掌握北京政权后，由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他同样大搞集权勾当，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并召集由各省军阀指派的临时参议院，把毁约法和武力统一作为施政重点。

其次，军阀们为了实现集权专制，还不惜投靠帝国主义。袁世凯统治时期，出卖路权、矿权、借款，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一百多个。1915 年 1 月，日本正

式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要求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并扩大在东北、东南沿海和内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特权，还要袁聘请日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袁世凯除第五号（聘日人为顾问等七条）外，其余全部接受。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也投靠日本，向日本借款扩充自己的势力，准备武力统一，其中“西原借款”前后共八项，总数达 1.45 亿日元，这些借款以东北金矿、森林，东北、山东铁路，国家烟酒专卖利润等为担保，以便于日本进一步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和原料。

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军阀们公然复辟帝制。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两次帝制复辟活动。第一次是 1915 年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袁世凯为了黄袍加身，利用亲信组织所谓“筹安会”、“公民请愿团”、“全国请愿联合会”，为“变更国体”大造舆论。袁还利用武力，让各地的一些督军武人向他进呈表示以武力为后盾拥袁登极。他还制造了一个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在刀枪林立的军警监视下进行所谓国体投票，要把民主共和改为君主立宪。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发表接受帝位申令，换上“中华帝国”牌号，第二天在中南海的居仁堂称帝。31 日，下令以 1916 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1916 年 1 月 1 日举行登极大典，正式当了皇帝。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帝制复辟立即得到举国反对，他只当了 83 天皇帝，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第二次帝制复辟是 1917 年 6 月，前清官僚张勋率“辫子军”北上，拥前清废帝溥仪复辟。但这一次时间更短，只 12 天就在全中国人民的声讨中下台了。在全国反对复辟的舆论中，在张勋的老家江西，连张氏同宗都指斥张勋为破坏共和的不孝子孙，并通告全国决不认国贼为“赣省张氏子孙”。

两次帝制复辟的出现说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有扫清封建专制政治的统治基础，那些旧军阀、旧官僚和王公贵族、封建遗老们就是帝制复辟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民国，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真正发动广大群众，作为社会最基层的农村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它对普通农民的影响只是被剪掉了辫子而已，类似赵太爷的封建遗老们随时会放下盘起的辫子，重新复辟。但是，复辟的短暂和失败也表明，主导历史前进的，是民心的向背，人民已经抛弃了帝制，迎来了共和，他们是不允许历史再走回头路的。

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

军阀、官僚本身就是大地主，他们还以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袁世凯在河南彰德等县占有的土地就有4万多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地150万亩。许多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陷入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境地，变成佃农和雇农。北洋政府还通过“清丈地亩”、征收各种苛捐杂税等手段，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

军阀与官僚还利用搜刮来的钱财投资工矿业，致使军阀官僚资本发展迅速。据1912年统计，在中国煤矿生产中，官僚资本控制了机器采煤的82.2%，1916年控制了79.3%（外国资本的采煤量不计算在内）。1912~1916年主要军阀投资的工商企业有37家。（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卷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4、396页。）他们还操纵、垄断财政金融。1912~1916年，全国新设立的银行30家，其中主要是军阀投资的。他们还凭借政治势力，形成官僚买办资本集团。如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集团，控制了铁路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具有代理国库、发行纸币的特权，为北洋政府经理外债、内债和税收，还直接控制了一些工矿企业。有些军阀拥有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之财产。

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又命令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一些清朝遗老遗少、保守分子纷纷组织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尊孔复古团体，发行《不忍》杂志、《孔教会杂志》等尊孔刊物。他们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伦常。1913年8月，孔教会上书国会请定孔教为国教，1914年，袁世凯下令全国恢复“祭礼”，1915年又恢复学校的尊孔读经课。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也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避免“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孙中山本人沉痛地说过，当时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盛，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

三、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1、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孙中山的一生，是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一生。但由于他手中没有掌握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由于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所以在民主革命的斗争历程中，总是不断

地遭受挫折和失败。但他没有气馁，为维护民主共和，为反对军阀的专制统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

“二次革命”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孙中山曾寄希望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希望通过责任内阁制度制约袁世凯。而他本人则致力于民生主义，宣称“10年不预政治”，自愿以在野的身份建筑20万里铁路，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部分同盟会领导人，则希望像西方那样组成两大党以进退，建立“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分取袁世凯的权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1912年8月成立了以同盟会为基干的国民党。他们还积极参加第一届国会议员的竞选，在国会中取得了占多数席位的胜利，并进一步准备以国会多数党来组织责任内阁。宋教仁为了竞选胜利，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到处发表演说。但这一切为袁世凯所不容，他指使亲信物色杀手杀死了宋教仁。

宋案是当时震动全国的政治谋杀案，它用血的事实教育了革命派，特别是孙中山。他立即认识到，“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陈英士致黄克强书》，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第453页。）决心武力讨袁。

1913年7月12日，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指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拉开二次革命的战幕。接着，黄兴在南京挟江苏都督程德全独立，南方数省市宣布独立。但是在北洋军的进攻之下，只前后两个月，很快失败。孙中山等逃亡海外，革命武装全部解散，革命党在南方的地盘全部沦丧。袁世凯基本完成了反革命的“武力统一”。

失败的客观原因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队力量相对强大，并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但从革命党方面来看，仅着眼于军队的发动，忽视人民群众斗争，因而得不到群众响应。袁对南方用兵即获胜利，很大程度是与各阶层人民的厌战厌乱情绪有关。民族资产阶级除少数人外，大多数都害怕社会秩序的混乱会影响自身利益，有的商会甚至出面要讨袁军“让城别走”。广东独立后，港粤商人群起反对。缺乏群众基础是“二次革命”失败的关键所在。此外，从领导“二次革命”的国民党来看，宋教仁等一度幻想通过议会竞选取得政权，其内部也混杂了许多官僚政客，分裂出许多小党派，表明其革命性比同盟会时代是大大后退了，因而更加脱

离群众，难以成为坚强的领导力量。

中华革命党和反袁斗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国内已无容身之地，不得不亡命日本，悲观失望情绪严重滋长。孙中山也非常痛苦，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革命党的涣散，决心重组革命党以进行反袁斗争。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正式建立中华革命党，通过《中华革命党总章》，宣布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恢复民主共和制度为中心任务。在组织上，制定了严格的入党手续，党员必须要有人介绍，填写誓约、盖手印、宣誓服从孙中山一人。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等。中华革命党的目标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封建主义的独裁专制，但是在组织上却沿袭了封建落后的结盟形式，带有关门主义倾向，因此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这说明，孙中山虽然有发动革命的志气，但他对于革命的失败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建立中华革命军，不断派遣党员回国发动反袁暴动，但都因缺乏群众基础而陷入单纯军事斗争，结果都失败了。

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立即发出讨袁宣言。全国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袁斗争，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很快形成了席卷半个中国的护国运动。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也开展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他们的斗争，鼓舞和激发了国内人民的反袁斗志，在促使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的过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由于组织的狭隘，革命党人内部产生分裂，黄兴等因不赞同中华革命党的关门主义而另组欧事研究会。他们虽然在反袁斗争上是一致的，但是分裂毕竟削弱了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使他们没能在这场斗争中取得全国的领导中心的地位。

护法运动 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并没有触动军阀统治，政权又原封不动地落到大军阀大官僚手中。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又举起了护法的旗帜。

由于中华革命党在护国运动后影响日微，孙中山既无组织又无军队，不得不依靠与皖系军阀有矛盾的西南地方军阀。1917年7月，孙中山从上海到广州，组织国会非常会议和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9月10日，孙宣誓就职并宣布段祺瑞为叛逆，出师北伐，护法战争开始。短短三四个月中，遍及十几个省份。北洋军阀在进行军事镇压的同时，倡言和平解决。在这种情况

下，护法军政府内部分裂。西南军阀排斥孙中山，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1918年5月，孙中山愤而辞职，在绝望之中离开广州往上海，护法运动完全失败。护法军政府成为南方军阀的政权，形成南北军阀对峙的局面。

护法运动中孙中山倡导护法，以国会和约法为武器，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在当时仍是一面战斗的旗帜。但是，这个斗争是软弱的、失败的。失败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不能形成一个有力的领导核心来领导这场斗争了。孙中山试图利用军阀的内部矛盾进行“护法”，但对这些地方军阀来说，支持“护法”，仅仅是因为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直接危及自己的地盘，他们想借助孙中山的威望来扩大自己的实力。所以孙中山名义是大元帅，实际却无兵可调。当孙中山被排挤之时，才认识到这一点，他痛心地说：“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孙中山：《辞大元帅职通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1页。）

护法运动的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对于这个问题，在经过惨痛的教训之后，孙中山也有所认识。他说：“南北新旧国会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免致他再出来捣乱，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他还表示：“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1页。）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不仅是孙中山个人的认识，也是时代的迫切要求，“新纪元”已经呼之欲出了！

2、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就是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人奋斗的目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证明单靠农民小生产者是无法完成这些历史任务的。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但是，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艰难，民族资产阶级队伍弱小，因此，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就由一批首先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并具有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的知识分子来承担了。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这场斗争最终还是失败了。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失败？从根本上说，是

因为当时的时代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难以实现。帝国主义是决不容许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 1/4 的剥削、奴役的对象。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而封建势力的根基也十分雄厚，他们千方百计破坏和瓦解革命。正是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的勾结与破坏，才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场革命的失败，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他们没有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幻想通过承认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也不能彻底地反对封建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基础，不敢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即便他们能够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推翻清王朝的胜利，即便在短期内也建立了国会、制定了宪法，但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没有铲除，由于封建军阀的根基还在，中国深层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没有改变，民主共和制度很快被军阀专制所取代。

他们不敢深入地发动人民群众。他们没有提出土地革命的要求，因而难以动员和依靠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虽然抱定民主共和的目标，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但始终缺少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的支持，以致斗争的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小，路子越走越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 页。）

他们不能建立一个坚强的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武昌起义后，马上有人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即使是后来的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也因内部涣散和思想不一致，无法成为坚强的领导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

激下生长起来的。与此相适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从地主、买办、官僚、商人中转化而来，这决定了他们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不能也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因为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资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让位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其前途是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思考题：

- 1、有人说，假如维新派选择与慈禧太后合作而非与光绪合作，戊戌变法就肯定能成功，你认为有道理吗？
- 2、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
- 3、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 4、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国的出路时一次次遭到失败，其中的原因何在？他们的失败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参考书目：

- 1、沙健孙等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师参考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 2000。
- 3、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1982。
- 4、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1980。
- 5、林国华著：《近代历史纵横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专题四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一. 中国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 北洋军阀的统治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的产生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上，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些割据称雄的各派系军阀之间，或者为了争夺中央政权，或者为了保持与扩大自己的地盘，进行连年不断的纷争，引发了多次的战乱。（“北洋”的原意是从地域来讲，清有文字记载，长江吴淞口为界，南面沿海为南洋，北面沿海为北洋，地域看张作霖的奉系也属北洋。北洋军阀的历史为四阶段 1：北洋军的兴起（1912—1916）袁的窃国与败亡。2：皖系军阀统治（1916—1920）五四运动成为皖系由盛到衰的转折点。3：直系军阀统治（1920—1924）。4：北洋军阀的覆灭（1924—1928）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

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高举反对北洋军阀大旗，进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与护法运动的抗争却始终不能取得成功，他们作为近代中国的革命激进力量起历史作用的时代已成过去。“与无声处听惊雷”，随着中国新的阶级结构正悄然变动，十月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启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预示着中国的未来发展与救国的新走向。

2. 中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的深刻变动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不仅旧的阶级发生了变化，还有新的阶级产生出来，除了旧的封建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和旧的被统治阶级即农民阶级发生了变化外，近代中国新产生了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资产阶级，他们的产生和来源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在 1914 年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只有日本，美国的在华经济势力仍有所扩张），加上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颁布了一系列保护，鼓励工商业的政策法令，解除了清政府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投资新式工业的积极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相当迅速的发展。1914 年至此 1919 年的六年间，新设厂矿 397 个，平均每年增设 63 个。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近代中国诞生的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工人阶级，它的来源主要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沿海城市开办的交通运输企业。伴随清朝洋务派官僚，地主，买办开办的近代企业，产生了第二批中国产业工人。19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出现，产生了中国第三批工人。据统计，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 200 万人左右，这个数目与全国人口比较起来，仍然很少，可是在工人发展史上，这个数目以经是很大的了。它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工资低，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受剥削最深，革命性最强，而且它还有组织纪律性强，集中，团结，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优点。中国工人阶级从它产生以后，就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据统计，1912 年至此 1915 年间，全国共发生罢工 130 多次，它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预示着中国的未来发展与走向，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更是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种种社会问题，包括劳动和资本间的矛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科学理论指导使它由自在阶级提升到自为阶级。这就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各种新式学校里的学生也迅速增加，还出现一大批新式学校的教师和记者等，形成一个比辛亥革命时期更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更为壮大了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3.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成为中国人民逐步觉醒的标志

当中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结构在悄悄地发生深刻变动的时候，中国的思想界正发生着剧烈变化。辛亥革命的失败后，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曾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的机会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一度恢复帝制。张勋拥戴宣统皇帝复辟。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为背

景，国内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多党制，议会制这一套从西方学来的东西在民国初年都尝试过，结果却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实际问题，只是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已。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的先进分子说来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救国就要寻找新的出路。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思想交锋。

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

《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个人主编的刊物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过，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并非旁观者。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为此，他们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他们说：“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受法国的卢梭的“民约论”思想很大影响。《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指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反对君权，提倡民权的思想来自欧美“天赋人权说”。1914年，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表现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为追求一个为国人谋幸福的民主国家。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陈发表了《敬告青年》是进一步激发国民的觉悟与智能的文章，将国家兴亡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1916年9月，发表《新青年》一文，强调了新青年的标准：“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要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而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随后的《我之爱国主义》进一步发挥《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主题思想，“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和私德堕落之有以召之耳”。他心中真正的民主爱国者必须具备“勤，俭，廉，洁，诚，信”数种传统美德，鼓吹民主爱国的思想，并不排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的融合。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民主与科学的具体含义见教材 88 页）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伸和发展，是近现代以来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开拓了中国人民的视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启蒙思想家，确实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历史文献一：《敬告青年》陈独秀）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寝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

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原载1915年9月15日 “青年杂志” 1卷1号 ）

注：这是陈独秀为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所写的发刊词，文中实际上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即“六义”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后来“六义”进一步浓缩为“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两大主张。

（历史文献二：《洪水与猛兽》蔡元培

二千二百年前，中国有个哲学家孟轲，他说国家的历史常是“一乱一治”的。他说第一次大乱是四千二百年前的洪水，第二次大乱是三千年前的猛兽，后来说到他那时候的大乱，是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又把自己的距杨、墨比较禹的抑洪水，周公的驱猛兽。所以崇奉他的人，就说杨、墨之害，甚于洪水猛兽。后来一个学者要是攻击别种学说，总是袭用“甚于洪水猛兽”这句话。譬如唐、宋儒家攻击佛、老，用他；清朝程、朱派攻击陆、王派，也用他；现在旧派攻击新派，也用他。

我以为用洪水来比新思潮，狠有几分相象。他的来势狠勇猛，把旧日的习惯冲破了，总有一部分的人感受痛苦；仿佛水源太旺，旧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滥岸上，把田庐都扫荡了。对付洪水，要是如鲛的用湮法，便愈湮愈决，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导法，这些水归了江河，不但无害，反有灌溉之利了。对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利无害的。孟氏称：“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这正是旧派对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兽，恰好作军阀的写照。孟氏引公明仪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现在军阀的要人，都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家产，奢侈的了

不得，别种好好作工的人，穷的饿死，这不是率兽食人的样子么？现在天津、北京的军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乱打爱国的青年，岂不明明是猛兽的派头么？

所以中国现在的状况，可算是洪水与猛兽竞争。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伏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原载1920年4月1日 “新青年” 7卷5号）

（**历史资料一**；中国称为文化自由时代，除去春秋战国（与同时是古希腊哲学文化处于双雄的状态），便是五四时代。五四运动又称为启蒙运动，与西方近代两次著名文化运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二者许多不同之处。西方先有启蒙，后有革命。中国的方式是先有革命——辛亥革命。后有启蒙——五四运动。本身五四运动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广泛和丰富的文化来源，从康德，尼采，杜威到马克思，列宁，爱因斯坦，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流派，没有不曾进入中国。文化传播需要人才，人才需要生存环境，又需要政治阵地。蔡元培不遗余力网罗人才，他的办法是办好北京大学，《新青年》是革新派的理论阵地，不仅是五四的喉舌号角，还因为它汇集造就一大批文化新人，最具成就和历史生命力的人物，《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外，作出大贡献并非全是马克思主义者。胡适是五四运动一位精神领袖，白话文运动，虽不言革命，本身就是革命。他是有才华，有道德，很有爱国心的中国式学者，鲁迅不是政治家，但有很深刻的政治见解，他不是人类文化学者，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没有任何一个同时代人可比得上他。摘自欧阳哲生著《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一书）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与存在的弱点

第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的必然，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正因为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存在着这些弱点，它也就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不向前发展。

事实上，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的人在宣传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比如，陈独秀 1915 年在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 1916 年 5 月即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 1917 年 8 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他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是因为：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陈独秀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逐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第二，1914 年至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李大钊讲到：“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否应当对欧美文明亦步亦趋，当然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

4.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研读，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新文化运动开始从前期向后期转化，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创立以后，在长时间里，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梁启超、朱执信等人虽也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

（历史资料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据目前查到的资料，1899年2月，在《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发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的译名为《大同学》的文章，最早提到了马克思。1899年《万国公报》第122期《大同学》中，第一次提到了恩格斯；第123期《大同学》中，第一次提到了《资本论》。1902年《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概略的介绍。1917年6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4号第一次提到了列宁。）

（历史资料三：梁启超第一个在文字上介绍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颌德（又译基尔特）之学说》时介绍说：“麦喀士（今译马克思），日尔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他评价道：“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马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今译尼采）之个人主义。”这里梁启超承认马克思和尼采作为德国两大思想都“持之有故，言之有理”，但他认为真能解决问题的还是靠颌德的学说）

（历史资料四：五四时代的主题——从个人走向社会，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

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他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为中国仿效的榜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当时来说，确实也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先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

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批评。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但他们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

（历史资料五：“第三种文明”难能可贵的思想理论探索。1917年至1918年的李大钊虽然初步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并看到了十月革命的曙光，但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战线有着独立追求的勇士，他提出以一种东西古今优秀文化于一体的“第三种文明”，他既为东方文明骄傲又为东方文明的不足而感焦虑，他曾东渡日本亲身感受过工业革命气息，李大钊既敬佩西方文明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又为西方文明存在的根本缺陷而感困惑。在东西文明论战的激烈对峙中，萌生了创立更高层次文明形态的构想。当《晨钟报》创刊的第三天，李大钊欣然以“第三”为题，表达自己向往的“第三种文明”的心声：第一种文明偏于灵，第二种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第三者，理想之景，复活之景，日新之景，中庸之景，独立之景也。”李大钊独树一帜提出重新全面认识传统，再造文明的新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第三种文明”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被全面而系统地认识和介绍到中国之前所构想的一种文明模式。它作为社会发展的设想毕竟是不成熟的，终因“五四”运动爆发及中共诞生等一

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冲击下，而失去了使其进一步在社会中尝试一下的实验机会悄然而退。

“第三种文明”是李大钊心中永远的一个美丽梦幻，后来曾是李大钊学生和助手的毛泽东，在其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就十分注意借鉴和吸收李大钊思想（包括“第三种文明”）中许多积极有利的因素，如尊重国情，重视农民，对传统善于扬弃与超越。“第三种文明”的理论梦幻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部分地得到体现。（摘自《先知的足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个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的努力遭到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惶和苦闷之中的时候，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星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

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感到，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所以中国“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兴奋地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第二，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一些人由此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1919年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

一切特权，更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新青年》刊登的读者来信即提出，我们要由此跨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它“所根据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不过，在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起初，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占着优势。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以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起绝大之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之先声”，确信“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11月，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而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才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二.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1. 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其基本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日趋激化以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所引起的空前民族危机；其次是因为新生社会力量的增强，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都进一步壮大；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

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这个由几个西方列强把持的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会议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界的宣言呼吁：“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正当学生的爱国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自动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三罢”斗争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开始时，英勇地出现在斗争前面的是学生群众。这时，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典型地表现在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确实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瞿秋白当时就说：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在这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经过比较，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生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

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教育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中蕴藏着巨大力量，他们把新的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和成一片不可。吴玉章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正因为五四运动具备了上述新的历史特点，它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历史文献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摘录）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历史资料六《五四运动》浮雕**镶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高200厘米，长354厘米，作者是著名雕塑家滑田友。浮雕生动再现了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示威游行的场面：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要求收回山东被日本夺去的权力和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后来遭到军阀的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许多城市的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历史资料七.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来由。**曹汝霖的住宅，明隆庆朝渊大学士赵贞吉曾在此居住。清朝与后赵家楼胡同统称赵家楼胡同，光绪时称赵家楼。“火烧赵家楼”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随着五四运动的胜利而辉煌。当年火烧赵家楼的参与者，后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在1980年为《五四群英》一书写的题词中曾无比自豪地题：“泱泱大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

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命运”，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广东的杨匏安 1919年11月、12月，他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比较确切的阐述。它的发表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可以说是该文的姊妹篇。

湖南的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亦不能外。”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的要为他宣传奔走”。

瞿秋白、邓中夏、何孟雄、恽代英等，也先后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明了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

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他们殊途同归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历史资料八：《共产党宣言》引入第一人。**陈望道，浙江义乌县人。1915年留学日本，1919年6月回国后，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活动，他1919年底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传播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

3.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特点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及其革命立场，明确而坚决地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划清界限。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尽管还不深入，但他们确实一开始就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进行过全面的研究，获得了基本正确的理解，并且把握了它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

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严重对立。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修正主义采取了明确的批判态度。陈独秀说，马克思修正派的学说“是我大不赞成的”。“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毛泽东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蔡和森也表示，自己对修正派社会主义“一律排斥，不留余地”。

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

第二，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旦学得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运用它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这个理论“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环境，“就那样整个地拿来，应用于我们的时代”。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追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实际上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命题。

第三，提出了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忠于民众、作民众的先驱者。他不仅重视工人，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且还重视农民，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他主张知识分子“向农村去”、“到民间去”。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

尽管当时到工人中去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它预示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新方向和应当走的新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从而赋予它们以新的涵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发扬。民主不再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主。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科学，除自然科学外，就对社会的研究来说，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了。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从反对封建思想入手，进而提出必须反对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制度；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的立足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扩展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封建的斗争方式，从少数人

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者的弱点，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前进了。

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起指导作用了。

三.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同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化装成商人，一起坐骡车去李的家乡河北乐亭小住，在途中曾酝酿过建立新的革命政党的事情。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实际上，它当时并不称作共产主义小组，而是称作共产党。“首次决议，推陈独秀为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称共产党北京支部，推李大钊为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他创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历史资料九: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北大红楼两巨人, 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 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茫茫黑夜, 吾辈仰辰。”(后四句有不同版本)“南陈”, 就是陈独秀; “北李”, 就是李大钊。1920年2月旧历年关的一天, 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 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 坐一辆骡车秘密从北京到李大钊的老家河北乐亭。在途中, 他们共商建党大计, 留下了“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的佳话。1920年3月, 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 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6月, 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 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 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 还起草了一个简单的党纲。关于党的名称, 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后, 定名为“共产党”。)

(有关资料一:政党的起源, 性质与作用。(1)起源。现实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党”, 没有“党”不是更自由民主吗? 这实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蒲鲁东就认为, 政党同政权一样, 都是妨碍人的自由, 平等的。他主张“打倒政党”。其实, 政党的产生, 存在与发展, 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政党与国家一样, 并不是从来就有, 而且政党比国家出现得还要晚。封建社会还没有真正的政党。那时, 只有“朋党”, “会党”。我国唐代有名的“朋党”有牛党, 李党, 明朝有东林党。这些朋党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 团伙的贬称。“会党”在封建社会更为普遍, 如天地会, 洪门会, 哥老会, 它们都是由下层民众借助宗教和迷信而结成的民间秘密团体。这些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 封建专制制度下, 政党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政党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世界上最早的政党是17世纪70年代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辉格党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 要求限制王权, 提高议会权力。托利党代表地主和旧贵族等封建势力的利益, 主张维护君主特权。后来, 分别改称自由党和保守党, 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中国最早的政党是1905年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 同样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政党只能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 是因为第一资本主义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 资产阶级有独立于封建贵族的强大物质基础, 借助强大物质基础联结为一个阶级形成同封建地主阶级相对立的独立政治力量。第二,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一方面必然要求废除封建等级制度, 要求与地主阶级间政治上的平等, 另一方面要求资产阶级内部与外部都展开政治的自由竞争, 为政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第三,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个统治者(如封建君主)已无法驾驭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 必须由集中了社会的政治力量和集体的政治智慧来代替专制君主一人执政, 才能适应近, 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发展的需要。因此, 政党的出现是社会上, 政治上的一大进步。总之,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

仅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必然产生创造了条件。（2）性质和作用。政党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质。政党就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并维护其利益进行夺取或影响政权的斗争的政治组织。现在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政党数百个，中国近现代 100 多年的历史中，出现过的政党主要的也 40 多个。这些政党总是一定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工具。政党的党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具有阶级的代表性，一个政党大抵都是由这个阶级中的有代表性的中坚骨干所组成。第二，具有一定的组织性，每个政党不仅有自己的政治纲领，而且有自己的组织体系。如中央机构，地方机构和基层组织，自上而下的组织把党的成员由分散的力量集中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具有统一的纪律性。有了纪律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才能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而奋斗。政党的性质决定了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这种作用充分体现在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列宁说过：“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段话准确概括了政党的作用。

（摘自教育部社科研究与思政工作司编辑《政治观教育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着重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 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开始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他们在《新青年》杂志（此时成了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1920 年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公开出版。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陆续出版，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在思想领域中是没有国界可划分，五四期间各种思想流派在中国找到其传播的土壤，共产党早期成员在思想论战中确立与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想流派中的优势，并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1920 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指出，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当时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场论争，本质是中国走什么路的斗争。社会主义者坚持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但也应该指出，社会主义者在其论证的过程中也有其不成熟之处，表现出见解的片面与偏激。因为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立即消灭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也是不恰当的，那时的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想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的想法显然是过早，过急了。

在这个时期，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

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罢”的口号。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上海小组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等。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的早期组织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1920年11月，党的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宣言》“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其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团组织通过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

2.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7个地方、代表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烬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这样，党的一大就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标志着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最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理想，这是他们经过了反复的思考，比较，探索后作出的抉择，也是他们告别了旧式的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后作出的抉择。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抉择。前路没有欢呼，没有鲜花，只有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然而中国的历史却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

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根本改变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它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它不仅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的残酷迫害，更受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但是，幼稚的、弱小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而不可遏止地生长和发展了起来。当年，它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小组；28年以后，它就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这个事实说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不久前还是小生产者。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更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同时，它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切实地、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

3.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立即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中，使中国革命呈现出新面貌。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往斗争成效甚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敌人。第二，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在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不曾有过的新式的农民运动。第三，倡导并实现了国共作，并在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掀起大革命高潮，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这一年轻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它是成功的，得到了锻炼与考验，但它又是不成功的，随着统一战线出现剧烈的分化，国民党右派集团的动摇，叛变革命，付出了鲜血与生命。国民革命失败的历史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步是充满曲折艰辛的，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常常一开始面对巨大的对立面。中国共产党诞生一开始就必然置身于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之中，面对着中国社会机体中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对立面，面对统一战线中的合作者右派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还有是本身的不成熟，对中国国情与革命实际的认识不深刻，及党内错误思想的挑战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革命风雨中历练，生存与发展。国民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仍有深远意义，它宣传了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共产党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使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国民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是任

何力量无法消除的，它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继续前进的新起点。

（**历史资料十：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1896年中秀才；不久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转而追求西学。1901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后，曾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号召青年人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争人权，求得个性解放。他是新文化的主将，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最有影响的党的创建人，与李大钊一起被时人誉为“南陈北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十分敬佩陈独秀：“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茅盾在回忆录提到：“我认为陈独秀在那时是一个革命家，他立场坚定，战斗力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被选为总书记，是事理之当然。”蔡元培是这样的评价陈独秀：“一位失败的书生政治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一位特立独行的叛逆者，一位命运坎坷的孤独英雄，抑或是一个不依附任何势力的社会活动家，一切的评价用在他身上似乎都不为过。”）

（**历史资料十一：**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1991年6月18日起发行《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流通纪念币一套3枚。其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国徽和1991年的年号；背面图案依次分别为：（1）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2）遵义会议会址。（3）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址。三款流通纪念币的背面均篆刻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主题文字和面值。设计者在决定这套流通纪念币的画面时，非常独到且有创意地将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次代表大会的会址作为主图，从三枚流通纪念币的主题内容来看，中共“一大”会址可谓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它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中共“一大”会址是一幢建于1920年的具有上海地方风格的石库门楼房。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楼下一间十八平方米的客厅内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61年，中共“一大”会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幢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5年1月初，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这里是红军总司令部驻地。1月15日至17日，著名的遵义会议就在主楼楼上原房主的小客厅举行。

京西宾馆建成于1964年，它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学术研究资料：关于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仅

供参考)

怎样估价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生的论战？周策纵认为：“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一“短暂的论战，可作为增剧分裂开始的讯号”。但“至少在表面上”看，李大钊等“左倾领袖”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相差不远，所以“他们就中止了这场辩论”，其结果并没有改变当时思想大势”。李庆也认为，不能过分夸大“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响和意义”，因为这次争论“毕竟时间不长”，主要文章“总共不过五、六篇”。李璜认为：五四后思想论战的结果，国家主义派与共产主义派“逐成为中国革命政治的两大主流”。

近年来，台湾的某些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唐国英在论述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时说，由于有影响知识分子的“最有力的《新青年》的刊物”，以及“李大钊歌颂俄国革命的文章”，“确实对一部分在‘西化’道路上失望的知识分子产生共鸣，对于‘俄化’孕出希望并寄予无限美好的远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乃充斥于中国学术界，进而自成一家之言，已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渠道。香港的司马璐不同意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在这个历史问题上，有一些错误”，“中国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介绍，早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10年”。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知识“都是经过日本社会主义者介绍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容。台湾的陈国祥认为：中共早期党员“不懂马克思主义学说，又要搞马克思主义运动，为了配合业已展开的斗争行动”，就要加紧补习马克思主义，“俄共就当起补习老师”。中共早期党员“没有独立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制定战略策略的能力，只得接受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五四运动是否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台湾的杨量功认为：“说‘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完全不正确的”。台湾的周玉山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既缺乏社会基础”，“又没有阶级觉悟”、“没有建党的觉悟和需要”。联邦德国籍华人郭恒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人为的早产，客观条件在那时尚未成熟”，从主观条件看，“在建党的代表中间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个完全的中译本到1938年才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共产国际的作用。司马璐认为，中共的成立完全是“共产国际插手中国政治”的结果，而且“是从多方面分别下手的”。台湾的朱新民认为：“中共是俄共移植中国的产物”。台湾的唐国英认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一经共产国际及俄共的利用，终至

误入歧途”，从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苏联的格卢宁虽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国内开始出现新兴的社会力量”，即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但他又强调地说：“在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华之前，中国没有一个人提出过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和经费以及在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大学和其他学校培养干部，如果没有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中共历史上的小组时期就会拖长许多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苏联史学界存在三种观点：1. 以A. T. 克雷莫夫为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时间不是在“一大前夕”，而是在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之后。“在这之前，共产党人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只是偶然性的”。2. П. A. 米夫认为，1923年至1924年中共还只处于“克服小组习气”、“从弱小狭隘的宣传小组向群众性政党转变”的阶段，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时期，中共才转变为“群众性的政党”。3. 卡尔图诺与科瓦廖夫认为，在1920年中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间从事宣传、出版、组织（建立工会）等活动，“是中共成立前夕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一大”党的成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法国的R加罗德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是同工人运动，而是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

关于对五四运动功过的评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与贡献的看法。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广义的思想革命”，它的成就“首先是思想方面，传统之动摇，科学之研究”。“五四运动在意识形态上之成就最大”。周策纵不同意有人所说五四“乃是造成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主因”。他认为若一味坚持这种说法，就否定了“当时争个人自由、追求国家独立的贡献”。他也不同意毛泽东对五四运动成果的论述，认为在五四期间，“几乎没有一位领导者运用过马克思的理论”。吴相湘认为：“五四初期口号是‘赛先生’（科学）及‘德先生’（民主）。吴稚晖特加上一‘姑娘’（道德伦理）”，而蒋介石“在台湾演释三民主义时，郑重说明民族主义即道德伦理、民权主义即民主政治、民生主义即科学技术。实在具有深意”。台湾的周玉山说：“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是在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导致日后北伐的开展，‘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二语，正与国民革命的两个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官僚军阀’相同”，“五四对国民革命军北伐，立下了启迪人心的前功，这是它对‘中华一统’所做的铺路的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否存在某些“过失”与“错误”？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的缺点是：“一是在批判传统时，缺乏公正与同情，忽视作家和民族传统的良好方面；二是对于新观念过

于轻信，而又不免混乱模糊；三是他们对于复杂问题过于性急。”余英时认为：“五四的错误，不在反传统，而在于它未能建立起接受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即是有破而无立”。唐君毅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根本错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只是“消极地指出其不好的方面”，“而对中国文化之优良的方面和西方文化的缺点并未加以重新估价”。

还有人提出了“文化真空论”，认为：“今天中共所以仍不放弃过时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因为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的破坏力量，将文化消灭了，变成了真空，所以只有让俄化来填补上”。胡适在1968年2月6日与唐德刚会谈中提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来说，实是一个挫折”。台湾林一新认为：“五四运动的本质是争取自由”，然而“五四自由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自由”，“最后与无政府的自由运动混淆不清，转变为无政府的自由运动”。

显而易见，上述种种评论的一个共同前提是：都不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果，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很多人否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的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五四”以来科学、民主精神的主流。）

学习思考：

1. 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2.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3. 对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应如何评价？
4.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参考书目：

1.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红旗出版社
2. 龚学平主编《上海——党的摇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3. 欧阳哲生著《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
4. 林泰主编《政治观教育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5. 许明主编《先知的足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河南出版社
6. 王杏元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共党史出版社

专题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

教学目的：

通过本专题学习，使学生认识到：

- 1、了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及其努力，从而懂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新道路对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伟大意义，加深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 2、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路线，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屡遭损失时，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而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中流砥柱。
- 3、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具有重大意义。
- 4、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说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5、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关键时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为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前途。通过与国民党实行的军政独裁的状况的对比，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教学重点与难点：

- 1、中国革命新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战略的形成。
- 2、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的经过和意义。
-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重大意义。
- 4、中国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的原因。
- 5、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
- 6、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教学时间：2 课时

教学内容：

1927 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 4 月 18 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党拥有庞大的军队，建立了诸如“中统”、

“军统”等庞大的全国性的特务系统，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绑架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此外，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更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此时的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推翻这个反动统治。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没有被征服、没有被杀绝，他们在逆境中崛起，在探索中走通了一条从城市到农村、再从农村到城市的民主革命道路，历经中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谱写了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国民主革命史诗。

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中国革命的低潮

南京国民政府于成立后的第2天即1927年4月19日就发出“秘字第一号命令”，厉行“清党”，通令“缉拿”共产党领导人和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190人。七一五政变后，“清党”推至武汉地区。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制止共产党阴谋案》，规定全面“铲除”和“预防”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和《中华民国刑法》，规定：凡“意图颠覆政府僭窃土地或紊乱国宪”者，处以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1931年1月，又颁布《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清党”、屠杀政策下，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其他革命者、民主人士，均以各种罪名被杀害。

（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者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共产党的许多优秀领导人如陈延年、越世炎、罗亦农、萧楚女、向警予、彭湃、恽代英、蔡和森等先后被杀害。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等也被杀害。）

在国民党的大肆屠杀之下，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阶统力量也发生了新的组合，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营垒，附合了大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也发生

动摇而离开了革命，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一时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贫苦的小资产阶级。革命阵线日益缩小。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革命力倍受摧残，革命运动日趋冷清。党员由原来的 5.7 万多人减少到 1 万人左右；城市工人斗争由进攻转入防御，参加罢工的工人中，店员和手工业工人较多，而且多是经济斗争，取得胜利的极少；农民的斗争则是此起彼落，处于散漫而不集中的状态，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的形势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同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2、八七会议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

（1）八七会议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到会代表有 20 余人。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所作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告全党党员书》。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撤消了陈独秀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二，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决定在湘、鄂、赣、粤等地发动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纠正和结束了中共党内的右倾错误，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向，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阶段。但是，八七会议没有充分注意到党内由于仇恨国民党屠杀政策而产生的“左”倾情绪，从而滋长了“左”倾错误。

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从 1927 年秋到 1928 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发动了武装起义。其中最重要的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2）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

在国民党背叛革命、攫取国民革命的成果、疯狂屠杀中共党人之际，中共中央及时地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旋即领导发动了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在1927年9月至1929年底，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遍及10多个省140多个县，以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最具代表性。

（南昌起义）

1927年7月2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集中中共党掌握和影响下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是时，在南昌及周围地区受中共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有：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驻九江）；第四军二十五师（驻马回岭）和贺龙的第二十军（驻九江）；朱德管辖的军官教育团（在南昌）；卢德铭领导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军，共计3万人。而南昌方面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比较空虚。7月27日，贺龙、叶挺率部开进南昌，并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7月28日，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成立，贺龙任起义总指挥。7月31日，前敌委员会决定于8月1日举行起义。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2万余名起义军经过几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胜利占领南昌城。起义成功后，在南昌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了以中共党人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和《中央委员宣言》等文件。同时，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番号。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大为震动，急忙调集军队围攻起义部队。鉴此，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7日相继撤离南昌南下，经三河坝和潮汕两次分兵，遭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而失散。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起义主要领导人分批撤离部队。起义军一部由颜昌颐、董朗率领进入海陆丰地区；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进入湘粤赣边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树立了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同时，南昌起义由于缺乏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革命的经验，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形成孤军南下的局面，加上两次分兵的失误，最后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失败。

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同时会议决定，不再沿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称号，而以共产党的名义相号召，以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来组织部队。起义计划是首先分3路进攻平江、萍乡、醴陵和浏阳，然后会攻长沙。

9月9日，从破坏铁路切断敌人交通开始，起义爆发。9月19日，各路起义军退却到文家市。在这里，前委召开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在分析敌强我弱，占领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的基础上，提出了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的主张。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沿湘赣边界向南进军。9月底，部队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进行了改编。10月底，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地带茨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边界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又一次以武装起义形式反抗国民党的壮举。同时，由于起义抛弃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称号，鲜明地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从而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更可贵的是，当起义受挫时，起义领导者迅速选择了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的方向，并着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样，就为国民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斗争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广州起义

于1928年12月11日发动。这是一次工人和士兵联合的城市武装起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任起义总指挥。是时，广州处于粤系张发奎部占据下，但政治军事局面不稳定，广州兵力空虚。起义于11日凌晨3时许爆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便占领了绝大部分市区。当日6时，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苏在上海，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代），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后，国民党粤、桂军阀立即停止争斗，集中5万兵力进攻广州。经过3天3夜的英勇奋战，起义军没能抵抗住优势敌军的进攻，也没有来得及转入农村，最后遭受镇压。张太雷和七八千起义军及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牺牲极为惨痛、悲壮。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它表现了中共党人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和英勇牺牲的英雄气概。同时，它再一次以血的代价证明，在革命低潮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占领敌人统治中心的大城市已是不可能。）

这个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中国革命由此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探索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中国的革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的革命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在经历了许多次痛苦的失败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首先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习惯性思维。他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国情的

特殊，“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4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一条“相反的道路”，即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特殊革命道路，毛泽东等人在其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实践探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在上述武装起义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全国各地迅速建立和发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远离中心城市，国民党统治薄弱，具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多项有利条件。1927年10月，进入井冈山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成功地改造了井冈山原有的袁文才、王佐领导的旧式武装力量，建立了宁冈等县党委和茶陵等县工农民主政府，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和组织起了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农民武装，到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暴动组成的农军，到达井冈山，在宁冈砦市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5月4日，两支部队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后根据中共中央6月4日的指示改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随后，在打败湘赣两省敌军的围攻中，提出和形成了红军的作战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

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外，从1928年到1930年，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开辟了多处革命根据地。如：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复“会剿”及解决红军给养问题，红四军主力主动出击赣南，建立起了闽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初，红四军转战使赣南连成一片。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宁都成立中央苏区中央局，赣南闽西根据地遂改称中央革命根据地。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1928年7月平江起义后，起义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彭德怀。12月，红五军主力转向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宁冈。黄公略率领红五军一部坚持湘鄂赣区斗争。1929年4月红四军入闽，红五军北上恢复并发展了湘赣区。10月，红五军又进入湘鄂赣区，与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红五军一部会合，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27年11月黄麻起义后，起义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1929年，红三十一师建立了鄂东北革命根据地。1929年5月和11月，又相继发动了商南(河南商城南部)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组成了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二和三十三师，开始创建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乘国民党军中原大战之机，形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邓小平等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后，成立了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开辟了右江根据地。1930年2月，爆发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不久，红八军被敌军打败，并入红七军。10月，红七军主力奉调北上，韦拔群等领导坚持右江地区的斗争。

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开始，到1930年上半年，经过3年多的斗争和探索，全国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大小革命根据地有15块，分布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10余个省。中国苏维埃革命不仅发轫而且呈现出发展趋势。

(2) 理论探索：

第一，最早关注农民问题。中共成立之初，重视工人运动，忽视农民运动。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增强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1925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农民问题。他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还指出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政权的重要性。

第二，最早提出要进行农村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了盲动主义倾向，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障碍，一定要消灭之，因而使本来处于低潮的革命势力又丧失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为了克服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寻找革命的正确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的上山主张遭到了共产国际和党内大多数的反对。1928年2月，

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中共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指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

第三，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当时党内一些人也质疑，在偏僻的山村、物力财力缺乏、革命势力弱小的情况下，“红旗能打多久？”针对这些批评和疑问，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充分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战略阵地的三者的密切结合。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回答了农村根据地可以不依靠城市而独立存在和发展。但因受传统的“城市中心论”的长期影响，党和红军内部仍有不少人认为农村根据地的意义只限于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探索，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在工农武装割据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理论。

第四，最早探讨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党的建设问题。在长期的农村斗争环境中怎样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革命化的军队的问题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7页。毛泽东已提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指导全党和对教育党员这一保证农村党组织和红军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途径。

（1929年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中共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会议期间，陈毅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两年来红四军斗争情况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周恩来肯定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策略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工作。

9月，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会谈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一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关于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正确的。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二是规定了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周恩来选

集》上卷，第 32-33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三是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和纠正的方法，要求用政治教育的方法来提高官兵的觉悟，坚决废止肉刑等旧军队的陋习。四是指出中共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中共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最后中央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了朱、毛在群众中的威信。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30 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镇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确立了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的原则。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案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南昌起义后两年多中共及其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解决了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中，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和如何建成一支由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第五，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信中批评了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批评了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进行全国武装起义，再把红军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写道：“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事情不适合的”、“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异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还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实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97-98 页。

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初步形成。

第六，最早提出党的思想路线。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提到了思想路

线的高度。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是同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等原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工农红军的创建，被国民党暨南京国民政府视为大患，在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国民党暨南京国民政府便不间断地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为了保卫红色政权，根据地的民众和红军密切配合，展开了英勇的反“围剿”战争。“围剿”和反“围剿”的多次反复，构成了这一时期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

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调集8个师约10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根据力量对比，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1931年1月3日，粉碎了敌人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组织南昌行营，亲任行营主任兼总司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改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改取“稳扎急打，步步为营”的方略。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实行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打了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敌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国民政府调集了以中央军为主的30万兵力，以政府主席蒋介石为总司令，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鉴于第二次“围剿”的教训，国民党军重新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方略，红军仍然只有3万人左右，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先后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革命根据地3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保卫了红色政权，扩大了根据地和红军。其间，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红军已发展为两个方面军（即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4个军团（即红一军团、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

的编制计 10 多万人。革命根据地 3 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使中共党和红军积累了国内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此外，革命根据地 3 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还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红军将领及军事人才。

1932 年 6 月，蒋介石调集 63 万兵力向各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7 月，国民党军队 30 万人，首先向鄂豫皖苏区发动进攻，由于张国焘麻痹轻敌，苦战两个月，不能扭转战局，只能放弃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进入川陕边界，开辟川陕苏区。同时，国民党以 10 万兵力进攻湘鄂西苏区。由于苏区领导人的错误政策，也放弃了湘鄂西苏区，转战至湘鄂川黔边境。

于是蒋介石集中 30 多万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中央红军 7 万多人，继续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诱敌深入，两战两捷，基本粉碎了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扩大到湘赣闽粤 4 省，红一方面军发展到 10 万人，这是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1932 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 30 万人，党员发展 30 万人，达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

2、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红一方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得到了发展。根据地人口一度达到 1 000 万人。

(1)土地革命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 年 12 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但存在着没收一切土地的片面性。1929 年 4 月，毛泽东发布兴国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1931 年 2 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

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这就确立了废除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目标和任务。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2) 政权建设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土地法令、劳动法等法律文件；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首先由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召开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在此基础上，逐级召开区、县、省和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区、县、省和全国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其他根据地也相继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苏维埃政府注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分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

(3) 经济建设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增长，公营的军需工业和厂矿企业也开始建立起来。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

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关，奖励私人商业输出输入各种必要的商品。

（4）文化建设

苏维埃政府注重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各种学校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着力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才。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

2、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地认为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盲目要求一些地区举行暴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左”倾冒险情绪很快发展起来。这种情绪在“八七会议”时已经开始。1927年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文件。

“左”倾机会主义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中提到过的，广泛的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但是以盲目的“左”倾冒险主义为指导，最终使得广州起义的失败；

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进入高潮，盲目要求举行全国暴动和集中红军力量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先打下一两个省，全国的革命形势就大好了”，并且要求白区的地下工作者全力的配合，发动工人罢工，学生游行，结果可以想象，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红军主力也在攻打大城市中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引起了当时真正参加中原大战的蒋中正的警觉，所以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他立刻调集重兵开始了五次围剿作战。

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陈绍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其主要错误是：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

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第三次可谓是最严重的一次。当时因为王明的“左”倾错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遭到了严重破坏，被迫转移到了苏区。在王明的错误思想指挥下，“左”倾错误在根据地得到了全面贯彻，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中的保守主义，撤退中的逃跑主义，后果是被迫撤离根据地。

在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以外，主要的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一句话，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

对于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等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人运动工作的刘少奇也多次提出过反对冒险主义的主张。但是，王明等人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党内民主，大搞宗派主义，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或不对他们随声附和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赣南会议”）上，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根据地红军的领导权。1933年初，由于白区党的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政治局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到中央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其矛头实际上都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

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 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 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三）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与长征

1、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利

1933 年 9 月，经过充分准备后的南京国民政府，调集 100 万军队、200 架飞机，以蒋介石为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以 50 万兵力，分 4 路“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军集多次“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从四面包围紧缩革命根据地，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和物质资源，最后捕捉红军主力作战，达到一举消灭红军，同时占领革命根据地的目标。由于“左”路线的错误指挥，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致使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陷入被动。

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东堵西截，穷于应付，陷入被动局面。1934 年 10 月初，国民党军已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鉴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定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突围转移。从 10 日晚开始，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共 8.6 万多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湘西突围转移。随即，中央革命根据地大部丧失。至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中国苏维埃革命严重受挫。

“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转移最后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一战略行动的命名。

红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初始，中共中央虽有计划，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不足。最初选择的方向是向南进入广东，结果遭受阻止，折转向西进入湖南。同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一经失败实行突围转移后，“左”倾领导者又把突围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行动迟缓，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是时，国民党军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先后设置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大批军队进行围追堵截。11 月中旬，红军进抵湘江。但此时，国民党 40 万大军已进抵湘江西岸，并调配了大批飞机。红军激战 7 天，终渡过湘江，但损失了一半以上的部队，红军由 8.5 万锐减至 3 万。已不在位的毛泽东出于高度的责任感，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向敌人军力薄弱的贵州省进

军。于是红军开始向贵州进发。12月18日，红军攻克黎平。在这里，中央政治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正式决定进发贵州。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2、遵义会议——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红军转移3个月来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引起红军的回顾与思考，产生了对“左”倾领导者的怀疑和不满，希望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上来。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幼年达到了成熟。

3、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1935年6月中央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同5月初离开川陕根据地实行转移到达那里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共中央又同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合，有了新的落脚点和战略基地。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尽管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不足3万人。但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骨干，是党和红军极为宝贵的精华。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这3万人作基干，使革命力量逐步发展壮大，直到取得全国胜利的。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共产党员和红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它永远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奋勇向前。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整编，开始北上，准备渡赤水河，再在四川的泸州和宜宾间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9日，红军渡过赤水，随后挥师东进。因遇敌阻击，红军于2月18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其间，歼敌20个团，取得战略转移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正当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向贵州进逼之际，红军于3月16日三渡赤水，再入川南，造成又要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之势，调动国民党大军聚集川南。然而，3月22日，红军却突然掉头东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通贵阳。而当滇军增援贵阳时，红军主力已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昆明。随即，一部佯攻昆明，主力则调头北上向金沙江挺进。当国民党军再赴金沙江时，红军已赢得了9天时间，于5月初在绞车渡巧渡金沙江，到达四川西南的会理地区。至此，红军终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军北渡金沙江之后，到达四川西南大凉山区。通过冕宁结盟，得到彝民的理解和支援，使红军顺利过境西昌、大凉山区。红军通过大凉山区后，迅速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5月25日，17名红军勇士乘

小船强渡成功，夺取渡口，为红军部队渡江获得了一个通道。随后，红军沿河上索，5月30日，22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攀着铁索飞夺泸定桥，为红军部队渡江获得又一个通道。随后，红军全军顺利渡过大渡河。

红军渡过大渡河后，攀登川康边界终年积雪夹金山，占领四川北部重镇懋功。1935年6月16日，同从川陕革命根据地退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懋功会师增强了红军力量，也增强了红军的胜利信心，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将士会师后犹如久别的亲人，都兴奋不已，对前途寄予了新的希望并充满了信心。6月18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来到。但是，一场不曾预料的重大斗争却随着懋功会师后到来了。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时，红一方面军有二三万人，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当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了解这一底细后，即在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提出了特殊的主张和要求。在军事问题上，中共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而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在组织问题上，遵义会议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张国焘则想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面对这一情况，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同时，决定由张国焘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7月，红军到达毛尔盖。8月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定》。会后，决定将红军按驻地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共同北上。右路军包括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左路军包括原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原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由张国焘、朱德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27日，右、左两路军分别穿过荒无人烟的松潘草地，到达川西北的巴西、阿坝。这时，张国焘决意推翻两河口会议和毛尔盖会议北上的方针，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鉴此，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第一、第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000余人连夜离开巴西，以避免可能演成的红军内部自相伤害的悲剧。

9月12日，中共中央所率红军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在这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将士团结在中央周围。会后继续北上，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通过渭水封锁线。10月19日，翻越六盘山，抵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十五军团会合。至此，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结束。随即，毛泽东在12月27日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第一次把红军的这一战略转移誉称为“长征”。

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于10月5日在卓木碉非法宣布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和红军。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自立中央，停止一切分裂活动。是时，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站不住脚，与到达陕甘的红一方面

军的处境形成鲜明反差。同时，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不懈地同张国焘进行斗争。1936年6月，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所部退往西康甘孜地区。这时，于1935年11月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进行战略转移的红二、六军团达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初，红二、六军团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的汇合，增强了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力量。由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甘孜会议决定北上与中央会合。7月，红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座，于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宁静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长征的胜利，保存了红军的基干，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东南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固然，红军在长征途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牺牲，据记载，红一方面军由长征初的8万人减少到6500人，红四方面军由长征初的8万减少到5000人(包括后来西征的减员)，红二方面军由长征初的近1万人减少不到5000人。但是，这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红军成为了革命队伍的骨干和种子，且落脚陕北又实现了中国革命力量由东南到西北的战略转移，这为中共党和红军的生存、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力量基础和空间条件。

红军长征的胜利，充分地表现了红军的生命力，集中地体现了红军的英雄本色。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困难是无法想象到的，她面临着具有近代装备，十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临着自然界的无数艰难险阻，包括河流、雪山、草地、饥饿等；面临着党内先是逃跑主义，后是分裂主义的危害。而且，这些困难又不是单一而是交织在一起起作用的，如果党和红军哪怕在其中某一个方面的某一个细小的环节上失误，都会带来不堪的后果。幸运的是，红军战胜了上述一个一个困难。其间，红军击溃了国民党军410个团和无数地方武装，占领过五六十座城市，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战胜了自然界一个又一个的险阻，其中，红一方面军在2.5万里的长征中，先后渡过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翻越夹金山、岷山、六盘山，雪山行程2700里，沼泽草地行程600里；红二方面军在2万里的长征途中，渡乌江、金沙江、陇江、翻雪山过草地；红四方面军1.5万里长征途中，由于受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折腾而更加艰辛，除渡江过河，翻雪山外，还往返草地3次。正是这些胜利的取得，充分地验证了红军的生命力，体现了红军的英雄本色，从而写下了一部人类生存史、奋斗史上壮丽的史诗。

红军长征的胜利，又宣传了红军的主张，播种了革命的种子。红军长征先后经过了11个省，红军得以向这11个省的近2亿民众宣传了土地革命主张和抗日主张。同时，由于留置于长征途径各个省的红军伤病员在极其艰难条件下所进行的宣传和指导，推动了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

红军长征胜利的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便总结的：“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征两万余里，

纵横十一个省。”“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在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4、南方红军的游击战争

红一方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根据地军区，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赣粤边、闽赣边、赣东北、闽西、闽北、闽东、闽南、浙南、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豫南桐柏山、广东琼崖等 8 省 14 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南方八省的红军战士，从 1934 年到 1937 年坚持了三年最艰苦最困难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遵照党的指示，奔赴抗日战场。

（四）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抗日民主运动的迭起，要求国内各政党对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做出科学的分析和估量，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政策。

1935 年 12 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所作的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中共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完成这一任务应当采取的战略和策略。25 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实现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措施。

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彻底批判党内“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同时注意防止右倾错误的出现，毛泽东于 12 月 27 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以及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求。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真正转变，而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到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土地革命战争 10 年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

在政治路线方面，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取得重大突破。毛泽东在重新区分了资产阶级的两部分，初步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来源及其表现特点，确定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革命转变的新思路。在 1937 年 5 月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党内

的思想状况，集中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前途和转变问题，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完成，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因此，革命归谁领导“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在军事方面，系统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律，形成了一整套军事思想体系和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着重反对了那种只重视掌握战争的一般规律，忽视掌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喜欢照抄军事条令，照搬俄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教条主义，指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在战争规律的研究上“，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在思想路线方面，1937年夏，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揭露和批评党内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深入论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了多次的侵略，以至于近代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史，面对侵略，中国人民虽然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但由于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抵抗都以失败而告终。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近代以来列强武力侵华的继续，但是由于有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更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促成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了抗日力量，使得中华民族取得了第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完全胜利，中国的革命形势也由此发生了伟大的转折，抗战中所得到的宝贵经验和表现出的民族精神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年代都是值得借鉴的。

中日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远东国际法庭早有定论：日本是侵略者，日本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中国是被侵略者，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但时至今日，中日两国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却截然不同，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和某些政治家竭力为日本的军国主义行为涂脂抹粉，美化法西斯

斯战犯，将侵略战争说成是解放战争，日本高官一再不顾亚洲人民的反对，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感情。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对这段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有清楚和深刻的认识，从历史中审视中日关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因为单纯的仇日情绪不是真正的爱国，是无知。

（一）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

1、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及其实施

（1）日本灭亡中国的计划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上曾经有过十分密切的交往和联系，近代以来两国都遭到过列强的侵略，但日本通过变法迅速崛起，成为资本主义又一强国，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而中国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沦为列强的鱼肉。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确立了“征韩侵华”的大陆政策，19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琉球岛事件，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蚕食；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侵华，日军是总兵力的40%，达到2万人；20世纪初，日本将侵略矛头指向了我国东北，于1904至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因于俄国争夺侵华权益而发生战争，并取得了胜利；1906年日本建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军一起成为控制南满地区的侵略工具；1915年强加给袁世凯政权的二十一条，以及北洋政府时期都攫取了大量的利益，对中国的侵略在步步加深。

1927年，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出任首相后，召开了大陆会议，专门商讨对华政策，并上奏天皇，认为“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折几乎完整勾画出了日本以后采取的全部侵略行为，彻底暴露了日本侵占东北，进而征服中国的野心。

（2）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

为了转嫁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动荡，日本需要一场对外掠夺战争。皇屯姑事件后，虽然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而实际上军阀间仍然是混战连连，加上政府对苏区的围剿，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日本的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为了制造侵略借口，日本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中尉河本末守等七人在柳条湖铁路引爆了炸弹，嫁祸东北军，日本关东军借此出兵，分路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张学良在蒋

介石力避冲突的总方针的影响下，加上错误判断形式，下达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致使东北军不战而败，一夜之间沈阳沦陷，接着是黑龙江、吉林，十万东北军形同虚设。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日本军在4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里，以三个多师团的兵力，占领了三倍于日本领土的东北全境，3000多万同胞沦为日军铁蹄下的奴隶。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日本进攻上海的目的，一是转移中国和国际社会对其侵占东北的注意力，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二是创造有利条件夺取一个新的战略基地为扩大侵华战争。驻防上海的中国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与日军激战33天，中国军民死伤达1.6万余人，财产损失达20亿元以上。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地区的战争状态暂时消失了，但日本则以此取得了在上海驻军的特权。3月9日，日本制造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告成立。

1933年1月至5月，日军攻占热河省后，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先后占领察哈尔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5月31日，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停战协定》。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等于认可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非法侵占；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

1935年10月至12月，日本制造“华北事变”。10月22日，日本在河北香河指使汉奸暴动，占据县城。11月7日，策动宋哲元等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11月25日，策动殷汝耕等汉奸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

华北事变发生后，华北已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在此期间，日本军队大批开进华北，日本飞机天天在平、津上空转来转去，日本浪人、汉奸嚣张横行；国民党军队、国民政府机关纷纷南撤；工厂、商店或停工或外迁，故宫古物装箱南运，高等学校也加紧南迁，整个华北陷于兵慌马乱之中，华北危机达到顶点。

(3) 卢沟桥事变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华北事变后，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部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在亚洲爆发。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动员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采取“速

战速决”的战略，向华北、华东、华中地区发起战略进攻。日军占领了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以及北平（今北京）、天津、太原、上海、武汉、广州等一大批城市，在中国领土上推进了 1800 多公里。

由于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在 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日军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并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1 月，日本发动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占领 2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这是日军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1942 年元旦，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26 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决心互相合作，结成反法西斯联盟。苏联红军在同年 7 月至 1943 年 2 月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取得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的转折。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的转折，中国敌后战场开始实行局部反攻。1945 年 8 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直接对日作战。中国军民的战略反攻阶段提前到来。日本也于 1945 年 8 月十五日由天皇通过广播向世界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日本侵华战争最终遭到彻底失败。

2、残暴的殖民统治和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

（1）残暴的殖民统治

日本的大举进攻，使中国的大片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这些地方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早在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就开始了在台湾长达 50 年的殖民统治。1931 年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开始了对东北长达 14 年的殖民统治。1932 年，在日军扶持下拼凑的“满洲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复辟残余势力相结合而催生的一个怪胎。中国东北三省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1935 年华北事变后，日军策动、拼凑了一些地方性傀儡政权。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前后，日本加紧诱降活动。1938 年 12 月，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1940 年 3 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关内占领

区，日本军国主义者允许“中华民国”国号的存在，但是，这些地区实质上仍然是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2）侵华日军的严重罪行

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和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犯下了空前严重的罪行，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

首先，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侵华日军除了建立殖民统治，还在占领区犯下了累累罪行，制造了多次惨案，占领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早在甲午战争时期，就在旅顺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全城只有 36 人幸免，1928 年为阻止北伐，制造了济南惨案，6000 多人被杀；1937 年 12 月，日军占领南京后，展开烧、杀、淫、掠“大竞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军进城后，就在全城范围内放火，首都南京的华丽建筑，名胜古迹，直至居民住宅均难以幸免，南京城 31% 的建筑被日军放火焚烧，致使美丽的首都南京四处烟火，满目残垣断壁。日军进城后，不问是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还是逃难的居民，均成为其杀戮的对象，6 个星期内，被日军惨杀的中国平民和失去战斗力的军人达 30 万人以上，且手段极端残忍，包括集体屠杀、活埋、挖心、剖腹、当射击或刺刀靶子、游戏取乐等。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对中华民族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日本为何要屠城：在 20 世纪提出“震慑”理论与战术的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教授哈兰·乌尔曼说：“‘震慑’战术的精髓是使用最少的部队，做到最大的破坏，最小的伤亡。它针对的是敌人的意志，是为了让敌人充分认识到你力量的强大，你是不可战胜的，从而使冲突或战争在短时间内结束。日本在近代日本对中国多次的侵略战争中，日本最高当局就一直迷信并全力实施以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为手段，以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畏惧、“猛省”与屈服，达到以战迫和、实际是以战迫降之目的，实现与满足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权益要求，在南京展开大屠杀也就是为了达到震慑的目的）

1936 年，日军建立 731 细菌部队（主要研究和实施对人进行细菌战）和 100 部队（主要研究和实施对牲畜进行细菌战）。1939 年以后，731 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并于 1940 年、1941 年、1942 年分别在宁波、常德和浙赣战役中施放伤寒、炭疽、霍乱、鼠疫等病菌，导致中国大范围内的居民被感染。100 部队也对大兴安岭地区用细菌感染的方式导致 150 万头牲畜死亡。在华北地区，日军为使八路军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制造了总面积 17.5 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其烧杀

抢掠的“三光政策”导致 318 万居民被杀，财产损失不可胜计。在华中地区，以武汉为例，在沦陷的头一年里，日均采取枪毙、刀劈、集体活埋等方式，仅在汉口的礄口地区杀害的中国人即达 2 万余人。此外，在占领区日军鼓励鸦片种植，公开买卖鸦片，毒化中国居民；还强征了总数约在 10 万以上的“慰安妇”，供日军施虐。充分反映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凶残、贪婪的本质。

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扫荡”，实行“杀光其居民、烧光其房屋、抢光其粮食”的“三光”政策。

其次，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

1941 年 11 月，日本制定《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决定将华北、华中、华南变成日本的经济附庸，随即对关内的金融、工矿业和农业等采取了很多掠夺性的措施。在金融方面，日伪先后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开设了 20 多家银行。这些银行除办理工商业的存放款业务以外，还通过发行钞票、代理“国库”等业务掠夺物资。从 1941 年至 1945 年，伪纸币和日军军用票增加了近 1000 倍。日军还将占领区的法币集中起来，用来套取中国外汇或转向国统区抢购战略物资。工矿业方面，通过采用“军管理”、“委托经理”、“中日合办”等方式，强占工矿企业。1938 年 11 月，日本成立“华北开发会社”和“华中振兴会社”两大公司，垄断华北、华中的煤、铁、水电、水产和航运经营。农业方面，日本在华北、华中大量圈占土地，大量强制征购粮食，甚至把大米和面粉规定为军用粮食，禁止老百姓食用，老百姓只能吃花生饼、豆饼、麸子等牲口饲料，造成了城乡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北平在 1943 年一年内，日平均死亡者高达 300 人。

在东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南满重工业股份公司”两大垄断企业，独占全部重工业和铁路交通，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肆意掠夺矿产资源。在关内，日本“华北开发股份公司”和“华中振兴股份公司”分别主管对华北和华中的经济掠夺。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 3,500 多万人；按 1937 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 1,000 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000 多亿美元。

再次，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对沦陷区人民实行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在历史教学中歪曲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宣扬汉族是满洲的“入侵者”，擅自变更中国疆域；实行日语化教学，把日语列为“国语”。在伪都新京兴建“建国神庙”，由溥仪从日本把“天照大神”捧回，放在“建国神庙”里，当成“建国神”予以供奉。一般民众须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否则会被视为不敬而判处1至7年的徒刑。

在侵略战争中进行宣传煽动，以奴役被侵略国的人民为目的，蓄意歧视、污蔑、毁损、破坏对象国的文化，或将自国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文化设施、自国的语言文学等强加于对象国，——这些“文化”的行为都构成“文化侵略”。日本侵华史上，文化侵略是与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并行的三种基本的侵略行为。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铭记是为了让历史不在重演，铭记历史不等于铭记仇恨，对中日关系要有正确的认识——现在的中日关系——进入2007年，尽管中日关系由于安倍访华以及后续一连串的双边互动而渐显改善，但两国间仍在资源、领土、地区合作等诸多问题上维持对立思维，且短期内难以确立互信关系，因而双边政治关系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此外，安倍内阁强调“主张型”外交，即该说的说，一切以国家利益划线。这就是为何在中日关系氛围快速改善的同时，安倍访欧时依然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极力阻止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而日本外相麻生宣扬“民主价值观同盟”，要建立一条环绕中国的“繁荣与自由的弧”；在中国进行反卫星导弹试验之后日本上下大加指责。日本国内政坛冒出如中国军事实力增加过快，20年内日本可能沦为中国的一个省之类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的战略仍然应该是韬光养晦，稳定发展，重点在于突破国内的瓶颈。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未来三五十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近些年来实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将来中国更加强大，也面临着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课题，只能更加巧妙地把握国际平衡，决不能率性胡来。）

（二）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

1、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与当时国民党当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指责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9月22日又发出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敌。1932年4月正式对日宣战，提出了“用初步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1933年，中共驻共产国际

代表中央发表宣言，表示工农红军愿意在停战和保护民众权利以及武装抗日队伍的前提下，与一切军队和解并共同抗日。这激发了广大抗日的反蒋抗日的热情，迈出了统一战线的第一步；到1934年，中共宣布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愿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抗日。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参加和推动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中央先后选派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力量。

2、局部抗战与救亡运动

(1)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和广大的工人、农民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上海、天津、广州、北平等地工人纷纷举行反日大罢工和抗日示威游行，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募捐。冀东农民开展打游击等斗争。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大中學生举行罢课、示威、街头宣传等活动。各地学生还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收复失地。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也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弦更张”、“与民更始”，变更“剿共”政策，“全国一致对外”。

(2) 共产党人与部分国民党人合作抗日

国民党军队中的部分爱国官兵进行了局部抗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同这部分国民党官兵的抗日合作。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谋求同共产党合作。同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以及国民党内爱国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州发动反蒋抗日事变。此前，第十九路军代表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代表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4年4月，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由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领衔，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纲领上签字的群众达几十万人。

3、国共合作，共赴国难

(1) 一二九运动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际，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都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党内的关门主义错误，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重建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会后，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次年8、9月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进一步变化情况，又发出致国民党书和《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1936年5月，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2）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被迫对其政策作出调整。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集团对正在进行中的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调整了对苏联的政策。与此相联系，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在上述情况下，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间打破长期对立的僵局，通过多种渠道，双方派出代表，进行秘密的接触。尽管这个接触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合作的诚意，只是想借谈判“合作抗日”，达到“招抚”共产党和“收编”红军的目的，没法达成协议，但还是沟通了彼此的情况，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从而为两

党的正式谈判开辟了道路。但是，蒋介石仍没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进行“剿共”。然而，当时的蒋介石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他仍然准备组织力量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新的“会剿”，并于12月初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攻打陕北的红军。12日凌晨，为了实现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张、杨在对蒋介石“哭谏”无效的情况下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为了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确定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张、杨同南京方面代表宋美龄、宋子文的和平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结束了，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和逼蒋抗日方针的重大胜利。

（3）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国性抗战的新时期。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不久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等协议。接着，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9月，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首先结束了国共两党的交战状态，国民党政策由攘外必先安内转向了联共抗日，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了国内团结，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利条件；其次使得日本的对华政策发生了改变，国共的合作，增强了抗战的力量，日本无法以最小的牺牲获得最大的受益，于是将全面侵华提上了日程；有利于党的发展和壮大；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政治财富，

精神财富，对于我国新世纪国内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处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如台湾问题的解决。

（三）国民党与抗日的正面战场

1、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以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为粉碎日本法西斯企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破灭（李斯的调查团），终于使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对日逐渐强硬的态度。1937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遭日本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自卫权以应之。”8月15日，国民党政府下达总动员令。8月20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颁发《战争指导方针》，正式确定“以持久战为基本主旨，以空间换时间，逐次消耗敌人”的战略方针，以转换优劣形势，争取抗战胜利。为此遂决定在平汉、津浦两线设立3道防线，以阵地战阻击日军进攻；同时在上海开辟战场，迫使日军改变作战方向，避免侵华日军集中主力在华北与我决战。

1937年10月中旬的忻口、太原战役，国民党第2战区集中了第2、第6、第7、第14、第22五个集团军，34个师另13个旅，共约28万余人的兵力，在八路军的密切配合下，依托山地有利地形，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2万余人，迟滞了日军沿同蒲路南犯，造成了华北有利局势。

“八一三”开始的淞沪抗战，国民党先后调集64个师70余万人的重兵，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顽强坚守阵地，抗击日军22万余人对上海的进攻。第一阶段，国民党军对日军各据点发动多次围攻，战役中期坚决抗击日军以重兵切断宁沪铁路，从西南方向封闭上海的企图，并以6个师（旅）对日军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击，作战中涌现了许多爱国将领和广大士兵与敌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如

在上海市苏州河北岸担任掩护任务的第 88 师第 524 团 800 余人在副团长谢晋元的指挥下，坚守四行仓库，连续抗击日军四昼夜的猛攻。毛泽东曾高度赞誉“八百壮士”将与“平型关”、“台儿庄”的勇士同列为“民族革命典型”。淞沪抗战前后阻敌达 3 个月之久，毙伤日军 6 万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企图。

太原、上海失陷后，中日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到 1938 年 2 月，国民党第 5 战区的防御地域，已缩小到以徐州为中心，南北与日军对峙的纵深仅各 200 余公里。国民党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采纳周恩来提出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指导方针，采取“北攻南守”的战法，集中 67 个师（旅）计 45 万余人的兵力，从 2 月 12 日起，以两个集团军分别攻击济宁、邹县日军，歼敌数千人。3 月中旬，日军第 10 师团沿津浦路南下，逼进台儿庄，企图从东北越过运河袭占徐州。国民党军一部在台儿庄拼死抵抗，随后组织 7 个师对当面之敌进行反击，歼灭日军 2 万余人，迫使日军放弃对台儿庄的攻击。4 月中旬，日军采取南北对进，侧翼迂回的战法，对徐州展开猛攻。国民党军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在伤亡近 20 万人、力量不济的情况下，最终放弃了徐州，但也取得了消灭日军 3 万多人的重大战果。

1938 年 6 月 18 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以初秋为期攻占武汉”的预备命令，同时集中了 11 个师团 25 万余人的兵力及大量飞机、舰艇，发动了对当时国民党军指挥中心——武汉的进攻，企图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为保卫武汉这个华中腹地及水陆交通枢纽的大城市，国民党以第 5 战区、第 9 战区的部队共约 14 个集团军，124 个步兵师，49 艘舰艇，700 余架飞机，并在苏联援华志愿飞行大队的支援下，进行了武汉保卫战。国民党军在武汉地区坚守 3 个多月，毙伤日军 2 万余人。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 1 年零 4 个月的抗日防御阶段，国民党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进行了积极抗战，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 3 个月内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做出了重大贡献，鼓舞了人民的斗志。且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拉长，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执行持久消耗战略，因而在战役指导上采取消极的单纯防御方针，主要实行线式防御阵地战，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否定运动战和

游击战，作战样式呆板，从而使其组织的几次大的战略性防御战役最后都被日军击破，出现大溃败局面，国民党中央政府被迫迁都退守重庆，在 15 个月内丢失华北、华中大片国土和华南要地共 13 个省 100 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极大失利，跟蒋介石战争指导水平的有一定关系。

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整体情况来看，中国政府投入了数量巨大的军队进行抗击，尽量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尽管丧失了大片国土，军队损失很大，未达到阻敌于外线的目的，但坚决抗战的决心和意志没有改变。日军以其强势兵力，尽管每次战役都能达到局部战略目标，但迫使中国政府 and 军队完全屈服的总体战略目标并未达到。由于中国军队的全线抵抗，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并大量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中国军队打死打伤日军 44.77 万余人，击落击伤炸毁日机 311 架，炸沉炸毁炸伤日舰 176 艘。由于中国军队全线抵抗，为沿海沿江工业的内迁，为西南大后方的奠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并掩护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由于中国军队的全线抵抗，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和赢得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乃至尊敬。

2、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

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由于战线拉得过长，财力、物力、兵力不足的弱点开始暴露出来。同时，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使日本既要准备对苏联作战，又要同英、美等国争霸太平洋地区，它能用于对华作战的兵力已达极限，不得不停止对中国战场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其速战速决的战略意图彻底破灭。1938 年 11 月至 1940 年，中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过渡。

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方针作了重大调整。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由抗日战争初期的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在占领区扶植和强化傀儡政权，同时，加紧对重庆政权的分化、诱降。在军事上，基本上停止上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改为以确保已占领区治安为主。经济上则加紧对占领区的掠夺，实行“以战养战”。

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然国民党的抗战政策有所动摇，但仍在坚持抗战。在 1939 年至 1940 年的两年间，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1939

年3月~5月）、随枣会战（1939年5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0月）、1939年冬季攻势（1939年11月~1940年3月）、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11月）、绥西作战（1939年12月~1940年4月）和枣宜会战（1940年5月~6月）等。这7次战役的规模都很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8至10万人，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在20万人以上。特别是1939年“冬季攻势”和绥西作战，国民党军先后调动10个战区132个师、9个独立旅，共100多万人投入对日作战；国民党军在枣宜会战中亦先后调集第5战区55个师40万人，抗击日军第11集团军8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它接近战略防御阶段4次大会战的规模。

但也要看到，国民党在武汉失守后，其政策亦发生了变化，在政治上加强了反共。如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的方针，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即由抗日战争初期的积极抗战，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民党先后在陕甘宁、华北、华中各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并以重兵封锁陕甘宁边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美、英之后，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中国人民结束了长期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开始了与美、英等同盟国家共同抗击日、德、意法西斯的新时期。1942年1月3日，作为太平洋战场4个战区之一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任战区最高统帅。1942年2月，日军进攻缅甸，并于3月18日攻陷仰光。英国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英军作战，中国组织10万远征军入缅作战。自2月至8月，为掩护英军和保持滇缅交通线，与日军在缅甸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失利后，分别撤至滇西和印度，撤退途中，第5军第200师遭到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率部奋战，伤重殉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正面战场又组织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等一系列较大规模的战役。1944豫湘桂战场虽然大溃败，但形成了“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随着滇西战场的胜利，中国战场摆脱了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为1945年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战役损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不仅从中国战场上来看，起到了打击

敌人的作用，而且，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角度看，也有力的牵制了日军，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3）进入反攻阶段的正面战场

中国军队的反攻首先是从缅甸开始的。1943年10月，经过整训后的中国驻印军进入缅北湖康河谷，向日军发起反攻击。至次年3月，突破日军坚守的南山天险，进军孟拱河谷。5月以后，中国驻印军与中美联合编组的混合突击队连克孟拱和密支那，取得战场主动。同时，为配合中国驻印军的反击，中国滇西远征军强渡怒江，连克日军在滇西的据点。1945年1月下旬，两军一举攻克芒友，胜利会师。至此，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整个缅北战役，进军2400公里，收复大小城镇50余座，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对日军的反击。在豫西、鄂西北会战中，日军伤亡1.5万人，中国军队收复枝江、宜都、襄阳、宜城等地。芷江会战，中国军队在美国空军的配合下，重创日军，残敌2.4万余。此后，日军鉴于整个战局已成颓势，决定收缩战线。5至7月间，中国军队分别收复广西全境、广东的花县和南雄、福建的长汀和连江、浙江的永嘉、湖南的永兴和新宁、江西的赣州和上高以及南康等地。

中国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反攻，与盟军的对日反攻一起，构成了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强大攻势。

对正面战场的评价：整个八年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付出322万多人的重大伤亡，牵制了大部分日军，使日军无法实现迅速占领中国的美梦。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兵，曾经在前线与日本侵略者奋勇作战，不怕流血牺牲，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郝梦龄、戴安澜等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学习和敬仰；为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时间和空间，但由于国民党总体方针的影响以及其政权性质和片面作战路线，无法抵抗日军的进攻，造成了败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要看到其两面性，用辩证法去科学评价。

（四）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在近现代，中国屡次在反击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失败，只有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除了外部因素的作用之外，究其内因，是因为领导力量的不同，以

往的抗争不是民众自发的就是腐朽政权迫不得已进行的，没有正确的斗争目标和纲领，没有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领导力量，而抗日战争正是由于有了中共的正确策略和不懈的努力，才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率先抗日，制定正确的路线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宣言，严厉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揭露了日本灭亡中国的目标，指责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9月22日又发出了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敌；1932年4月正式对日宣战，提出了“用初步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到1934年，中共宣布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愿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抗日；1935年，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各界同胞军队停止内战，集中国力抗日。通过这些宣言，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拥护。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地制定和实施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提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随后，在洛川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会议通过了体现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明了全民族持久抗战直至夺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为了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必须明确抗战的战略方针。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中明确指出：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对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了科学阐明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正确战略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下《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著作，全面考察中国持久抗战的客观依据，科学分析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同志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这一科学预见，被抗日战争的

伟大进程所证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的主要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共产党提出来的抗战的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得到了国民党的认同，形成了共识。在这一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全国抗战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指南，对全民族抗战起到了重大的战略指导作用。

2、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开辟的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了对侵华日军的战略夹击，在相持阶段后，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同时，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并强调中国共产党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会后，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完成正面战场的侧翼配合作战后，依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山西为基地，实施战略展开，逐渐形成了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的敌后战场。

晋察冀是八路军在华北建立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东北沦陷以后，八路军115师一部以五台山为中心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到一个月，收复山西广灵、灵丘，以及察哈尔南部的蔚县等7座县城。后又向平汉线北端发展，开辟了以阜平为中心的冀西游击区，逐步形成了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根据地。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此后的一年内，先后粉碎了日军4次规模较大的围攻，巩固了根据地。此后，八路军又以密云、蓟县、平谷等地为中心开辟了冀东抗日根据地。以安次、永清、固安、新城为中心开辟了冀中根据地。

晋西北是八路军依托吕梁山地区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贺龙率120师一部进入山西，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后与山西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

死队、工人武装自卫队等抗日武装联合，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晋西北根据地。八路军运用围城困扰、破坏交通、截击敌人粮草、袭击敌人后方等方法，迫使敌人放弃所占据的县城，根据地也由此得以扩大。1938年下半年，120师派出支队越过平绥线，跃进400多公里，进入大青山地区，开辟了大青山根据地。

晋东南根据地是刘伯承率129师开辟的。1937年11月，刘伯承率部进入晋东南的和顺、辽县、昔阳、平定一带，不久，八路军总部也进驻太行山区。在粉碎日军的多次进剿后，又收复了晋冀豫边区的一些县城。后129师又与115师联合派出支队，进入冀鲁边的乐陵、宁津地区，与当地抗日武装密切配合，开辟了冀鲁边根据地，逐渐形成了以太行山区为依托晋冀豫鲁根据地。

至此，八路军利用日军实施正面进攻的时机，主要以山西为基地，初步完成了敌后战略展开，收复了大批失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开辟根据地过程中，八路军积极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在敌后站稳了脚跟。

在八路军完成初步战略展开的同时，原来留在南方湘、赣、闽、浙、鄂等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经国民政府当局同意，统一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叶挺、项英分别担任正副军长，下辖4个支队，分别建立了茅山根据地和皖南根据地。

从1938年10月份以后，侵华日军改变了方针，由原来战略相持阶段改为军事进攻为辅，把政策方针调整为打击共产党为主，调集他们主要的兵力对敌后战场发动军事进攻。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术与敌周旋，在此后的一年之中，连续取得歼敌近千人的胜利。1939年11月7日，晋察冀八路军组织的黄土岭战役，击毙号称“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晋西北、冀鲁豫，八路军也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扩大了根据地。最大的根据地晋察冀，拥有75个县政权，2500万人口。新四军的根据地在长江两岸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进入1940年以后，日本为准备“南进”，夺取东南亚地区，加强了对中国的进攻。在正面战场，发动枣宜作战，进逼重庆，并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在敌后战场，则对八路军晋西北、晋察冀、晋西南各根据地以及敌后的国民党军队都展开了疯狂的进攻。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八路军总部决定发起以交通总破袭战为中心的“百团大战”。整个战役前后持续3个半月，华北八路军共出动115

个团的兵力，与日军交战 1824 次，毙伤日军 20645 人，拔掉日伪据点 2993 个，夺回 40 多座县城，使根据地面积得到很大的恢复。也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显示了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作用。从 1939 年到 1945 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抵抗日军的 62%—75% 和几乎所有的伪军。

1945 年，敌后解放区战场不断扩大对日军攻势作战的规模，同时以一部主力向河南、湘粤赣边、苏浙皖边进军，开辟新区。经过 1945 年的春季、夏季大规模攻势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共收复县城 70 座，歼灭日伪军 40 余万人，基本上扫清了敌后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 and 主要交通线上。此时，侵华日军 69% 和伪军 95% 的兵力，仍为敌后解放区战场所抗击，而国民党正面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是日军 31% 和伪军 5% 的兵力而已。由于敌后解放区军民积极对日作战，至 1945 年春夏，根据地发展到 19 块，人口有 9550 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发展到 91 万余人，民兵发展到 220 余万人，为最后战胜日本略者创造了坚实的条件。8 年的艰苦抗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力量由小到大，不断发展，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主要力量，解放人民、收复国土的光辉历程。

国共合作建立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战场，先后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黄土岭伏击战等一系列辉煌的战绩，特别是到抗战后期，建立了 19 块大的抗日根据地，将日本侵略军压缩在铁路线、大城市狭窄的点、线区域，使其濒临失败的边缘，为抗日军民的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条件。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紧密配合，将士团结协作，浴血奋战，陷敌于进退唯谷的境地，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迷梦。

（2）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在通常的情况下，游击战只是一种辅助性的作战形式，在战役、战斗中对正规战起配合的作用。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具有了全局性的意义。

在战略防御阶段，从全局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正规战是主要的，敌后的游击战是辅助的。但是，游击战在敌后的广泛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迫使敌人不得不把用于进攻的兵力抽调回来保守其占领区，从而对停止日军的进攻、减轻正面战场压力、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日军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人民军队在有利条件下也进行过运动战。如1940年8月至11月，八路军总部调集100多个团，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百团大战。但是，人民军队在大部分时间里所进行的，主要是游击战。到1940年底，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南、皖中、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拥有一亿人口。

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游击战争起了伟大的作用。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

3、组织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开展抗战文化工作

中国共产党不仅独立领导人民军队挺进敌后与敌后人民结合，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日伪军的大多数，巩固了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而且通过它在国统区的组织、提出的各种政治口号、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等，有力地领导了国统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初期，设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作为民运的领导机构，1939年1月后由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主持，民运随着战场的发展，先后以上海，武汉和重庆作为开展的中心。

在上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在赴庐山与国民党谈判途中到达上海。在沪逗留期间，他就如何开展国统区特别是上海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向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已不可避免，思想上要有足够的准备。要依靠群众力量，把抗战变为真正的抗战，职工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都要围绕坚持抗战这个总任务，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全面抗战爆发的新形势下，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在各条战线的党员和活动分子，有力地推动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全面展开。

在武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一方面继续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巩固和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国民党下定决心坚持持久抗战。另一方面广交朋友，广泛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国民党内民主派、各中间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一个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共同抗日救亡的局面逐渐获得巩固。与此同时，长江局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救亡团体、救亡报刊、救亡运动三者统一起来，组成救亡运动的整体，使武汉成为国统区（大后方）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中心，并有力地整个国统区辐射。“七·七”献金运动，仅5天时间，就有50万人献金93万元。

重庆成为陪都后，中国共产党还进一步团结各民主党派，以重庆为中心，发动了一场旨在抑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压制人民群众抗日积极性错误政策，要求结束国民党党治，实行民主宪政，坚持团结、民主和进步的民主宪政运动。毛泽东在1939年8月的中共中央延安政治局会议上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提出的三条工作方针指出：1．巩固党；2．深入群众工作；3．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它成功地领导和推动了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1939年9月9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咨询机构的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了一届四次会议。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陈绍禹等26人向大会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得到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等党派的参政员的拥护，他们也纷纷提出议案，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改革政治、实行宪政。9月15日，大会达成并批准了《请政府明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根据这一提案，蒋介石同意由各党派代表组成“宪政期成会”，民主宪政运动序幕就此揭开。

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但是，蒋介石公开反对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5

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抢夺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内战的反动方针。中国处在了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夜。

抗战的文艺，是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地同敌人斗争的有力武器。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经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儿女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号角。全民族抗战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文化界各抗敌协会相继成立，成为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

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是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战线，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以正确的政策坚持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首先是在全党统一了思想，在正确分析局势的基础上，制定了对当时国内各国民政府对社会各阶以及对日本的策略，保持自身的独立，既联合又斗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如对皖南事变的处理，对不同的阶级抗日态度加以区分，分别对待，挖掘最大可能的抗日潜在力量，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强调，必须正确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党内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党外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就是既统一，又独立。为此，共产党必须保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必须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必须对国民党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团结抗战的局面发生严重危机，出现了中途妥协和内部分裂两大危险。针对这种情况，1939年7月，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抗日，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9年12月，国民党军侵犯陕甘宁边区，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八路军给予了坚决的还击。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皖南制造了皖

南事变。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除了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原则、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外，还在政治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径进行有力的揭露和声讨。在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下，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先后被击退。

其次是在根据地的建设，包括建立民主政权，采取措施发展生产，开展文化和整风运动。

1940年3月6日，中共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应各占三分之一，实行“三三制”。“三三制”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是根据地民主建设的一种形式。它的实施起到了调节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这个政权形式同当时国民党实行的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克服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等亲自参加生产。抗日民主政府还厉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终于战胜了困难，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整风运动关系到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民族利益的忠诚捍卫者，是民族解放的先锋。因此党建问题关系到中共制定路线的执行和贯彻，也就关系到了统一战线的坚持问题。党一向注重自身的建设问题，早在瓦窑堡会议上党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全国抗战爆发后，党又明确指出：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伍，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为完成抗日这一艰巨任务而苦战到底。

为达到这一目标，1941年5月开始，1945年4月进行了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在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

可见，经过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有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党已经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具有成功地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及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对鼓舞群众、凝聚人心、坚持抗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拥有 120 多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这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今天，我们回顾抗日战争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华民族才坚强地走过艰难岁月，迎来了一个走向民族振兴的新起点。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奔赴延安。中共中央及时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抗大”、“鲁艺”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建立起来。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各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明显进展。

（五）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意义

1、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 年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 月上旬，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猛烈攻击日本关东军。8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8 月 14 日，日本政府照会中、美、英、苏等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日本投降。9 月 2 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东京湾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向盟

国的投降书。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9月3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举行受降仪式。根据波茨坦公告，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由中国收回。这成为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标志。

2、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1)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力，不仅遏制了日本的“北进”计划，迟滞了日本的“南进”步伐，而且大大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为同盟国军队完成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和实施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1942年3月，应英国方面吁请，中国战区还组成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1942年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起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

总之，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出了伟大的努力。

(2)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对中国的援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

苏联是最早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援助的国家。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后，美国对日本一度奉行绥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美国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另一方面又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采取了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英国及法国等国也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军事合作。朝鲜、越南、加拿大、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3、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原因和基本经验

（1）抗日战争胜利的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 20 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第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

第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第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

（2）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第二，中国人民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和英勇的民族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3）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实现奋斗目标的力量源泉。

第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

第三，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保证。

第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决不惧怕战争。

第五，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三、三种建国方案的抉择

（一）三种政治力量，三种建国方案

在 1921 年至 1949 年时期，中国存在着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后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是反动势力（有时称顽固势力）、民主革命的对象。其政治代表先是北洋政府，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二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间势力、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其政治代表是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物和若干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进步势力、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其政治代表是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三种政治力量分别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建国方案：

第一种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方案。

主张继续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坚持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第二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

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种是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的方案。

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为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

三种建国方案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由他们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作出选择。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并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主要是两个：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是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之所以行不通，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和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所决定的。

首先，是帝国主义不允许。对于它们来说，政治上、经济上不独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乃是理想的倾销商品的市场、投资的场所与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的

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

其次，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软弱。它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而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最终站到了拥护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来。

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根本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它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脱离中国实际，也没有得到中国广大群众的拥护，连提出这种方案的多数人，最终也承认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地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

1、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发展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少数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多数成立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中国农工民主党（亦称第三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它们所联系和代表的不是单一阶级，而是这些阶级、阶层的人们在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共同要求基础上的联合，是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在它们的成员和领导骨干中，还有一定数量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少数共产党人。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2、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

在抗战胜利以后，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比较活跃。

在战后进行国共谈判和召开政协会议时，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主要是同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的。在

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在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和虚假的“多党政府”以及反对国民党炮制的伪“宪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是同共产党站在一起的。它们还积极参加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的政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实践中不断进步，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表现的主要方面。

3、第三条道路的幻灭

（1）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中国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由于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倾向，它们自身就不能不在克服某些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地求得进步和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中间路线”。他们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国民党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这似乎为实行中间路线提供了千载一时的机会。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

（2）国民党当局对民主党派的迫害

尽管民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以暴力对他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遭暗杀之后，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盟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屠杀，所办的多家报社也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在上海发表公告解散。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

（3）民主党派历史上的转折点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

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美”，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与此同时，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自由、和平”。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其他民主党派也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国民党的反动政权陷入众叛亲离、彻底孤立的境地。

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格局的形成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从当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北平解放后，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在北平汇合。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著名的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愿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同年春，毛泽东在同有关人士谈话时提出，民主党派应“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并将在新中国参政，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

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三）从争取和平民主到进行自卫战争

1、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1）战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

战后的政治形势，总的说来，对中国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是有利的。在国际上，帝国主义遭到削弱，社会主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世界反动势力已经难以集中起来干涉中国革命。在国内，经过抗战的锻炼，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人民军队发展到 120 万人，解放区扩大到 1 亿人口。

但是，通向新中国的道路仍然是崎岖、曲折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回复到战前的状态，即坚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控制中国，是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

基于对战后政治形势的科学分析，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的改革，逐步向新中国这个目标迈进。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 1945 年 8 月 28 日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10 月 10 日，双方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1946 年 1 月 10 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38 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密切合作，同国民党当局认真协商，推动政协会议达成五项协议。

政协的协议及其他协议，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是有利于人民的。

中国共产党是决心严格履行政协协议的。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权，其统治的社会基础极其狭隘，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

任何的民主改革，也从来没有准备去履行政协协议。蒋介石以扩大内战的行动，使政协协议成为一纸空文。

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尽管最终未能阻止全面内战的爆发，但是，它使得各界群众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懂得了什么人应当对这场战争承担责任。这在政治上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2、国民党发动内战和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1) 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同年11月10日，国民党军占领华北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并于当天片面下令召开由它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全面内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正是凭着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蒋介石声称，这场战争“一定能速战速决”。他的参谋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即能整个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

(2) 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战略防御阶段

在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稍多一点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战争主要在解放区进行。

从1946年6月至10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153座；解放军则收复城市40座、歼敌29.8万人。从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城市87座；解放军则收复和解放城市87座、歼敌41万人。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而改为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至6月，解放军经过4个月的内线作战，努力打退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并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南等地开始局部反攻。战局的发展，从根本上粉碎了战争发动者的速战速决计划，并使他们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逃脱遭遇灭顶之灾的命运。

战略进攻阶段

经过人民解放军一年的作战，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7年7月，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由于战线延长，大部分兵力用于守备，战略性的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且

士气低落，官兵中充满失败情绪。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 127 万人增加为 195 万人，其中正规军 100 万人；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因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由于不需分兵守卫后方供给线和城市，机动兵力大大增强。

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之不能持久的方针，中共中央作出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待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将主力打到外线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1947 年 6 月底，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由此揭开。

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包括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在同时加紧发起攻击，渐次转入反攻。同年夏季，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

（3）土地改革与农民的广泛发动

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夕，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决定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此之后，通过开展清算斗争等，到 1947 年下半年，解放区即有 2/3 的地区基本上实际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1947 年 7 月至 9 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

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这个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群众，将自己的力量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

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土地制度改革（习惯称“土改”）运动的热潮。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分得土地并在政治上获得翻身以后，其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成立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争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和发展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土地制度改革，是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土改运动的发展表明，解放战争在胜利推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深入发展。经过这个运动，中国最主要的人民群众——农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身利益的坚决维护者，因而自觉地在党的周围团结起来。这就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4）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它感到极端的失望。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民心，主要是由于它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政府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使人民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洗劫，使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国民经济遭遇深刻的危机。

学生运动的高涨

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成为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

针对国民党当局积极从事内战的准备，1945 年底，昆明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内战，争取自由”为主要口号的一二·一运动。这个运动扩展到了许多城市。

在全面内战爆发半年后，1946 年 12 月 30 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的运动（史称抗暴运动或“一二三〇运动”）由此掀起。

1947 年 5 月 20 日，南京、北平等地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史称“五二〇运动”）。随后，这个运动迅速扩大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 60 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罢课、游行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到了一起。

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爱国民主运动的镇压，1947 年 10 月以后，爱国学生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抗斗争的浪潮。由于他们愈来愈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面，学生运动的主要口号便由“反饥饿、反内战”改为“反饥饿、反迫害”了。

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

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前夜，1946 年 6 月 23 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派出请愿团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请愿团到达南京下关时遭到当局指使的大批暴徒围殴达 5 个小时，团长马叙伦和代表雷洁琼等多人受伤。

1947 年间，全国 20 多个大、中城市中，先后有 120 万工人举行罢工。5、6 月，饥饿的城市居民的“抢米”风潮席卷包括南京、上海、北平等 40 多个城镇。

在农村，农民不断掀起反抗国民党当局抓丁、征粮、征税的浪潮。1947 年 1 月，民变地区扩展到 300 多个县。中共地方组织还在广东（含海南岛）、湖北、安徽、福建、江西等一些地方的农村中，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1947 年 2 月 28 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暴政、抗议反动军警屠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2 月底、3 月初，台湾各地汉族、高山族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并攻占台中、嘉义等城市。国民党当局对起义群众进行血腥镇压，20 多天中即有 3 万多人被屠杀。二二八起义虽然失败了，

但作为全国人民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显示了台湾人民的革命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

这些事实表明，不仅在军事战线上，而且在政治战线上，国民党政府都打了败仗。这个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四）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8 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从 1948 年 9 月 12 日开始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结束，历时 4 个月零 19 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154 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中国革命的全国性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成果，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1949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企图借“和平谈判”之机争取喘息时间，布置长江防线，以便卷土重来。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从 4 月 1 日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长达 1 000 多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 3 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 22 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的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

团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逃往中国台湾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2、新中国的成立

为新中国绘制蓝图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

在 1948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论述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的前夕，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 80%~90%。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人民政协的召开与《共同纲领》的制定

完成创建新中国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承担的。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共 662 人，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纲领》在当时是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 56 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五) 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1、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

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的胜利。

(1) 没有广大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近代以来，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中国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中国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伟大时代。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无数无畏的英雄和不屈的战士。随着斗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步向共产党靠拢，这种现象曾经被人称作是“开万国未有之奇”。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华侨等，都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国民党左派何香凝等，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也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与共产党站在一起。邓演达、李公朴、闻一多等，还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侨领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都先后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2)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创建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 28 年的时间里，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无数的优秀战士，它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等，许多杰出的将领，如方志敏、刘志丹、黄公略、许继慎、韦拔群、赵博生、董振堂、段德昌、杨靖宇、左权、叶挺等，也都在这个斗争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国共产党人以行动表明了自己是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察民情，并依靠群众的多数坚强的革命者，从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所确认的客观真理。这一点，甚至也得到了来自国民党营垒的一些人士的肯定。1949 年 6 月 26 日，留在北平的原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张治中在他所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中说：“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他说：“我以国民党党员的一分子的立场，只有感到无限的惭疚。但是站在国民一分子的立场说，觉得极大的欣慰。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救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

（3）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赢得胜利，同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说过，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没有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斗争，堆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胜利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一些国际友人还直接参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已经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

2、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它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曲折的斗争，逐步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

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在中国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革命的政治基础。

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一个是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联盟，主要是劳动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有时还包括与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辅助的、同时又是重要的。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

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2）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和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

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革命，必须建立一支在工人阶级政党绝对领导下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支军队必须实行一系列具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3）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

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注重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制定和贯彻执行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首先着重党的思想建设，要求党员用工人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培育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等。中国共产党正是遵循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了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拥戴的领导核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时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2.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4.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共三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5. 《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6. 蒋凤波、徐占权：《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
7.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8. 郑德荣：《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1927-1937）》，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9.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第二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10. 李新、陈铁健主编：《争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1.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选编》第 6 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12. 曹健民主编：《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和现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13. 萧超然主编：《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14. 肖生生、周炳钦：《两种命运的决战》，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5.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9—1950），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

16. 廖盖隆：《全国解放战争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17. 军科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全国解放战争史》5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思考题：

1.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2.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30 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3.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4. 怎样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路线和正面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5.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并迅速走向崩溃？

6. 如何认识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专题六——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及其曲折发展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的成就

三、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错误

一、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

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站起来以后怎么办，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解决站起来以后怎么办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也不是立即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文章的上篇和下篇的关系，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因此，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它又有哪些特征呢？

1. 经济特征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国有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2. 政治特征是四个阶级联合专政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四个阶级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3. 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过渡时期。

在中国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出现过“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叫“二次革命”论。是把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革命完全割裂开来，即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认为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只能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让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一段时间，无产阶级再通过合法斗争集结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错误导致了放弃领导权，其代表人物是陈独秀。一种叫“一次革命”论，其错误在于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有着质的区别的革命阶段的界限，主张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取得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胜利，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提前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完成，其代表人物是瞿秋白，这一错误导致了左倾盲动主义。“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发展规律。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必须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

（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的终极前途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在革命胜利以后就有两个问题：其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多长时间？其二，什么时候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1、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设想

从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党中央就在考虑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这时到建国初期，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大约要十年到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在此期间，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集中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大为发展以后，才可以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国有化，对个体经济实行集体化，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

1949年9月，刘少奇在政协会议上代表中央回答党外人士关于为何不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写进《共同纲领》的问题时说：我们认为这个时候就写进这个问题是不妥当的，因为要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还需相当长的时间，是以后的事情。如果《共同纲领》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今天要采取的实际步骤。1949年10月，刘少奇在天津工商业家座谈会上谈到：搞社会主义社会，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1950年4月，周恩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说：实现社会主义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今天条件不成熟，就要急于转变到社会主义，这说明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缺乏切实的认识。1952年10月，周恩来在同部分资本家谈话时，又说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

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也曾多次说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要十五年、二十年或二、三十年。1950年6月，他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

还批评了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在同月举行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要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之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并同意了以后，才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以上设想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充分发展之后，再来实行过渡；二是在步骤上先工业化后国有化；先机械化，再集体化。

2、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因

从1949年至1952年，党领导人民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与此同时，开始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这主要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及时地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在调整工商业过程中，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方式，广泛发展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过三年努力，1952年底国民经济全面恢复。1952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77.5%，比历史最好的1936年增长20%。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是，前面介绍的设想也发生了改变。在1952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应该改变原来的设想，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他在中央

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年 12 月，由中央宣传部编写，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所作的正式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改变？这是由于建国后所发生的情况变化以及产生的种种矛盾所决定的：

第一，是来自农村的变化。农村的变化又有两种情况：

一个情况是个体经营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毛泽东曾经说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通过革命，农民都分到了土地，真正地实现了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的愿望：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分得土地的个体农户平均耕地很少。一般每人 3 亩，一户 10 来亩。还有：生产工具严重不足，贫雇农每户平均只占耕畜 0.47 头，犁 0.41 部；资金十分短缺，一个农民一年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仅 52.3 元，其中用于购买生产工具的仅为 6.5 元。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户不仅无力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农业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而如果农业不能发展又将会成为工业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国家工业化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另一个情况是土地出现了新一轮集中，即向劳动力强、懂经营、资金足的农民手中集中。有些中农已经上升为富农，他们需要扩大再生产，要买地，要雇工，不久就可以发展成为新地主。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一户农民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丈夫不幸去世，妻子带着几个孩子要生存下去，在非常贫困的情况下，她的选择只能是卖地，即把土地革命胜利的果实分得的土地出卖而活下去。还有一些农户家中缺少劳动力，又没有生产资金，或者不善经营，卖地的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尤其是老解放区的农村。如果这种情况任其发展下去，新的贫雇农将大量产生，新兴的地主也将重出江湖。那么，所谓的共产党领导农民闹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必然功亏一篑。

面对这种情况，1951年，华北局与山西省委发生了一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在1950年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新富农问题时就发生了）。毛泽东在综合研究了各种意见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工厂机器生产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先革命（1640年）以后，再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1689）。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据此，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应当有步骤地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经历一个“工场手工业

阶段”，这个规律对于无产阶级也是适用的。针对山西省委与华北局的争论，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毛泽东讲的道理把刘少奇、薄一波等说服了。（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91）

第二，是来自城市的变化，城市也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上升。我们知道，一切资本家都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唯一的、绝对的目标，剩余价值规律适用于所有资产阶级，而工人阶级为争得自己的利益，必然地要与资产阶级斗争。在当时，已经有许多城市发生了工人请愿、游行、罢工的事情，他们要求削减工时、增加工资、提高福利待遇。如果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中国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了。

另一种情况是政府和资产阶级矛盾的上升。根据原先的设计，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利用、限制与改造，即利用民族资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逐步地、有计划地将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资本的本性是唯利是图的、是无孔不入的。由于资本的本性所决定，限制与反限制斗争随处可见，这样，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不断升级了。例如，“不

法资本家在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品中，竟然把用油皮桶制造的一铲就卷的铁锹，用方铁涅铁制造的一刨就断的铁稿和用废胶制造的一穿就裂的胶鞋卖给志愿军，他们还丧心病狂地把坏鸡蛋、胡萝卜粉掺进蛋粉，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牛肉制造罐头，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送到抗美援朝前线。不法资本家的上述行为，严重地危害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志愿军指战员的生命安全。在激烈的战斗中，因为用了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的急救包，许多不该致残的志愿军战士致残了，许多不该牺牲的战士牺牲了。”（林蕴辉范守信. 凯歌行进的时期.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252. ）

从1952年开始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斗争，目标是对着资产阶级的，正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新生的国家政权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大规模阶级斗争，但又是发生在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正如周恩来所说：资产阶级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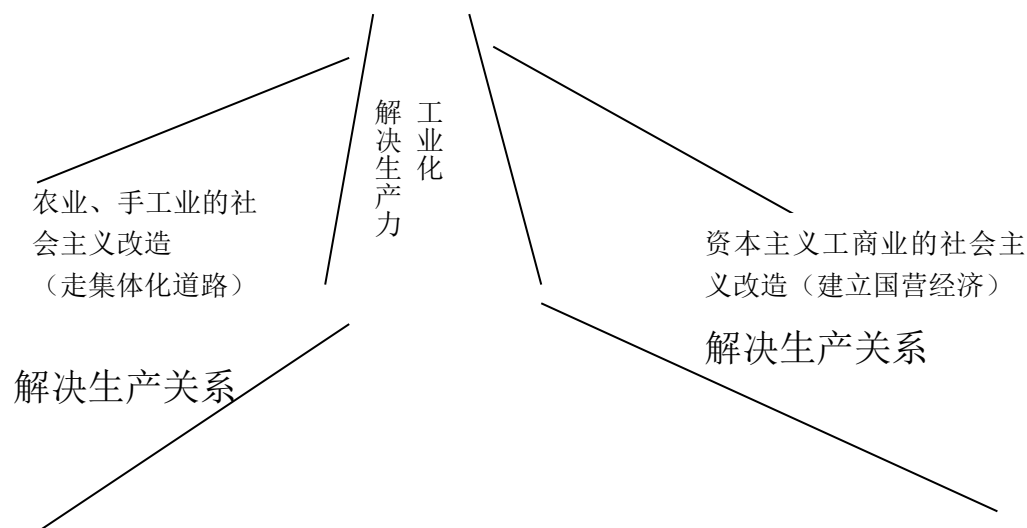
3、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第一，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路线

如同今天我们把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称之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样，前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有个形象的简称，叫做“一化三改造”或者“一体（鸟）两翼”的基本路线。

所谓“一化”指的是“工业化”，“三改造”是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业化为“体”，

对农业、对手工业的改造为“一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为“一翼”，所以又称之为“一体（鸟）两翼”。“一化”是“主体”，“三改”是“两翼”，它们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离，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紧密结合，体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的有机统一。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二者同时并举；同时又可以看见，实行工业化是解决生产力的问题，而三大改造是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通过改造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设想是只有鸟的两翼丰满了，鸟的主体才能腾飞。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又有创见的路线，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基本正确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

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32）“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17）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提前完成，到1957年，各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经过“一五”期间的大规模建设，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已初步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有一个基本理论，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说，图中鸟的“两翼”一定要与“体”配合在大体相当的位置上。后来党在这个方面的错误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人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不顾“体”的发展状况，一味地改变生产关系，追求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越纯越好，使“翼”严重地与“体”不相配，也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适应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强调我们的基本国情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在生产关系的种种改革，就是使原本超前的“翼”即生产关系不断地退，退回到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来。

第二，经过合作化道路，对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采取了区别对象，用不同的办法积极引导、逐步过渡的方式。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

及时总结农民的实践经验，创造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过渡形式。这种从实际出发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渐进的改造方式，一方面可以使农民亲身体会到组织起来力量大，可以增加生产，有利于克服困难，抵抗灾害，防止出现两极分化，逐步地提高农民的觉悟，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由于富农反抗，一些农民破坏生产资料的情况。实践证明，这种逐步过渡的办法符合农民的特点和生产力状况。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也逐年发展。在手工业改造方面的逐步过渡，不仅保护和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手工业逐步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条件。在手工业合作化过程中，国家一方面大力支援手工业合作社实行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注意保护手工业中的许多好的东西，保护优良的传统工艺品及民间老艺人。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十分明显。

第三，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复杂得多。改造的低级阶段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即：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方法。高级阶段为公私合营，又分两个阶段，即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与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结合我国实际，以和平赎买的方法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

资本主义不是无偿地，而是有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方法是“四马分肥”：即企业的利润包括税收、工人奖金福利、企业的公积金、资本家的股息和红利四个部分。在整个改造期间，资本家一共获得 32.5 亿元。其中：1949～1955 的利润 13 亿元；1955～1968 的定息 11 亿元，高薪 8.5 亿元。因此，毛泽东曾经说，出这么一点钱，就赎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是再便宜不过的事情了。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对人的改造，即把资本家从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后一个方面的改造，通过经常组织他们参加各种学习，引导他们参加各种政治实践活动，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使他们自愿接受和平改造。对资本家实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不仅稳定了资本家的思想，提高了他们的认识，保证了改造的顺利进行，而且将几十万资本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干部。这不仅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的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时有记者问荣毅仁：消灭剥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对于你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荣毅仁回答道：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我，失去的是剥削阶级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互不信任；得到的是作为劳动

人民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信任，而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为我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自愿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荣誉和地位。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

（三）进入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很显然，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以后，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因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所以，能否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非常重要。这是因为：

1、能否科学地评价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关系到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那也就否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正确性。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通通谈不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就会被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连续了。

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提前完成，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得到快速发展。1957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210%，平均每年增长25.4%，消费资料的生产比1952年增长83%，平均每年增长12.9%。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和大中型工业企业

相继建立，工业技术水平和工程设计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从而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对于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改善人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1957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3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提高38.5%，农民提高27.4%。（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338页）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据统计，在国民收入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这三种经济合计占国民收入的92.9%，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则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工业总产值中，1956年同1952年相比，社会主义工业由56%上升到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由26.9%上升到32.5%，资本主义工业由17.1%下降到接近于零。在商品零售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由42.6%上升到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由0.2%上升到27.5%，私营商业由57.2%下降到4.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页）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

从历史上看，实现工业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证明，我国已经丧失了通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进入强国行列的机遇，如果搞资本主义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实践证明，党坚持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对于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力发展，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4页）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上，有两个事实是世界历史上各种革命大变动中罕见的：一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二是这样的变革没有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反而极大地加强了人民的团结，并且是在人民普遍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

邓小平说：“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3）

2、关系到能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中国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才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那也就是否定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性、正确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就根本谈不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了。

3、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正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如果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那也就否定了在中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必要性，正确性，否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根据。这样一来，改革要不要以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就会成为问题。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占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公有制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的同时，我国的政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由《共同纲领》代行国家宪法的过渡状态。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在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过渡时期存在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个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基本确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尽管“这项工作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决议》中指出的“缺点和偏差”的主要表现是：“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出现这些问题，有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不够谨慎，工作方法上过于简单的因素，同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有认识上的一问题，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单一，追求纯粹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选择和理解上过于简单化，只注意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

制这两种基本形式，而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公有制经济可以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缺乏认识。党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曾对这些问题有所觉察，对某些问题也做过纠正，但毕竟认识不深。

我们不能因为在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制度变革中出现了“缺点和偏差”，就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路线。应该充分肯定：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的选择是正确的，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既然“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那么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紧密相联系的。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曾经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这个“开始”了的“历史征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的成就

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就是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谈到我国工业的情况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与“两步走”战略

从1956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我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使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即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因此，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曾经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8）从“解放生产力”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一个飞跃，但同时又带来新的课题。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就是为了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任务是1956年上半年提出的。其主要标志，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1956年上半年提出这一任务，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接近完成，中国社会即将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向党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的社

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二是从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建设，使党在领导经济建设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实践基础。三是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迷信，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过去几年从苏联学来的东西。

（注释：苏共二十大和《秘密报告》：1953 年 3 月 5 日，斯大林逝世，7 月，清除了苏共的第 3 号人物克格勃头目贝利亚，逐渐确立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核心。1956 年 2 月 14—25 日，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召开了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苏共二十大，有 55 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2 月 24 日晚，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一中全会。临近午夜，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二十大代表开了一次“特别闭幕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长达四个半小时。这就是后来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所谓“秘密报告”。几个月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了它的全文并公诸于世，这个报告尤其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错误的批评，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震动。由于各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准备不足，因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摇，一些西方国家共产党中的不坚定分子纷纷退党，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帝国主义国家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高潮。但是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曲折中发展壮大，进入了一个以独立自主为主流和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的新时期。）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苏两党在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为了澄清苏共在这个问题上引起的混乱，中共中央于 1956 年 4 月和 12 月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充分肯定了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的正确性，同时也全面评价了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并深刻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及其历史教训。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

了良好的作用。毛泽东在 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

独立思考的探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

1956 年，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

“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里，八大虽然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的提法，但实际上提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的问题，明确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今后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这是八大作出的正确的战略决策。

第二，制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为了写《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于 1956 年 2 月 14 日至 4 月 22 日先后听取了国务院 34 个部、委、办负责人的汇报，并要求各地向中央汇报经济、干部、统战、失业安排等 11 个方面的问题；还通知全国工业交通运输部门约 200 到 300 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向中央写出书面汇报材料。这是建国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也是一次建设经验的总结。1956 年 4 月 25 日，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扩大会上作报告开头时即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

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论十大关系》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十大关系前五个是关于经济建设的问题即：农、轻、重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后五个关系主要是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以及中国和外国关系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

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工业化，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认清什么是我国工业化的道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具体分析了中国实际情况，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这个“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就是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他提出，要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把轻工业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重工业作为我国建设的重点。这是符合我国建国后工业化发展起步阶段的客观要求的。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他从农业关系到几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

题、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重要出口物资、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等六个方面阐述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到1962年，中共中央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

2、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战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人民的利益需要，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战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把我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主要界定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因此，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多次阐述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性，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因此，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巩固民族独立，必需实现工业化。他设想，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经

济建设，工业化的目标被明确为“社会主义工业化”。

1954年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早提法。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初步论述了科学现代化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并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后来，则将原来提出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称为“科学技术现代化”。

在1963年1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同时，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周恩来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人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对“两步走”的时间作了明确规定：第

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 20 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正如邓小平所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37）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定的发展战略，是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重大成果，曾对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过巨大的鼓舞和指导作用，也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时期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三步走”战略步骤提供了历史经验和理论来源。

（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的成就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第七条中指出：

建国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一、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略）

二、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略）

三、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边疆的斗争。（略）

四、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剥削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五、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〇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六、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都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〇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

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七、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〇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〇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〇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八、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〇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艺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优秀作品。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九、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作用。

十、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积极作用。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事实就是如此：

经过三十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最重要的。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1978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为：1953年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为18%，1958年至1965年由于大跃进造成增长的速度不稳定为8.9%，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10.2%的速度增长。对于这一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他所著的《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中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8.5%降为25.6%，工业总产值同比则由41.5%上升为74.4%。各部

门占有的劳动力的比重发生了变化：1978 年和 1952 年相比，农业劳动者由 83.5%降为 73.8%，工业由 6%上升为 12.5%。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位次有所提高，1978 年和 1949 年相比：钢产量由第 26 位上升到第 5 位；原煤产量由第 9 位上升到第 3 位；原油产量由第 27 位上升到第 8 位；发电量由第 25 位上升到第 7 位。农业上，全国粮食产量 1978 年比 1949 年增长 1.7 倍，棉花产量增长 3.9 倍。而这些都是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完成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也取得极大的成就，特别是在一些尖端科技上取得突破性进展。1964 年 10 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此后化了二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又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飞跃，到 1970 年 4 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制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自制的每秒钟运算一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在世界上首先育成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有较大的发展，1978 年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 2.1 亿人，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的 7 倍。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部门也从无到有地初步建立了起来。三十年的成就为我们实现现代化奠定了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

再来看一下外国人的评价：2007 年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有科学家把 1978 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统计了一下，发现年平均发展速度是 9.8%，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革”，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 10%的速度增长。《金融时报》还评价：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是在中国，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

3%)，事实上 1949—1976 年中国 GDP 从世界第 8 变成第 6。国库里留下了 5000 亿斤粮(1978 至 1980 年让全国人民吃了三年陈米)，500 多万吨棉，20 多亿美元。1974 年，陈云向李先念建议，购进了 600 吨黄金，支援国外 200 多亿美元。正如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所说“中国以世界上 6 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平均寿命由 35 岁增加到 65 岁，婴儿成活率从 20% 上升到 70%；建立了数千所大专院校、各类中专基础教育体系，识字率从 20% 上升到 70%，在校学生增长 8.4 倍，小学在校人数达到了创记录的 1.5 亿，普通中学在校人数 1977 年达到了创记录的 6780 万人，基本上适龄人群都有机会入学，特别是小学入学率达到了 93%。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新中国 29 年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解放前我国只有大型水库 6 座，中型水库 13 座，小型水库 1200 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大中小水库 1223（1222）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估计 200 亿立方左右。1949—1976 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 302 座，中型水库 2110 座，小型水库 82000 多座，大中小水库 84000 多座，总库容 4000 亿立方。截止到 1976 年底，全国有水库大中小水库 85400 多座，总库容 4200 亿立方。

水库建设年代表（1949—1976）				
建 设	大型水库	中型水库	小型水库	大中小合计
年 代	（座）	（座）	（座）	（座）
1949 年前	6	17	1200	1223

1949—1957 年	19	60	1000	1079
1958—1965 年	210	1200	44000	45410
1966—1976 年	73	850	37000	37923

总 计 308 2127 83200 85635

从贸易额来看，按外经贸部统计，1950-1978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从 41.5 亿元增长至 355 亿元，增长 7.55 倍，年均增长 7.97%；按美元计算（按当年央行规定的美元与人民币比价计算）从 11.3 亿美元增长至 206.4 亿美元，增长 17.3 倍，年均增长 10.93%，其中 1970-1975 年间从 45.9 亿美元增长至 147.5 亿美元，增长 2.21 倍，年均增长 26.30%。与此同时，我国贸易商品结构显著改善。1952 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占 82.1%，工矿产品仅占 17.9%；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占 89.4%，消费资料仅占 10.6%。1978 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工矿产品占比已经上升到 37.4%，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占比下降到 62.6%；在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占比下降为 81.4%，消费资料占比上升为 18.6%。而且，此时我国对外贸易区域分布与 1960 年代以前已经反转：1960 年代以前 75%贸易额面向苏联东欧，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1970 年代则相反。这样，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方面实际上处于蓄势待发状态，我国对外贸易在国内工业化和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可观的发展，为我国建立了迫使西方国家取消对华封锁的资本，也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放经济的突飞猛进奠定了产业与人力资源的基础。

（莫里斯·迈斯纳在《邓小平时代》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里这样写到：

新的政府普遍喜欢把其经济问题归咎于前任的失误。因此，1976年下半年当华国锋开始其短促的任期时，就有传言谓：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破坏，中国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据称，正是因为新政权的及时制止，中国经济才得以免于崩溃。

1978年10月当邓小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领导权时，以往的经济错误大部分被归溯到毛泽东时代，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华国锋的错误，却不曾提到，邓小平正是后来被取消的华国锋“十年规划”的原初作者。随着时光流转，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圈中的经济学家们为过往的毛泽东时代描绘出的图景越来越黑暗。这样一种说法很快被人们接受并成为定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只有过两次相当短的经济发展的进步时期——1953年至1957年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尽管也不无失误，然而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为那些目前正在当政的人们当时曾是苏联模式的倡导者），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刘少奇路线时期；除此之外的毛泽东时代则几乎乏善可陈。

因此，许多那些曾经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或者忽视过的人们便对这位前主席的幽灵开展了报复，他们把中国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归结为极左的“主观主义”，“乌托邦思想”以及“平均主义”。毛泽东以后的批评家们指摘道，毛泽东主义者没能遵从“客观经济规律”，而这些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现在正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下清楚地展现。然而，即使是按照邓小平时代的官方经济学家们编制的统计表展示的事实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图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他们所描绘的那样黑暗。尽管新政权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来的经济问题是非常真实的一一而且其规模之大也令人惊愕。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带虚假成份）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们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务实”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发现了现代化的好处的领导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多倍（如果从19

52年算起则增长了十二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九十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万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三百万上升到了一千八百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两千八百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很粗糙。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纪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年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一个经常作的比较，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农业经济与印度之比较，这个比较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实，只不过远远没有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那么符合政治时尚了。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65岁。）

三、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的错误

遗憾的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势头没有能够保持下去，八大前后取得的很多积极成果在实践中很快遭到了背弃。从1957

夏反右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 1960 年底“大跃进”运动结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失误

1957 年春天发动的整风运动，本来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防止出现波、匈事件。但是正如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说：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

当时全国共划了 552877 名右派分子，另外还有 31.5 万名中右分子（不戴帽子，内部控制使用）。后来，除了 3000 名左右没有改正外，其他都改正了。属于中央掌握的（当时身份较高，党内司局级干部、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政协委员等）没有改正的只有 5 名：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鼓文应。

扩大化的后果是：其一，大批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受到错误打击，既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其二，打断了整风的进程；其四，破坏了民主法制建设。

影响长久也是最大的后果，是反右斗争扩大导致的理论上的失误。这就是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同时提出存在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被打倒了的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分析主要矛盾一样，这是从政治思想来讲的，是以政治思想为标准划阶级。

但是也决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整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的阴谋，是钓鱼、引蛇出洞。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以看邓选二、三卷的相关论述。

（二）急于求成的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是在错误批评反冒进（1956年在八大周恩来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给反冒进作了否定的结论。6月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请大家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会议挽留他继续担任总理。

八大二次（1958.5）会议提出：用15年的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赶英超美”的战略。其来历是这样的：

1957年11月7日，赫鲁晓夫在庆祝10月革命40周年的讲话中说：“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美国。”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讲话说，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目前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宣告：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钢。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正是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

们，苏联 15 年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 年可能或赶上或超过英国。”

毛泽东上述在莫斯科的讲话，事先征得了在京的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同意。

15 年赶上英国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国内由刘少奇于 1957 年 12 月 12 日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代表中共中央致的祝词中正式公开宣布。

1958 年 1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进而宣告说：15 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后，“准备再用 20 到 30 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和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从而形成了中国的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总体战略构想。

在 2 月的南京会议上，根据“大跃进精神，修改和提高了 1957 年底所作的计划，提出了新的 1958 年经济指标，总的还是以 15 年左右赶超英国为目标制定的。5 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新“二五”计划建议各项指标数大为提高，工业指标普遍翻了一番以上；农业指标普遍提高了 20-25%。”

搞“大跃进”运动的长远战略目标，是争取早日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过渡；搞“大跃进”又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方法，人民公社便是这样的组织形式。因此，毛泽东说：“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

大跃进运动在开始阶段，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上的虚报浮夸，当时放了很多所谓的高产卫星。如宣称河南省西平县小亩麦产 7320 斤，

湖北省麻城县早稻亩产 36900 斤，福建省南安县花生亩产 10000 斤；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 13 万斤。

1958 年 7 月，农业部根据各省报告汇总的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高达 8000 亿斤（1957 年是 3700 亿斤，后来实际是 4000 亿斤）。《人民日报》发表的大量社论和文章，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办不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全国上下竟然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

由于误以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1958 年 8 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省一级党委的工作重心应转到工业上来的要求，并确定 1958 年的钢产量要在 1957 年 535 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确定这一指标的 8 月底，钢产量刚达到 400 万吨，这就意味着在余下的 4 个月内要生产 600~700 万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掀起了全民大炼铁运动。直接和间接参与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达到 9 千万人。工厂、农社、机关、学校和部队，连中南海内，到处建起了土高炉，办起了炼铁场。一时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到年底，虽然宣布完成了翻番指标，但合格的钢只有 800 万吨，其他基本不能用。

直到 1960 年底，因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大跃进实在难以为继，才不得不终止。

发动大跃进，愿望是好的，但由于方法不对头，全国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用最原始的手段来解决应该由现代化生产解决的问题，结果事与愿违，导致了严重的问题。据后来估算，仅大跃进造成的直

接经济损失高达 1200 亿元。另外，原来是希望人民过上好日子，但最终却导致了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三年自然灾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50～1959 年间每年自然增长人口 1000 万人，而 1960 年全国人口比上年净减少 1000 万人，1961 年又继续减少 348 万人。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测算，从 1958 年到 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 2158 万。

（三）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大跃进的同时，还发动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原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太小，不适应农业生产，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的需要；二是认为人民公社这种工农兵学商结合、政社合一的形式，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提出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根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农村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被说成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 10 倍以至几十倍，原来一般是一村一社，后来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合作社的财产全部合并，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实行以吃饭不要钱为主要内容的部分供给制。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中，随着供给制的实行和浮夸风的盛行，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河北省的徐水县提出，1959 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 年进入共产主义；山东省寿张县（该县建制后被撤消）规划，两年内基

本建成共产主义；山东省范县（今属河南省）宣布，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有些地方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宣布为全民所有制，土地、资金和产品等可以由国家无偿的调拨使用。

从以上情况看，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是企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依靠人为地提高和扩大公有制，缩小商品交换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来迅速达到建成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目标。由于严重脱离实际，违背了广大农民意愿，造成了对农村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四）探索中的两种发展趋向

从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到 1966 年 5 月，“文革”爆发，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呈现出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经济建设方面的发展趋向基本上是正确的，而政治思想方面的发展趋向则基本上是“左”的，错误的。最终，错误的趋向占了上风，导致了“文革”的爆发。

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放弃了大跃进的经济发展战略。从 1961～1965，特别是 1961～1962，党中央为调整国民经济，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二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积累；三是缩短重工业战线，加强轻工业生产；四是调整农村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五是稳定市场，回笼货币，消灭财政赤字；六是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调整经济管理体制。

在政治上，党中央也开展了对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以调整同各个方面的关系，调动各种积极性。

遗憾的是，在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党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倾错误却再度发展起来。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党内修正主义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的根源，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接受和肯定了毛泽东的观点，将其写进了公开发表的全会公报。这些论断，后来被概括为所谓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它表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实际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纲举目张”解析）

毛泽东提出这一理论，固然有国际国内客观上的一些原因，如苏联领导人对我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印度军队入侵我国西藏和新疆，台湾国民党当局准备反攻大陆，社会上的犯罪活动增加，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地主写变天帐现象出现等等。但是，更重要、更深刻的原因，是毛泽东从“左”的观点出发，错误地看待了他与其他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些分歧。这些分歧是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出现的：第一，如何看待“三面红旗”及其造成的经济困难；第二，分歧是在农村包产到户的问题上；第三，甄别平反等问题上。

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曾经作过艰辛地探索。例如：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目标、阶段及发展战略；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四项基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繁荣科学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国际战略思想与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这些内容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的起点，又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五）探索走入歧途——“文革”的过程及教训

毛泽东曾经说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1976年4月，毛泽东在病榻上讲：人生70古来稀，我80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多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一）什么是“文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文革”的结论是这样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至于毛泽东同志所重用过的林彪、江青等人，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

（二）“文革”的过程

第一阶段：（1966. 5. 16～1969. 4 党的九大召开）

1965. 11. 《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实际上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正式开始可以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

会议的前半期揭发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四人被革职审查，是为“彭罗陆杨事件”。

《五一六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它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观点，指责《二月提纲》及其作者“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

由此《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为开展文革准备了组织措施。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

这个时期街头上的标志性事件是：其一，“破四旧”：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旧文化。其二，“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血统论”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年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革”的全面爆发。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摘录）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二、主流和曲折

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这个阶段社会上流行的是“红卫兵运动”，“造反派运动”。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毛泽东曾经八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开始大串连，到处造反。批斗所谓的“牛鬼蛇神”黑七类：地、富、反、坏、

右、黑、资。对他们罚站、游街、戴高帽、坐飞机、关“牛棚”。不同的造反派之间发生武斗、打派仗。

运动的重点是整顿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委相继瘫痪，不得已派出军队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继而发展到夺权，成立了由造反派、军队支“左”干部、老干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手中。

1968年12月，还发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第二阶段：九大～十大（1969年4月——1973年8月）

这个阶段的主要事件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林彪自我爆炸；

邓小平复出；

批林批孔运动。

第三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事件是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虽然邓小平的整顿很有成效，但是为“四人帮”所不容；毛泽东也不容忍邓小平纠正“文革”的错误。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又称“四·五”运动：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其实质是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

（三）“文革”的错误

1、“文革”的发动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的思考。

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和国家的纯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这个理想社会的构想在1966.5.7，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五七”指示）中有如下表述：“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

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但是，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障碍，便认为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他看来，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逐步实现建设理想社会的目标。

2、“文革”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第一，这个理论的前提是：认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矛盾。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个基础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它的理论支柱，是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消灭了经济上的剥削阶级，“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主、资产阶级”还会长期存在。我们知道，阶级的划分是以经济来划的；因此，这里的错误就在于以政治与思想划分阶级。

第二，这个理论的中心内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一理论前提，背离了马列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他们当时指出的是两种对立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列宁称为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经济成分并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突出，是社会主要矛盾，因此，“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曾经指出：“用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全面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否认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认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否认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否认无产阶级争取革命手段去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的而奋斗。”这种情况就是指当时俄国革命胜利后“两种对立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时期发生的情况。

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用我们今天的表述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因此，已经不是两种对立社会形态之间过渡的“过渡时期”了。错误的根源就在于此——对社会性质的判断发生错误：既然社会处于“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两个没解决”，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的主要矛盾就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个基础上，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也就必然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给予严厉的斗争。

第三，这个理论的要害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且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又来一次）。

这个理论看起来来源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但是实质上背离了马列的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是这样的：无产阶级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不能忘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能以实现了民主革命的要求而停顿下来，应该把革命推向前进，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不断革命论总结了 1848 年革命经验，提出该口号，划清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半截革命论的原则界限，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列宁继承和发展，提出了著名的“革命转变论”，奠定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据

此，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于 1967. 10. 9 由《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当年第 15 期社论《大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中首先提出；11 月 6 日，“两报一刊”为纪念十月革命 50 周年联合发表题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结为 6 点：①必须把马克思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②社会是一个相当多的历史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复辟的危险性，为防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③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④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⑤最重要的是开展“文革”；⑥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该文是陈伯达、姚文元起草，他们在给毛泽东的送审稿的信写：“关于主席思想 6 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用了。”毛泽东审阅后在信封上批示“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可见，这一理论虽不是毛自己概括的，但是经过他同意认可的。

3、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不正常，个人崇拜滋长到顶峰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文革”前 10 年的部分里写到：“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

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正如邓小平说的那样：“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30页）

“文革”造成了一种双重性的恶果：一方面“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所谓“大民主”，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大民主”，即使国家主席高举宪法进行抗争也不能自保，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是林彪“四人帮”大搞“全面专政”，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彻底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表面看来，“大民主”与封建法西斯专政是两极对立，但是实质上二者是相通的，林彪“四人帮”正是通过这种无法无天的“大民主”实施封建法西斯专政。这个沉痛的教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作了深刻的总结：“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正是这一沉痛教训的总结，邓小平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深刻地阐明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

参考书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赵德馨.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3

席宣、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简史.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冷溶、汪作玲. 邓小平年谱（1975—1997）.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专题七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伟大的历史转折

（一）1975年整顿是邓小平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开端

1973年邓小平被重新起用并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毛泽东评价：棉里藏针，柔中有钢，人才难得。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进行了全面整顿。邓小平曾说：“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哄下了台。”“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可以说，1975年整顿是邓小平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开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但是它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1975年。

了解了这段历史，就会很好的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邓小平在领导整顿中，与“四人帮”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涉及到：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要不要按劳分配，以及科技教育、知识分子问题，改革、开放问题，文化、军事、党建问题等等，几乎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他在这些问题上全力恢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观点，批判“四人帮”的歪曲和割裂。特别是集中在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这个关键问题上。从《邓小平思想年谱》披露的三段话中，可以看到，他在当时思考已经相当深刻：“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页）“我们反对‘唯生产力论’，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说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好才行嘛”。（同上，第8页）“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同上，第10—11页）这些话表明，邓小平已经开始从马克思

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观点与他以后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与“四人帮”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迫使和引发了他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后来在新时期具有重大意义、构成邓小平理论重要内容的问题逐渐集中了、明确了，并作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尤其可贵的是，邓小平已经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个核心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新的认识。他说：我们从那时起就批判了“穷共产主义”，就试图进行工作重点的转移，就开始了拨乱反正和改革的试验。因而，1975年的整顿，是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

“文革”的十年内乱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了困境，当时的情况是：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政治、思想一片混乱，党和国家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对外关系也非常紧张。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进行理论是非和历史是非的清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理论对马列主义、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邓小平提出的观点、思路、甚至语言，大多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而这些就构成了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基础。如：“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个现代化”，“三个世界理论”，“两手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等等，都是毛泽东曾经提出过的。邓小平说：“基本点还是那么多”，“我们的现行政策基本上还是遵循毛主席制定的政策”，“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邓小平对毛泽东最大的继承，是恢复了他所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他确定的八大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此外，凡是毛泽东正确的地方，邓小平都给予了充分肯定。邓小平说：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搞社会主义道路，是从毛泽东开始的，这是毛泽东的最大功绩。中国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特点。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历史转折的思想准备

“文革”后，人们急切盼望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而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作出

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的错误方针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1978年5月，在胡耀邦的组织下，中央党校的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坚决地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一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开始获得解放。

1978年9月13日到20日，邓小平访朝归来，视察黑龙江、吉林、辽宁、鞍山、沈阳军区、天津等地，“一路煽风点火”，发表了六次重要讲话。这些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主要内容：一是大声疾呼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打破思想僵化，要来一个革命，恢复毛泽东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继续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时，更着重从搞现代化建设的角度、从向前看的角度，阐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更强调只有做到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这构成了邓小平新时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特点。二是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比资本主义更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更快，一定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一根本观点。第一次明确提出尽快结束揭批查运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三是提出许多搞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思想。指出：我国体制，包括机构体制、企业管理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要重新考虑。上层建筑非改不可。要加大地方权利，特别是企业的权利。关起门来不行，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要讲责任制。企业和生产队都应该搞民主管理。农民要有民主权利。要允许农民搞集体市场、自留地。要真正搞按劳分配，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工资总额、劳动定额要能够突破。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等。

邓小平北方之行讲话，集中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和邓小平理论形成之初的理论思考，很值得研究，其主要内容后来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如果与十三年后系统阐述这一理论的南方之行谈话联系起来，对照学习，会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认识的更加深刻。所以，邓小平1978

年东北之行讲话集中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的理论思考。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开了40多天，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邓小平在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邓小平这个讲话是解放思想的第一个宣言书，是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的动员令，是邓小平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哲学基础。邓小平的讲话也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在这篇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文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邓小平还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邓小平关于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的论断，有力地推进了人民民主恢复与建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武器，为确立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正在深入，这必然地、深刻地影响了会议。由陈云首先发难，立即赢得许多人积极响应。随着一些由毛泽东作了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天安门事件，彭德怀问题等的提出，使人们的思想真正得到了解放，敢于怀疑和指出毛泽东的错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由此得到恢复。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新时期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也是邓小平理论的起点。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性，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而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宣布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由此，后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了初步的形态，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邓小平认为，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在 1980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发表了《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他说：“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他强调：“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与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78—279）1982 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

从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前，奠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现代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再一个就是 1981 年 6 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今后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提出了最初的看法，被认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框架，奠定了该理论的基础。

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至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形成阶段。其中重要的文献有：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阐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阶段，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从党的十三大以后至1992年10月在到党的十四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阶段。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报告。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邓小平是如何领导全党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是怎样、什么时候首先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过去并没有公布档案材料，因此众说不一。最近，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可以看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提出，有一个过程。邓小平在1975年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对于这一点，他的心情是很急迫的。打倒“四人帮”以后，1977年8月他复出不久就说过：“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表示出希望尽快结束政治运动，集中力量搞建设的一贯主张。1978年9月17日，他在听取沈阳军区常委汇报时提出：搞运动不能没有底，要尽快转入正常工作。并第一次提出结束运动的五条标准。这两段话是《邓小平思想年谱》中正式披露的，（见第35页和82页）。说明这个问题确实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这样，他从东北回来后才有了“在工会九大上的祝词”，再次讲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至于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是如何提出这个建议的，由于会议记录至今没有公布，所以不得而知。

第二个问题，邓小平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据史载，华国锋接受了邓小平的提议，提出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头三天首先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相衔接，华国锋把这一转移解释为一般工作的转换。由于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口号的

错误，有的人仍持“两个凡是”观点，也有的人不愿意触动毛泽东，怕影响毛泽东的威信。所以，这种解释被许多人所接受。然而，这种解释并不能反映这一转折的真正重大意义，依据这种解释，工作重点也不可能真正转过来。其实，这种具体工作转换的意思，在一年前的党的十一大就是这样说的。显然，要彻底做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首先要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破除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关系在这里表现的很清楚：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彻底推倒“两个凡是”，触动“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实现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理论家的胡乔木有勇气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提出质疑，他找出了马恩列斯论述和八大路线，正确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得到参加会议许多同志的赞同。最后，反映在他所起草并被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中。胡乔木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1975年邓小平与“四人帮”斗争的中心问题。从邓小平1975年至1978年的论述可以看出，他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正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表现，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角度提出的，这是一条与“以阶级斗争为纲”针锋相对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这一点，邓小平在1975年整顿中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已经开始认识到，只是后来认识的更加明确、深刻。

在什么意义上实现工作重点转移，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是一般工作转换的角度，三中全会的转移就完全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也不会具有重大理论意义。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认识出发，下决心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他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始终是邓小平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新道路的核心内容。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认识到他提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出发点。

但是，有一个情况很值得研究。从已经发现的材料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从来没有批评过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似乎也在回避“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阶级斗争为纲”的矛盾。这是为什么呢？有充分理由说明，

邓小平一直顾忌在当时情况下是否会损伤毛泽东的形象。不仅在这个问题上，在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他很少直接地具体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另外，如果不是三中全会这个契机，“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复杂而敏感的政治理论问题，会引起党内极大的争论。理论上的解决不如行动上的直接解决。理论上讨论不清楚的问题，先放一放，等待适当时机。从后来他领导改革看，这正是邓小平一贯的态度。在中央工作会议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下，从政治上到理论上彻底推倒和清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错误的条件成熟了，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意义上实现了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在这次会后不久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理论界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最后的讲话中简明地作出结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寥寥数语，了结了这个影响我们多年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初期思考和实践。

搞四化，发展生产力，必然涉及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改革开放。因此，改革开放是与工作重点转移连在一起思考的，在1975年就提到了。改革问题，在1975年整顿中针对“文革”对生产秩序和规章制度的破坏，首先是恢复的问题。但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的1977年，邓小平就马上提出：苏联的体制并不好，僵化，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非改不可”。他认为，现有的体制主要问题是把人捆的紧紧的，基层没有活力。要权利下放，调动基层包括工厂和农村的积极性。一个车间，一小块土地，都要放权。在工业上要放权，劳动工资权，都要放。加强责任制。在农业上要靠政策解决。各地不要等。他让万里在中央汇报安徽农村改革情况，引起了农村改革。所以，最初的改革主要针对实践提出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弊病，要求下放权力，搞活经济。“开放、搞活”是改革的同意语。关于计划和市场结合的问题，从新披露的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提纲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当时就主张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强调重视市场的作用。他写到：“权力下放，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8页）

我国的开放，最早是集中在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这两个问题上。邓小平当时说过：“所谓开放，是指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1979年5月16日）而引进技术突破更早，在1975年就提出了。1977年邓小平更认识到：“要以世界最新技术作为我们的起点。”如上所说，他当时已认识到这是我们能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四化的重要依据。在外资问题上的突破稍晚，这是一个敏感问题，有一个过程。1977年邓小平还说，我们不借外债。1978年他改变了态度：现在国际上那么多低息资金在找出路，人家主动要借给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要？终于在这个问题上突破了。这个问题的意义很大，是我们新时期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第一个重大突破，值得研究。反映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反映了他的勇气和魄力。以后，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们在开放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邓小平逐步提出完整的对外开放思想。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是1987年十三大前概括的，但是，这一战略布局，邓小平从新时期一开始就摆开了。它体现在我们党提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任务的同时，就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及时提出并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在重点转移之前的1978年10月，邓小平就指出：现在关于民主的问题讨论的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现在报纸上的宣传，理论上的讨论，要把民主、法制这个问题讲一讲，这个问题多年没讲了。他及时提出民主和法制两手抓的思想。1979年6月，他在修改叶剑英三十周年讲话时指出：尊重集中，加强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恢复好的道德风尚，讲话稿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要加进去。根据邓小平等同志的意见，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三十周年讲话，全面解释了什么是现代化，明确指出，我们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后，在五中全会上形成了既强调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又指出不能单打一，坚持全面发展的完整的政治路线的表述。

（三）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目标对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起的作用

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目标的新概念，是实事求是分析中国国情的结果。对此，他一直有清醒的认识。从新发表的材料看，他在1975年就注意到了人均收入的国际比较问题，实事求是地指出：“因为我们人口多。即使我们的生产能力和总产值达到了美国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跟你们西方的水平还差一个很大的距离。说赶上西方，就是比较接近，至少还要五十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邓小平思想年谱》第21页）讲这个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很不简单。1977年他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承认落后，不要怕丑。最近我跟外国人谈话都是讲这些话……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同上，第45页）他说：最近谷木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同上，第76—77页）“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必须要艰苦奋斗。”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1979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批评了“洋冒进”问题，实事求是地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上的“左”的教训，明确要从国情出发搞现代化建设的思路。陈云、李先念发表了重要意见。就在这期间，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并开始计算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那年他到了山东、安徽、上海等地，一路调查研究。到年底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小康目标设想。所谓“小康”，“中国式的现代化”，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根据实际“把标准放低一点。”

从邓小平1975年到1979年对国情的论述，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目标，1979年中央对经济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调整任务，都促使了全党从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观点出发，思考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邓小平在1977年就说过：“人们都说中国是个大国，其实只有两点大，一是人口多，二是地方大。就发展阶段来说，是个小国。”（《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8页）1978年他说：“资本主义要消灭，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斗争。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同上，第73页）所有这些重要认识，反映在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叶剑英国庆讲话中，孕育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大理论的诞生。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

（四）科学分析了工作重点转移实现的重要条件

有一种说法认为，1978年我们所以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因为有了邓小平所说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条件。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不是根据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是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建立了“一条线”战略，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

当时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不是建立在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理论上，而是建立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上的。当时国际上并不太平，美苏争霸仍然是世界的主要矛盾，世界充满战争危险，苏联是我们的最大威胁。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我们支持第三世界的和平因素，同时联合美、欧、日等，建立了“一条线”的国际反苏霸权主义统一战线，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这才是工作重点转移得以实现的重要国际条件。

“一条线”，是从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建交开始着手，到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中日签订了含有反霸条款的友好条约，正式建立起来的。决定建立“一条线”，正是为了缓解苏联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一条线”建立的同时，我国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战争可以延缓，“我们当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的。”以后，由于中美，中苏，美苏关系的变化，我们逐步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从1982年开始，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同时，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形势日渐明显，到1984年—1985年，请注意这个时间！邓小平以“东西南北问题”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代替了三个世界的判断。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好，邓小平作出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和全面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改革开放

邓小平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66）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影响世界。改革开放是党

的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与开放既互相联系又有区别，既相联系因为开放本身就是一种改革，没有改革也就没有开放；有区别是说侧重点不同，改革主要针对国内的事情，开放如果从理论上讲主要是对外部的。但是，内部和外部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内部的一系列政策相配套，对外开放也是搞不好的。

（一）改革是新旧体制转换的必经途径

为了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和临战状态下，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即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这种体制在经济领域的特点是：所有制结构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允许其它经济成分存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实行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命令进行管理，排斥商品和货币关系，不重视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的作用；管理体制上，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国家直接管理企业。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使当时苏联能够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最急需的建设和国防上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由于获得解放而迸发出的革命热情，弥补了这种体制的缺陷，使它得以高速运转，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和迅速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或是模仿（如东欧大部分国家）或是参照（如我国）传统的苏联体制，建立了自己的经济、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体上还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进入正常建设年代以后，在革命转变年代群众所特有的那种激情消失之后，这种过分集权、管得太严、统得过死、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明显地暴露出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体制一方面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容易滋长官僚主义、唯意志论、瞎指挥和以权谋私等不良倾向，另一方面又使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缺乏改善经营、发展生产的内在动力，妨碍其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生产效益低、产品品种少，质量差，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我国和东欧某些国家开始觉察到这种体制有严重缺陷。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毛泽东就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提出“以苏为鉴”，进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在探索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和有益的经验，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所限，他的改革方案始终没有跳出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的框子，没有真正触及原来的体制。后来，在探索中，由于指导思

想越来越“左”，把一些偶发事件看得过重，逐渐偏离了正确轨道，以致发生重大失误，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致挫折。但即使如此，他仍不愧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认真总结经验，认识到这种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一种“僵化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改革，使其转变为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六十先于社会主义国家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利用科技优势，掀起新的科技革，即历史上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是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包括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新的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二是适应新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进行了一系列自我调节，使之适应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吸收社会主义国家的很多做法，加大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大搞福利政策，减少劳资矛盾，让职工参与管理等等。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所容纳和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扩展着。据统计，从1945-1975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是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累计额的2倍左右，在世界经济比重中，24个发达国家占70%左右。这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20多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了过去200多年产品的总和。通过西方发达国家的“输血”，我国周边的“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在60-80年代，发展速度相当快。后来，又出现了新“四小龙”即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社会主义面临着现代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处在历史性竞争之中。随着世界大潮从紧张趋向缓和，竞争的重点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如不进行改革，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就难以同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有力的竞争，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遭致严重挫折的形势下，中国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历程与历史经验

采取了渐进的改革策略，分三步向前推进：第一步，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到1982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第二步，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到1987年十三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第三步，从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采取的渐进改革是成功的，没有出现生产下滑、物价失控、失业骤增、生活下降和社会震荡等严重问题。主要有以下经验：

1、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我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不是局部改革。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37）改革必须配合建设，全面改革是和全面建设相配合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奋斗目标是一个全面的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要求，它既是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目标，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三个重要方面。全面改革就是为全面建设服务的。

我国的改革既是全面的，又是有重点的，就是说，有所侧重，不是平均使用力量。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的确立，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地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使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这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我们只有这一个中心，不能搞多中心。其他各项工作，包括改革，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偏离、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全面改革中始终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相反，某些国家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匆忙将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领域，引起政治动荡，冲淡和放松了经济体制改革，结果经济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社会动荡不安，思想理论混乱，人民生活每况愈下，最终断送了社会主义前途。

2、建立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策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的确立，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他的一系列论断和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我们不再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和社会主义的异己物，认为市场和市场经济不带有社会制度的属性。邓小平指出：“社会主

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它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不是前者排斥市场，后者排斥计划，而在于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计划还是市场。我国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经验总结，确定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3、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结合

我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改革是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改革和开放相结合，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是顺乎历史潮流，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个大背景下提出来的政策。在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不能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经济。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只能导致停滞和落后，这早已为国际国内的无数经验所证明。只有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自觉置身于国际市场的竞争，民族经济才能更快地发展。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科学技术交流越来越频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下求得发展，实现现代化。

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在几百年内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远超过了以往时代的总和。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这就更加需要实行对外开放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社会制度的历史要求。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中，不仅要改造旧体制和建立新体制，而且要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并且把二者结合、融合起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

营方式、管理方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

4、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有一种舆论认为中国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老是有人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说事，其实邓小平早就予以过反驳。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从未间断，只是没有按照某种模式、某些人的意愿“改革”或者按照他们提出的时间表而已。我们回顾一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继出台的措施有：取消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改为基层政权组织；实行村级组织、居委会组织直选；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各种监督机制，有党内监督、群众对干部的监督、党外监督、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政府对党与党对政府的监督；舆论监督；废除最高领导终身制，实行干部年轻化，建立正常的离退休制度；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精简党政机构，转变政府职能；改革人事制度，实施公务员制度，实行聘用制等等。邓小平反驳他们说：“这不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从未间断，只是没有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搞“改革”，如果那样做，就上了他们的圈套，改革的将不是体制而是基本制度。

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的成果不能巩固，也难以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人们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有许多重要论述，并提出了指导原则：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更艰难，因为它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因此，“需要审慎从事”，否则会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二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不是“根本改革”，没有大破大立问题；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两院制”、“三权分立”制度，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而要发挥我们自己的优势。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院制。这是我国人民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既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又能解决人民实际上不可能直接决定一切国家大事而带来的种种困难，有利于实现民主和效率的双重目标，最符合中国国情。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5、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贯穿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改革是动力，它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发展。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靠经济的发展”，只有发展，中国才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态，才能进入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行列；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改革，同时它又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稳定是前提，是发展经济和顺利进行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动荡会使改革夭折。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注意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的稳定，使三者之间保持平衡。邓小平多次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要失掉；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乱；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我国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局面保证了改革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更快。

（三）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就必然要求对外经济开放。

早在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欧美先进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了机器大工业，社会分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发展成为国际分工。它使地球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并服务于主要从事工业生产的少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工农业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国际商品交换不断扩大，世界货币随之出现，从而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6）

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各国经济对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国际分工已深入发展为不同工业产品之间、同一产品不同零部件之间，甚至不同工艺之间的分工；发展为工业部门内部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之间的分工。纵横交错的国际分工，使世界各国的社会再生产更加紧密地联结成一体，互相依存，互相交错。国际分工的发展拓

宽了国际经济联系的渠道。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除了通过国际商品交换的流通渠道以外，越来越多地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国际经济联合等渠道进行，使生产要素配置更加优化，国际市场利用更加广泛，开创了世界经济开放的新时代。

社会主义要能巩固、发展、壮大并最终战胜和取代资本主义，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此，社会主义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邓小平认为：“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4）从而得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结论。所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的单向依赖关系，这是一种双向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世界也需要中国。而沟通中国和世界相互依存关系的钥匙是相互开放；世界对中国开放，中国也对世界开放。

对外经济开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实行对外经济开放的根本目的在于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于加速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在于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这就“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订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他还从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角度，强调了对外开放的目的和任务，指出“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因此，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时必须牢牢把握有利于促进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对外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邓小平强调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开放，开放的对象是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各种类型的国家，既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又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还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必须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抵制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必须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必须一手抓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抓坚持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等等。盲目引进、重复引进、不加消化吸收的引进，都是与开放的

基本国策相违背的。在利用外资方面，要讲求经济效益，要合理确定利用外资的规模，与实际能力相适应，要及时调整外资的来源结构、产业投资结构、地区投向结构及组织结构，要加强宏观管理。

1、通过大胆地试验大胆地闯开辟新道路

改革是通过大胆地试验大胆地闯开辟新道路的。例如，我国开放的实践就经过了试点与扩展阶段。试点阶段是 1979-1983 年，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在于发挥这两地作为侨乡和毗邻港澳的人文、地理优势，抓紧有利的国际机遇，在对外开放中先行一步。为了取得对外开放的经验，首先在两省内举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扩展阶段是 1984-1991 年，在总结和肯定广东、福建两省和四个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使对外开放逐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在沿海地区推进，形成了覆盖 293 个市县、2.8 亿人口、42.6 万平方公里的沿海开放地带。最后，将开放扩大到沿（长）江、沿边（境）直至全国。对外开放的深度也从一般的互通有无、扩大经贸合作，升华到优化生产要素组合，使国内经济同国际经济更好地结合起来。

在于这桩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上下求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探索中的前进让前途越来越光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憋着一股气与劲，卧薪尝胆、韬光养晦、埋头苦干，新道路就是这样开辟出来的。就我国改革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可以说是又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这次革命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比第一次革命更加宏伟、更加壮观、更具时代气息的社会大变革。这就赋予第二次革命以新的时代内容。这场“革命”有如下特点：一是在过去革命取得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是历史连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不能只讲变革性，不要连续性，否定以往社会主义的历史；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改革不能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三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要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四是改革是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而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

1982 年 9 月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基本结论”是何等铿锵有力，这一看，就知道我们的成就是怎么来的。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目标，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根据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从我国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它既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又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源于正确应对各种社会矛盾的现实需要。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和社会稳定。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我们应当在深化改革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使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源于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经验的

准确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为了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能够有力地应对来自国际上的各种挑战和风险，以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和胜利。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我们应抓住一切机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我们应抓住各种机遇搞好经济合作和开拓世界市场，加快推进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科学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发展，我们应借鉴西方的高科技发展经验，不断促进各行各业的科技创新，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同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由于世界力量失衡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围绕多极还是单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美国企图称霸世界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称霸的斗争还要反复较量；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如金融危机的风险、经济危机的风险、垄断集团控制弱小和落后国家经济命脉的危险；由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互相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恐怖活动依然猖獗，地区和国际形势仍然很严峻；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打没有硝烟的战争”，企图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继续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战略，动摇我们的理论基础和理想信念。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党要有力地应对外部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就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和谐局面。

从国际经验看，人均 GDP1000 到 3000 美元这样一个时期是多事之秋。在这个阶段，既有因为举措得当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因为应对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徘徊不前和社会长期动荡的失败教训。这样一个阶段既是“黄金发展时期”，也是“矛盾突显时期”。目前我国已进入人均 GDP1000 美元阶段，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重构社会结构，完善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全社会形成合力，努力实现我国经济与社

会的协调发展。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

和谐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时代课题。“和谐”一词由“和”与“谐”两个字组成。“和”字有温和、和缓、谦和的意思，如和风细雨、和颜悦色等；“谐”字有协调、调和无抵触、无冲突之意。所谓“和谐”，《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配合得适当”，指事物的各局部或属性通过组织互相和合而协调为一个整体。“和谐”不是消灭多样性或不允许其他差异性的存在，“和谐”具有协调、融洽、合作等意义，不是普遍性的统一，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而“和谐”应该是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求得一种协调与统一，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存在状态。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中，“和谐”作为与“斗争”、“分裂”等相对立的一种存在，既可以是自然与社会的现存形式，也可以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一种理想状态。有人将“和谐”拆字来解：“和”是“口”中有“禾”，人人都有饭吃；“谐”是有“言”“皆”可以讲，人人有言论民主与自由。有饭吃，有民主，社会就和谐了，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结构均衡、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相互协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综合的、动态的概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内涵：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

路，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党中央认真分析面临的矛盾与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到 2020 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基本建成；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完善，社会秩序良好；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长征”路上才刚刚起步，一个初具规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布局正在全面展开。

（三）当代中国不和谐因素分析及对策探讨

1、改革的成果有一部分人没有得到；有些改革政策则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

中国在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以后，农村按国际贫困标准（购买力平价计算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 1 美元）还有 1 亿多贫困人口，因此，对这些贫困人口来说，很难说他们得到了多少改革的好处。另外，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大力推进，城镇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失业、下岗工人、再加上大量效益差的国企工人和部分收入低的离退休人员，以及原来的城镇贫困者、进城农民工，这又形成了一个数字不小的城镇贫困人口。

其中的一些人不仅生活水平下降，而且连原来有过的一些福利如医疗、住房、子女入学、养老等等都失去了。这个群体不但没有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反而因改革而“亏”。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代价者”或者叫没有得到多少实惠的群体，要求他们去如何正确对待甚至为改革大唱赞歌是不可能的，还有他们的子女、亲属也是不满意的。

“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人们称为“新的三座大山”，因此，有人总结出这样一个顺口溜：“（住）房改把你的钱包掏空，教（育）改逼得二老发疯，医（疗）改提前给老人送终”。这样的“高度概括”当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得到了相当多的人认同，多起“天价”医疗费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公布对医疗部门改革的调查报告终于“证实”了人们的感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教育部部长的“真话”又部分地证明了教育改革某些不成功之处。

改革就是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相当一部分工人农民不仅未分享到改革成果，而且出现了“相对剥夺感”的社会心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显示，工人、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明显存在着下降的趋势，转变为一个地位较低而且处于劣势的社会阶层。而这两个阶层的人口数量众多并且是作为党的阶级基础的阶层，这两个阶层是体现“大多数”的。之所以出现“经济社会地位”的下降，主要原因就是改革之惠所得少甚至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2、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

谁是弱势群体？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力清查暂住人口、清理出租屋、清除乞丐、民工们讨要工资、把上访人员押上车拉回家等等；还有城管人员撵补鞋的人、撵乱摆卖的人、撵卖花的小孩等等一个个场景：一些穿制服的在后面追，一群穿围裙的、拖着杂七杂八工具的、拿箩筐的、拿气球鲜花的在前面跑，司空见惯。直观地看，那些用跳楼来讨要工资的、被清理的、被押上车的、被追赶的就是弱势群体的成员。这些成员包括有前面所说的失业下岗工人、部分收入低的离退休人员，城镇贫困者、进城农民工等等。这是在城市中的情景。农村方面则有没有脱贫的贫困农民，新增加的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无论是城镇弱

弱势群体还是农村弱势群体，都是社会的弱者，他们共同的特征是生活条件差，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低，没有话语权，而且利益被一再侵犯。因此，当自身利益被别的强势阶层侵犯，感到“被剥夺”、“受欺负”时，在他们心中就会逐渐沉淀起不满、厌世、恨世等消极情绪，进而对执政党产生离心倾向，激进一点的，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表达利益要求，形成社会的动乱源。例如用静坐、集体上访、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等方法。因此，不保障社会弱势人群的基本生活，不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甚至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面对不断增加的耸人听闻的侵害弱势群体利益与人权的报道，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和人权就具有更为迫切的现实意义。如果弱势群体不仅生存状况恶化而且基本权利受到严重侵害，就会加剧劳资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公民和权力机关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3、人们对腐败切齿痛恨

说到腐败，人们已经有很大的承受力了，这是因为再高的官员腐败案子也听说了，再恶劣的手法都见了，所谓“闻所未闻”、“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罄竹难书”都是过去了的感觉，现实中的腐败比之我们在书本中看到的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生活中听到过人们对这个问题有如下体会：腐败势力太强大了；人都是这样的，这是人的本性；腐败是反不完的；中国的官场就是这个样子；怎么会让这么坏的人当官肯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风气不正好人当了官也会如此；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的产物；还是当官好呀当官必发财；当官的都这样杀是杀不完的；抓到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逍遥法外；“腐败”的人官官相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是搞群众运动他们不敢……当问题成为普遍性以后就引发了“仇官”心态，这种偏激心态在现实的贫富差距面前进一步被放大，而群众对官员腐败的痛恨，反过来又强化了他们对贫富差距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不但影响社会稳定，也带来人们对社会制度、执政党能力的怀疑。因此，这个问题确实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4、富人的一些作为使人们不满

随着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加大，随着市场经济法制化、规范化的建立和健全，人们对于一些富豪财富是否干净、是否阳光，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随着权

钱交易的内幕被不断揭露、曝光，一部分人通过不法手段或不正当手段积累的财富、在极短时间内财富放大的神话，特别是第一桶金的来历，越来越为人们所认清。例如，有的是靠行贿，有些是通过盗取国家资源，有些是通过官商勾结进行敛财，还有人是通过偷税漏税走向富豪榜；有的是在国有企业的买卖中、在国有资产的流失中发财，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在企业转制上市中大捞一把，有的是利用国家资金在股市中坐庄为自己赚钱等等。广大民众把一些富豪想象得不那么干净，甚至十分肮脏，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淘金发财之后能够“立地成佛”，进了人大、政协之后能够重新做人的话，倒也罢了，偏偏是一些人本性难改，加深了人们对“为富不仁”的印象。例如，一些用人单位拖欠工人（包括民工）工资的现象屡禁不止；有的则不停地以试用的方式更换员工以降低劳动力成本；有的生产单位只顾利润，野蛮操作、违法生产，无视职工的生命安全，致使伤亡事故层出不穷；没有劳动保险、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童工的使用、恶劣的劳动条件、通过损害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利益使社会财富向少数人一方聚集，等等。而公布的数字又表明：中国社会纳税最多的不是那些富人，而是普通工薪阶层；中国的富人极少捐款给公益或慈善事业。这就更加加大了两极分化，不但在实际利益上而且在心理上使社会多数成员受到伤害。还有，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富裕了当代一部分人，但是这种富裕有许多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这就不仅损害了其它地区、其他人的利益，也损害了后代人的利益，既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也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有，强势利益群体不仅利用不正当方式（贿赂、暴力手段、个人关系、权力寻租等），影响地方政府，获取不正当利益，而且也利用合法手段（部门立法、地方立法、行政命令等）实现不正当利益。

5、一些价值导向不正确的后果逐渐显现

从80年代开始，我们在全面否定“文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时，就曾经“矫枉过正”，在倒掉脏水的同时，也倒掉了很多好“孩子”，例如：批判我们倡导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和行为。90年代以来，媒体从各个方面“灌输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意识”，铺天盖地开始对人民讲清楚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还生怕人们不知道人民币的重要性，而大讲金钱是如何如何重要；讲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是符合“从

林法则”的；要每个人去充分认识它的残酷性，要人们勇于斗争，敢于拼搏，去不顾一切地实现、维护个人的利益，要自己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竞争的对手甚至敌人，不要在市场经济下输给别人，败下阵来等等。总的说来，这些宣传“教育”是弊大于利。因为“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无需再去作夸大的宣传，其实质所表现的无非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自私的”、人是“经济人”以及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而已。与此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倒是应该讲清楚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做一些避免社会道德下滑的工作。

其实，早在1980年12月，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三卷，第374页。）

可惜的是，邓小平当年批评的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后来反而有增无减。由于价值观错位，领导的屁股座歪了，嫌贫爱富、置多数人的利益不顾，为少数人服务，为创造“政绩”——升迁——为自己谋利；由于价值观错位，富人为富不仁了，为什么要“仁”？社会提倡“仁”了吗？可见，转型时期的各种不正确价值观的导向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后果。

根据以上的原因分析，提出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的对策：

第一、处理好“以人为本”与“效率第一”的关系

以人为本，是党的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体现。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明确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使人们过上好日子。因此，要把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效率第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以及效率性所决定的，在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效率最高，而其效率高的动力则来自于竞争。但是，“本”与“第一”孰轻孰重？这就是效率要在“本”即人身上得到体现。以人为本并不排斥经济发展效率第一。效率第一必须合理确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但是，效率并不是最终的目标，高效率获取的经济效益要在分配上得到体现，既要体现于国民经济全局的宏观经济效益、生产单位的部门经济效益，更要体现在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收益方面，具体到人。

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并重，而当公平与否的矛盾上升为突出问题时，就与效率同等重要了，就要首先解决了。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抓主要矛盾或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基本原理的。因为，当公平问题突出时，将因此而影响效率了。注重效率，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不公平也制约和影响效率，只有实现公平，才有利于争取更大效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没有效率，打击和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而分配不公平同样也会打击和影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引发社会的不稳定而影响效率。因此，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效率第一，公平也第一，或者说效率与公平同时兼顾。

第二、站稳“立场”，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稳定，利益矛盾处理不好，必然影响社会稳定。所以，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将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要实现稳定，就必须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消除社会各种不稳定因素。反映在顾及社会和谐的经济发展中，就必然地提出利用各种经济政策如财政、税收、福利等杠杆，对收入再分配进行科学调控，理顺工资和收入分配的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等。胡锦涛总书记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and 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得到充分体现。因而，既要做到公平正义，又要保证社会稳定，就一定要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改革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很多，但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应该在各个领域、各项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尤其是落脚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谁所得。是广大人民得到了还仅仅是“有钱人”、“有权人”得到；是不是只是让“少数人”享受了“多数人”的利益。归根结底，是“多数人”都得到还是仅仅为“少数人”所

得。这里就包含了党的价值观指向——在以前，这叫“立场”。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要站稳“立场”，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立场”就是“最广大”与“根本”。这一点，在理论上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具体到某项具体政策、某个地方、某个单位、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却往往被忽视。

第三、处理好少数人先富与多数人如何富的关系

“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达到，难的是“共同富裕”。为什么？因为“自己富裕”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共同富裕”却不是每个个人所追求的目标，而是党、社会制度、政府或者说他们所代表的整体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先富起来的人是不会主动地去帮助贫穷的人富裕起来的，否则就不会产生两极分化。这一点无论古今中外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都是如此。富是与穷相比较而存在的，甚至富就是建立在穷的基础上的。而贫富差距巨大、两级分化严重，决不是和谐社会的标志，只能带来或加剧社会的不稳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人两千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无不高举“等贵贱，均贫富”的大旗。毛泽东曾经说，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动员农民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怎么“分”？党经过长达 20 多年的探索，其结果就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人们的意识中，“均”即为平等，尤其是第一位的经济上的平等，这是国民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既有两千年的思想渊源又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的烙印，一朝扫平是不可能的。而市场经济是从国外引进的，加上“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要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必然有一个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并没有为分配的巨大差距作好理论和思想上的动员与准备，而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与目标，随着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宣传教育，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动员和凝聚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一旦产生两极分化，这根精神支柱就倒了。正如小平所说的那样：那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仇富”心理？对“仇富”的心理为什么要大加挹伐？穷人又为什么不可以“仇富”？“心理”毕竟是“心理”，只要不违法，“仇”一

下都不可以吗，还要抓“思想犯”吗？世界上本没有无缘无故的“仇”，富人的表现能够让人们爱富、崇富、跟富不也很好吗。不想去帮助穷人尽快富起来，却去铺天盖地地批判某种“心理”，简直是本末倒置。其实，所谓“仇富”的人群根本没有多少“仇富”的言论见诸于媒体，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话语权。只是开始大批“仇富”心理之后，人们方才知还有这样一种东西，这也许是批判者始料未及的。

怎么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今天的认识当然不是“劫富济贫”，但也还是得靠法律、制度、体制并且体现到分配中去解决。党中央再三强调，改革的成果要惠及最大多数人，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配政策的要求。这个“惠”可以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减少乃至消灭贫困人口，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享受公平的受教育权，普及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等等。在这些基本之“惠”的基础上，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从而实现建设全面的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果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实惠，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空话。

第四、处理好价值导向与保护多元利益的关系

社会主义有自己的理想、价值观念、以及在此指导下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有着丰富内涵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因此，决定了我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必然发生利益与分配的多元化，并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人们所说的“单位”现象，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为社会成员自主合法地谋取物质利益开辟了较为广阔的空间，社会成员的职业流动频率普遍加快，推动了他们在不同所有制和各个收入等级上的重新分布，这就为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提供了基础。

但是，如何既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又承认、尊重和保护好各个阶层多元化的利益，是一个需要经济、政治结合在一起综合考虑与探索的课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曾经过分强调利益的阶级对立，忽视人民内部利益多元的存在事实，利益诉求靠的是单线性的自上而下传播，在此模式下，虽然很少出现

分歧，但却缺乏开放和活力，使公众利益不能充分表达。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多元化，执政党必须不断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体提供广泛的自我实现机会，逐渐消除公共权力与个体利益的对立，使两者在互动形态下达到社会和谐。要充分发挥社团、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既要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又要努力构建一个程序规范、科学公正、广泛参与的多元利益诉求机制。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2009年5月20日